

目 录

引 言	1
10月23日和24日圍攻电台	9
襲击約瑟夫电话局	31
布达区暴乱分子的领导人	34
反革命分子在医院	39
暴乱集团在大陆飯店	46
反革命活动在文理大学	49
古特曼博士露面了	52
为反革命服务的“首都民族委员会”	54
关于布达佩斯白色恐怖的新材料	61
关于圍攻布达佩斯市委大楼事件的新材料	82
外省各地的反革命事件	96
約瑟夫·杜达什及其匪帮	110
西方资本主义和匈牙利事件——西方报刊述評	121
反革命把他們从監獄里放出来了	150
伤亡和損失	153
十五位烈士	157

引 言

在十月事件發生以前，为資產階級复辟效劳的宣傳，以及事件过程中的大部分这类宣傳，都帶有伪善地掩飾其真正目的的特点。这种伪善的做法是一种經過深思熟慮的、隱蔽的、企圖迷惑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群众的手段。武装暴乱期間在報紙上公布的种种要求和綱領远远地落后于口头宣布的要求，也落后于反革命煽动者們所已經实行了的东西。当我们考虑这些要求的内容时，必須切記这个时期的一个特点，那就是：行动远远超过了写下来和印出来的言語。

例如，始終並沒有發表过任何口号，說一切居領導地位的国家 and 地方公務人員、企業經理等等，凡是共产党人或同共产党人合作过的，一律必須撤职，这种口号从未見諸文字，但实际上却已經在各种机关、团体和企業中开始見諸行动。許多誠实的、忠于革命事業的、受人敬重的領導人員被撤职了，他們的职位一个接着一个地被資產階級复辟的代表人物窃据了。

在印刷品中，反革命分子并未要求取締共产党和拘捕負責的共产党人，但是各区党組織的办公楼却被武装分子占据了，布达佩斯市党委会大楼受到襲击，許多党的領導工作人員被謀杀了。在布达佩斯，有組織的武装分子挨家挨戶搜捕了数以百計的共产党员。此外还拟訂了逮捕其他共产

党人的名单。白色恐怖并且蔓延到了乡村。

对于苏联，反革命分子写的是平等和友谊，而做的却是糟蹋苏联英雄纪念碑，扯毁红星，烧毁俄文书籍，包括列宁、托尔斯泰和杜思妥也夫斯基的作品，甚至连俄文版的裴多斐作品也烧掉了。

如果反革命在一开始就表明它的真正目的，并且在报刊上暴露出它的真面目，那它很快就会发觉包括信仰社会主义的学生在内的人民群众同它对立起来了。

政府当时所面对的公开要求和口号一般只具有暂时的性质。政府刚一接受某些条件，反革命分子就立刻提出新的要求，并且威胁说政府一定要满足这些新要求，不然他们就不信任政府。对政府人选的要求的不断改变就足以说明这一点：最初，要伊姆雷·纳吉参加政府；这一点作到以后，又要求撤掉所有共产党人部长，而接纳凯特莱夫人等人；到十一月初，已经出现“打倒伊姆雷·纳吉”的口号了。

这种得寸进尺的策略是美帝国主义的喉舌——臭名昭著的“自由欧洲电台”所授意的。

.10月31日，有个贝尔上校在“自由欧洲电台”广播要求说，国防部长的职位必须交给“自由战士”，于是不久马勒特就成了国防部长。同一天，“自由欧洲电台”鼓吹“废除华沙条约，宣布匈牙利退出这个条约”，——第二天，即11月1日，伊姆雷·纳吉就照办了。“自由欧洲电台”并不隐瞒它的企图，即置匈牙利人民于一个由流亡分子组成推行“铁拳政策”的政府的摆布之下；而这些流亡分子无疑将会完成在匈牙利恢复旧秩序的使命的。在当时，这同样也是外国报界的一个经常的话题。

在估计这些要求时，我们还必须考虑到下述事实：在这

一阶段中，甚至指揮全部反革命运动的美国宣傳中心也發出策略指示說，暫且不要代表前業主要求收回工厂、矿山和地产。無庸置疑，一旦那些前資本主义分子取得了政权，美国宣傳家和他們在匈牙利的代理人就“不会坚持”維持大企業的社会化了。

虽然上述情况使旨在恢复旧秩序的欲望未能得到坦率的表达，然而它們还是通过一种吞吞吐吐的方式表現了出来。因此灭亡了的霍尔蒂政权的追随者，当他們自以为已經掌握了政权的时候，就部分地放弃了自制力并在一定程度上脫离了“自由欧洲电台”的美国思想家所指引的策略。在好几个地方，前地主跑出来要求收回地产；奥托·哈布斯堡提出了对匈牙利王位的要求；逃亡的伯爵們出現在边境上的紹普朗鎮的最华贵的旅館里；略文斯坦王子也进入了匈牙利。明曾蒂紅衣主教也同样地暴露了他自己。

资产階級复辟已經从美国代理人那里取得了現成的处方。根据这一計劃，要采取的第一个步驟是摧毀人民民主的国家权力机关，宣布工人階級的政党为非法并迫使它轉入地下，以及在“中立”的借口下松弛匈牙利同社会主义国家陣营的关系，并使她同西方資本主义国家集团联系起来。当然，在开始时不必告訴人民說一旦匈牙利被美国人和从西方来的“联合国軍”及其匈牙利代理人所控制之后，大資本的統治就会毫無困难地复辟。这一步驟将会使匈牙利和她的邻国間的矛盾死灰复燃，我国从而将成为新战争的温床这一事实，也将被含糊过去。最終目标是要把匈牙利变成西方帝国主义的一个东方桥头堡。其中所包含的危險如此显而易见，甚至资产階級政治人物中的明眼人也不能熟

視無睹。例如，所謂“首都民族委員會”里的南多尔·比尔凱伊—戈爾佐也曾就違背華沙條約的“危險把戲”提出過警告。

資產階級復辟的進一步征象之一是前霍爾蒂政權的各政黨在政治生活中的重新出現。在布達佩斯市政大廳中出現了一個“匈牙利基督教黨”和一個“基督教青年協會”；此外，還有三個集團也組成了“基督教”政黨：基督教民主人民黨，基督教青年會和基督教民主黨。這些復活了的霍爾蒂政權的“基督教”政黨和他們的同盟者通過報刊和其他方法立即開始掀起反共、反蘇、排猶、收復領土主義、沙文主義宣傳的混濁浪潮。

其他政黨也組成了。這些政黨的組織者的目標在於用資產階級民主的或者自由資產階級的政權來替代社會主義政權的辦法，實現一種非霍爾蒂性質的資產階級復辟。然而，反革命的軍事和政治的實際指揮權卻落在霍爾蒂法西斯主義的政治和軍事代表手中。資產階級復辟主義者的形形色色的集團，代表了資產階級民主、自由主義以及“基督教”和法西斯傾向的各種混合物。這些混血兒的“凝結因素”就是他們對於西方帝國主義的卑躬屈節。

在這些日子裡，有好幾個無名或是幾乎沒有聽說過的个人和政黨集團向總理辦公廳新聞處申請出版報紙的許可。匈牙利獨立黨在11月1日提出的申請書中，附交了該黨的黨綱，其中除了別的，有一條是反對社會主義政權，並且明確宣布要“實現一種純粹的、永久的、匈牙利資產階級民主”和“私有財產的不可侵犯性”。

資產階級復辟分子中間的法西斯勢力還組織了一個所謂“全國無黨無派人士集團”。他們向納吉政府提出的綱領

草案写道：“在清算 AVO^① 以后未經逮捕的成員应交警察管制”，还說：“一切企業、工厂、机关和团体內的共产党組織、工会組織和劳动計劃部門均應立予解散……。”

包括有判过刑的箭十字党杀人犯在內的“匈牙利政治犯兄弟会”，也是在法西斯分子领导下組織起来的。这一組織曾經希望出版“觉醒”报，这个名称令人联想起 1919 年反革命时代一个臭名昭彰的所謂“觉醒的匈牙利人同盟”的法西斯組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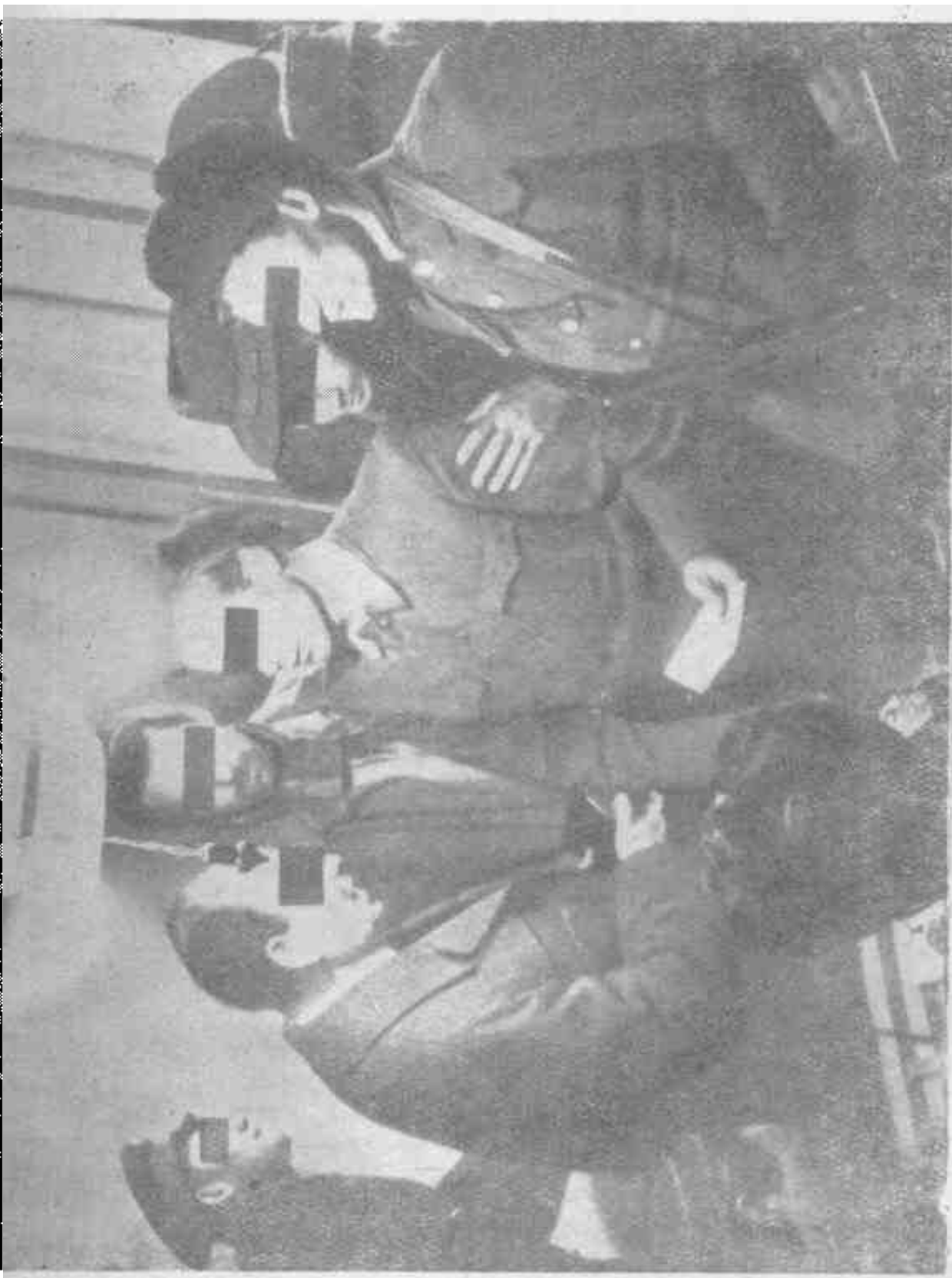
霍尔蒂分子在布达佩斯市政大厅复辟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首都民族委员会”在 11 月 1 日的成立。該委员会宣布自己为任命市政人員的唯一合法机关。根据记录，律师卡罗伊·扎伊哥法里曾經說：“民族委员会应宣布处长級以上的全体負責官員即日停职”。11 月 2 日，該委员会“开始了工作”。那个实际并不存在的“匈牙利基督教党”的一个代表立刻提名由一个庇阿尔教派的教士担任市教育处处长，并且建議市政厅毫無例外地起用在 1945 年以及其后被撤銷职务的霍尔蒂分子。

在各个市鎮和乡村中都已揭發了許多表現复辟趋向的事实。本書只能述及某些典型的事例。

这种趋向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就是明曾蒂紅衣主教。在 11 月 3 日的晚上，他在一次广播講話中說明了他的政治見解。虽然这次講話相当含糊，但其实質却是显而易見的。

明曾蒂用下列命令式的語句提出了他对匈牙利未来的社会結構的概念：“我們希望成为立宪国家之內的沒有阶

① AVO：国家保安处的原文簡称，該处后改为国家保安局(AVH)。



此照片原載于1956年11月8日瑞士“她和他”畫報，原說明如下：

“在自由戰士的指揮部中（本報記者只是因為携有瑞士護照才得以進入），他們都說：‘我們絕不投降’。本報記者在隔壁房間見到了自由戰士的指揮員，為了保密，我們沒有刊登他的照片；為了同樣的理由，我們也有意地設法使他的同志們的面孔無法辨認。”

級的社会，成为一个發揮其本身民主成就、以受社会利益公平合理节制的私有财产制为基础、并为民族主义文化所鼓舞的民族和国家。”

在为受“公道”和“社会利益”所节制的私有财产制辯护中，明曾蒂抄襲了“基督教政权”和納粹主义的煽惑辞句。但是历史已經教导过我們：在实践中，这一切就等于資本的無限权威。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是生产資料的社会公有制。明曾蒂在他的演說中却宣布了这种社会秩序的失败并企圖根本埋葬了它。当然明曾蒂拒絕承認伊姆雷·納吉政府，并且以他那种盛气凌人的姿态用下列辞句表达了他的拒絕：“被打垮了的政权（原文如此）的成員和他們的承繼人（指伊姆雷·納吉和他的政府成員）对于他們自己的活动，对于任何疏忽、延宕或錯誤的措施，都要适当地分別負其責任”。

明曾蒂直接地威胁伊姆雷·納吉及其同僚，他宣称：“……法律傳訊在每一方面都得通过一个独立而公正的法庭”。

明曾蒂还要求举行“一切政党得以竞选”的新选举——并且直接了当地提出了“国际监督”。这位紅衣主教強調了几天之前自由欧洲电台所提出的在西方控制下“独立”的口号，这一口号是为了保証一切資產階級复辟的政党的自由活动，同时却在实际上禁止共产党活动并迫使它轉入地下。

这位紅衣主教在結束演說时要求把教会的“設施”归还教会，而这自然也得包括地产在內。

明曾蒂对人民民主的“被打垮了的政权”宣讀了一篇吊辞，然而这篇吊辞是言之过早了。这一政权和匈牙利劳动人民不但将补救拉科西政策所造成的损失，而且也将补救

失敗了的反革命暴動所引起的破壞。

這一卷內容包括許多有關這次資本主義復辟嘗試的政治性材料，以及關於反革命屠殺的新資料。希望通過這些材料可以對這次反革命暴亂提供一幅較為清楚的圖畫。

在這一方面，本書所搜集到的資料使我們得以歸納出下列幾點無可爭辯的結論：

一、這次武裝暴亂的煽動者和組織者是外國間諜、霍爾蒂流亡分子和國內地下組織的領導人，他們有組織地參加了群眾遊行示威，並且在遊行示威中日甚一日地起了領導作用。

二、留在匈牙利的那些霍爾蒂政權的代表人物開始在首都以及許多市鎮、鄉村和鄉下地區恢復舊秩序，國外的流亡分子則在國內代理人的協助下已經在準備奪取全部政權了。

三、由美元維持、由美國指揮而在西德領土上進行的自由歐洲電台的顛覆性廣播，在反革命的思想準備和實際指揮中，在煽動武裝鬥爭中，在破壞停火中，以及在造成群眾歇斯底里，從而導致私刑虐殺忠於人民和國家的無辜男女中，都起了重要的作用。自由歐洲電台的指揮者們，對於匈牙利人之間的流血事件，對於隨後發生的向西方逃亡，以及對於他們所造成的千千萬萬匈牙利家庭的悲劇，負有特別重大的責任。

四、在10月29日之後，反革命叛徒的目的越來越明顯了，那就是要推翻社會主義人民政權和把西方資本主義的勢力範圍擴大到匈牙利——換言之，也就是資產階級復辟。

匈牙利人民要避免新的反革命黑暗時代，唯一的辦法就是鎮壓反革命暴亂。

10月23日和24日圍攻电台

武装暴乱的起点

試圖到达播音室

(K. I. 叙述)

10月23日早晨，我听說建筑学院的学生正在筹备在貝姆將軍鑄像前而举行一次沉默示威来声援波兰事件。在听說示威遭到禁止之后，各大学都举行了集会，并且，据我所知，除政治經濟大学外都决定不顧禁令照常举行示威。我听說建筑学院的示威組織者坚持他們的計劃，理由是：游行队伍将保持完全沉默，同时他們到达貝姆鑄像后就将立即返回学校。

我旁觀了在包以齐——捷林斯基大街上的示威游行。队伍大約走了一小时。当然，这个示威絕非是沉默的。参加者——特别是在各个大学的旗帜之下行进的人們——絕大部分是学生。游行队伍的前一部分尤其如此。他們有节奏地、兴高采烈地呼喊口号。我后来听說，这些口号是劳动青年同盟用傳单形式散發的。其中有些口号主張波匈友好，或者在平等基础上苏匈友好；其余則是表示反对拉科西，以及要求讓伊姆雷·納吉參加領導。口号大都強調工人和学生的团結。后来，当游行队伍变得更为混雜时，逐漸听到了更多的反苏口号，例如“我們不要俄国制服”等等。

据我记忆所及，在当时尚未提出苏军撤退的要求，虽然首都各处的墙上都已贴遍了这样的要求。示威者要求住家挂上国旗，当他们照办的时候就受到喧嚣的欢呼。后来，他们又要求挂上带有科苏特徽记的旗子，至少要把现在国旗上的人民民主国家国徽挖去。过路的人们以相对的淡漠旁观着，虽然大部时间是带着微笑旁观的。没有听到任何不满的议论，那些不同意的人们只是保持着沉默，他们的意见最多不过反映在他们的脸上。可是当时在街上，我已经偶然听到随后在当天晚上更经常被重复的议论：“好容易盼了十二年，我们终于活着看到这一天了”。

八点半的时候，我听说广播大楼被示威者包围了。九点到九点一刻的时候，我乘公共汽车到了安地电影院，在那里我才发觉城市里的夜生活不正常。在博物馆大街和拉科西大街拐角处的人群远较平日多得多。起初，我企图从博物馆大街走近广播大楼，可是我只走到卜柔迪·山道尔大街，在那里有两辆汽车正在燃烧着。道路被庞大的人群堵塞住了。可以听到枪声。人们从大学校园里涌出来，从新打开的箱子里拿出子弹，嚷着：“这就是国家保安人员用来射击的东西”，同时把子弹和枪支发给青年人。那时大约是九点一刻。班凯夫人和另几位其他被陷在广播大楼的我的同事说一直到午夜民警才开始实弹射击。

我试图从普希金大街走近电台，可是也没有成功。路上满是破砖头，显然都是来自马路拐角处一所正在修建的房子面前的砖堆。一群群过路人在街上聚拢来，又散开。在一群人中有人正在解释说：这些砖头是用来投掷那些前来援救电台的国家保安人员的，那些国家保安人员并未还手而直奔电台播音室去了。另外一个人声言如果有人向他

扔磚頭，他決不讓步。可是人群不久就压制住了這種意見，而人們愈來愈多地聽到像“惡棍”、“他們在向匈牙利人開槍”之類的喊叫。沒有人想到去問問是否人們——不論他是誰——有什麼理由要攻擊電台播音室，或者在這種情況下武裝部隊的任務是什麼。

在過路人中間有許多人只是出於好奇心而停留下來，而他們也轉而反對國家保安人員。在拉科西大街上西普街附近一帶有幾輛空的公共汽車。有一個青年在其中一輛的頂上向擠進大街的人群講話。我沒有聽清他說什麼，他宣布了形形色色的要求，而他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博得熱烈的喝采和掌聲。一些騎摩托車的人從快車道上馳過，其中有的在人行道邊停下來，被喧囂的人群圍起來，然後又開走了。在這裡我聽到那些一再重複的喊聲：“他們正在向匈牙利人開槍”和“好容易盼了十二年”。愈來愈多的卡車隊開始到達，裝滿了年青人，掛着國旗。這時，在“自由人民報”大樓周圍已經有了龐大的人群，同時可以聽到那兒傳來的槍聲。一個年青女人在一輛卡車上喊道：“我們已經毀掉了斯大林鑄像”。人群中有人問：“什麼時候？”那個年青女子看了一下表，說：“現在是9點36分，就在6分鐘之前。”

在林蔭大道上，一大群人涌向愛姆凱咖啡室。在那兒停着一長串電車，其中有些被打破了窗子。

拉科西大街上有人說，切佩爾工人們正在開來。看得出人們是害怕的，但是工人們並沒有來。在晚間，人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先前宣布的那些可以接受的口號同其後的行動之間的矛盾，同時也可以看到口號的一定的演變過程。起初，這些口號是反對斯大林主義和拉科西，而要求一個獨立自由的匈牙利。同時，卡車運輸公司的被占領，插着旗子的

摩托車的迅速開來開去，武器的運輸和遞送，以及電台的被襲擊，這一切都表明了一種事前老早就組織好的行動，而它並不是針對那位並不在場的、已經解職了的黨書記拉科西。

在播音室里

(M. L. 的敘述)

電台工作人員在一度神經緊張之後，在兩點鐘聽到宣布對於公共集會的禁令已被撤消，感到鬆了一口氣。他們討論了到哪兒去和錄什麼音的計劃。但是，從電台人員的情緒和那些叫嚷得最厲害的人的要求來判斷，很難希望有什麼好結果。比較理智的人們對那些荒誕的要求表示了不滿，然而當時的氣氛卻表明：今天絕不能希望理性能占到上風。

大約五點鐘，我們得到消息，一群示威的人正朝電台走來。五點半左右，卜柔迪·山道爾街上擁擠得使人不能從那边走近大門。街上混亂的叫喊聲不斷地迴響着，氣氛是敵意逼人的。不久他們就開始焚燒紅旗。電台主任法雷亞·班凱夫人和體育記者賽培西走到陽台上想弄清楚這群人要求什麼。對於“同志”的稱呼的回答是長達數分鐘的噓聲和“我們是匈牙利人”的喊聲。情勢越來越危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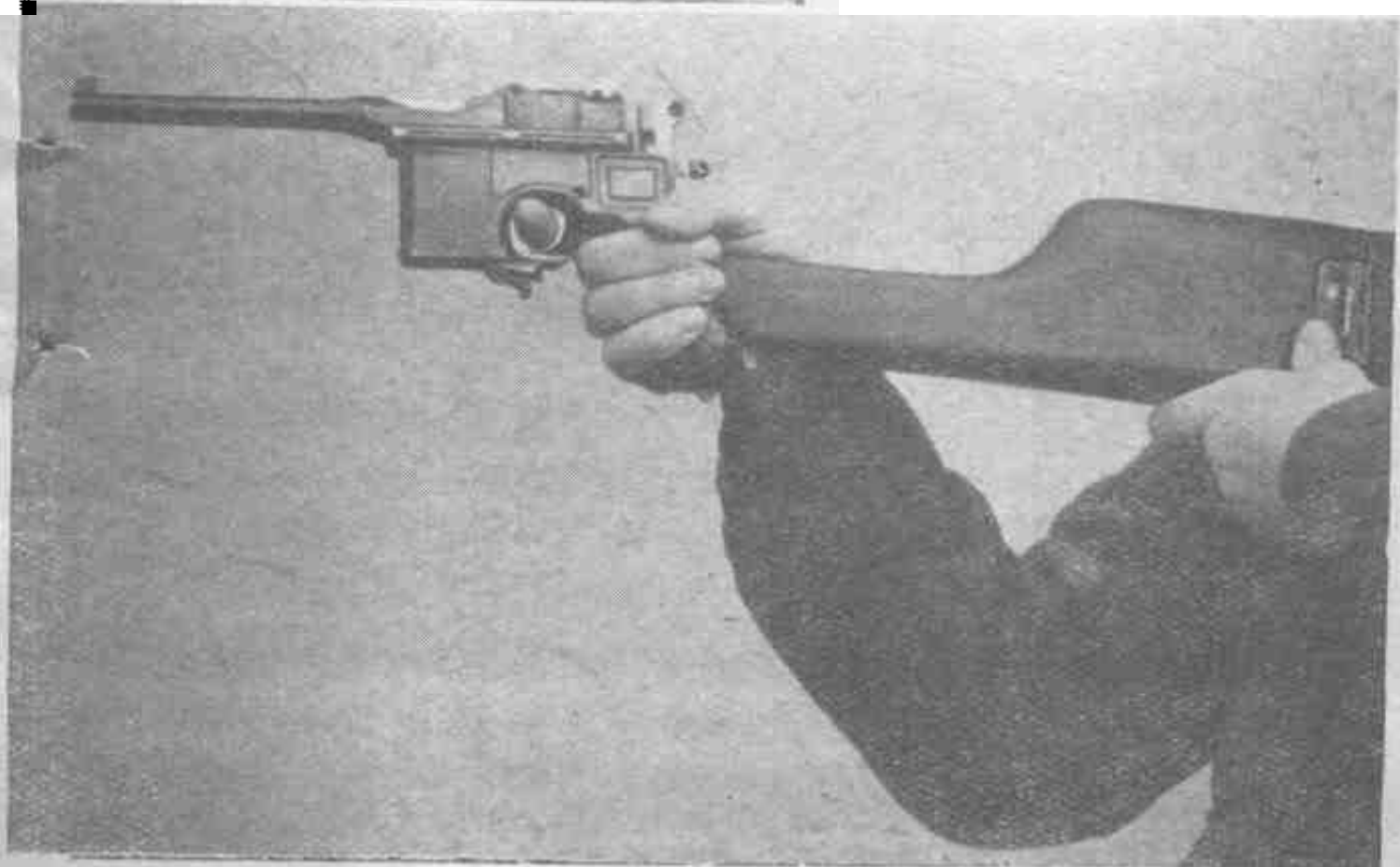
第一個代表團大概是十二個人組成的，其中包括幾個學生、一些傲慢的青年浪子、還有一兩個面目可憎的比較年長的人。他們表現了咄咄逼人的態度。他們要求打斷正常的節目，在街上安放一架麥克風，讓他們宣讀十六點要求。

班凱夫人回答說：“我們準備宣讀這十六點，但需作某些修改，因為我們在今天早晨和昨晚已經廣播過幾次大學集會上所通過的類似的決議了。然而，我們不能打斷節目，



反革命分子使用的
的几种外国制武器：

1. 德国制 MP44 闪电式卡宾枪；
2. 美式卡宾枪（美国制手提机枪）；
3. 英国制新汤姆生式手提机枪；
4. 德国制 MP40 手提机枪（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制）。



没收的武器之一：西德奥本多尔夫（下萨克森州）毛瑟军械工厂制造的“纳卡尔”手提机枪。这种枪安在木枪托上，保证瞄准的高度准确性。

但是可以在下次新聞廣播中，或者配合我們關於示威游行的報道來宣讀這十六點。我們不能把麥克風安放在街上，也不能允許人群進入播音室，因為這樣作至少會引起一陣真正的混亂，不是在街上造成無政府狀態就是使播音室遭到破壞。”當時，一個看來是沒有教養的很年青的傢伙跳起來，用許多粗話辱罵班凱夫人並強調說，“直到電台掌握在人民手中，他們絕不讓步”。問他這句話是什麼意思，他回答說：“把麥克風放在街上，讓每一個人都能說他所要說的話。”

經過了一場激烈的爭執，那些說話比較清醒、態度比較文雅的代表——可能是學生——領頭接受了我們的條件。唯一比較嚴重的爭論發生在要求蘇軍撤退的問題上。根據我的記憶，甚至在這一點上，他們也同意了這樣的措辭：即要求在与蘇聯平等的基本上的完全獨立。

同時，在街上流傳着謠言，說代表們被扣押並遭到了虐待。在這以前，我們的窗子已經受到石塊的投擊了；這時投擲的石塊則不斷地增加。站近窗子或站在陽台上是危險的。當代表團走出去，企圖宣布協議時，他們和電台的職工一樣受到了敵意叫喊和石塊投擲的接待。暴動的人群不肯聽他們自己所選的代表團說話。這個代表團被解散了，據說代表甚至还遭到毆打。此後，在數小時內同樣的情景一再重復：一個代表團前來，我們和其中態度較好的代表達成了協議，可是他們不能在外面發生影響。最後一個代表團，看到前幾個代表團的命運，沒有敢回去。當那些“和平示威者”槍殺了負責警衛的陸軍少校之後，班凱夫人終止了和他們的談判。

在八點鐘，格羅的演說已經播出，可是在電台前的人群

沒有听到，因為我們沒有東西來轉播它。因此，說這個演說是对电台的襲擊的起因是不正確的，因為襲擊在數小時前就已開始了。歷史學家包勞茲·納吉後來告訴我們：當天傍晚他在电台附近漫步時，注意到一個帶着軍人風度但是穿着便服的老年人喊出了“讓我們占領电台！”的口號——“為什麼？”一些站在那裡的一些大學生問道。他沒有回答，但是把青年們編成八個人或十個人一組，給了他們各樣的指示，把他們派到不同的地方。

早些時，七點左右，該扎·洛松奇和米克洛什·法沙爾黑伊來到电台，後來佐勒坦·山道爾也來了。洛松奇到陽台上去環顧了一下，然後又走進來了。街上的人們希望听伊姆雷·納吉講話。洛松奇打電話給伊姆雷·納吉，問他是否能來。納吉說除非黨要他來，他才來。後來我們得知伊姆雷·納吉曾在議會大廈前對示威者講過話，电台的人把這個演說錄了音并把錄音帶帶了回來。我們對着街挂出去一個擴音器。听到了伊姆雷·納吉所說的第一句話，人群安靜下來了，但是後來又開始叫喊，發出噓聲，並且打壞了擴音器。總而言之，他們連伊姆雷·納吉也不要了。洛松奇和法沙爾黑伊在八九點鐘之間离开了。

向廣播大樓施放的头几槍發生在九點鐘。從九點到十點之間只听到零散的槍聲，可是其中一定有些很高明的射擊手，因為他們竟然射中了三個在窗口出現的保安警察的頭部。十點鐘以後，大樓就處于不停的射擊之下。

“自由人民報”、作家協會和新聞工作者協會的一些我們認得的和不認得的同志，一個接着一個地打電話給我們；自由人民報的一些人責備我們，其餘的人只是問我們保安警察在這邊射擊和屠殺和平示威的學生是否事實。我們說

我們才是被射击的人。电台并未开枪，因为没有接到开枪的命令。在里边的人正在竭力劝导那大部分是非武装的人群解散；因此他們还不願向武装的攻击者开枪。然而，他們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的。

守衛者已經在使用着他們所有的催泪瓦斯彈。但是这样作只是害了他們自己，因为瓦斯从破窗戶侵入到室內。他們向救火队要一輛救火車，可是車子沒有来，他們就使用了他們自己花园里的水龙。这也沒有用，因为拿着水龙带的兵士的手立刻就連水龙头一起被子彈打断了。

我們事后才知道，电台前的示威队伍中又增加了被“学生正在那里被槍杀”的謠言引来的一大群人。据目击者后来的叙述，在首都的各处都曾有一些人拿着子彈給人看，并說：“这就是国家保安局的杀人犯們用来射击的东西。”他們手中的子彈竟被用来当作“証据”。

武装的守衛者是混合組成的：其中有国家保安警察、通信部队的人員、陆軍軍官、坦克兵等等。他們对于武装斗争并無准备，他們的人数少，特别是缺乏彈药。看到示威的暴动者完全包圍了大楼（唯一尚能通行的出口是汽車房的門，便装的人可以一个一个地通过；当时暴乱分子还不知道这个門也屬於电台）并且随时有被侵入的危險，他們要求增援。据通知已派出了两队士兵，每队六百人；可是他們一直沒有到达。有一次我們看到一輛滿載着士兵的卡車开进大街来，可是它被人群包圍住了，人們开始往車上爬，向士兵們要武器，或者干脆就把武器夺过去。內务部和国防部對我們的詢問和要求所給的回答都是不肯定的。我們要求派遣相当大量的步兵，以求仅仅用人数众多的压力，而不必使用武器就可以清除这条街道。我們不能了解为什么我們沒

有得到任何援助。

在同一段時間里，我們得知約瑟夫電話局、警察局、好几家印刷廠和其他公共建築也遭到了武裝襲擊。吉厄爾吉·法卡什不時從警察局打電話給我們，告訴我們其他已開始戰鬥的地点。當武裝戰鬥開始後，跟我們一起被圍困的代表團中的兩個學生代表要了武器，在守衛人員這邊與襲擊者一直戰鬥到天明。

十點鐘以後，進攻的力量增加了。電台被有步驟地包圍了；在街對面的屋頂上設置了火力點。射擊來自閣樓、煙囪，後來也來自窗口。過了一些時候，也有人從我們自己的屋頂上向我們射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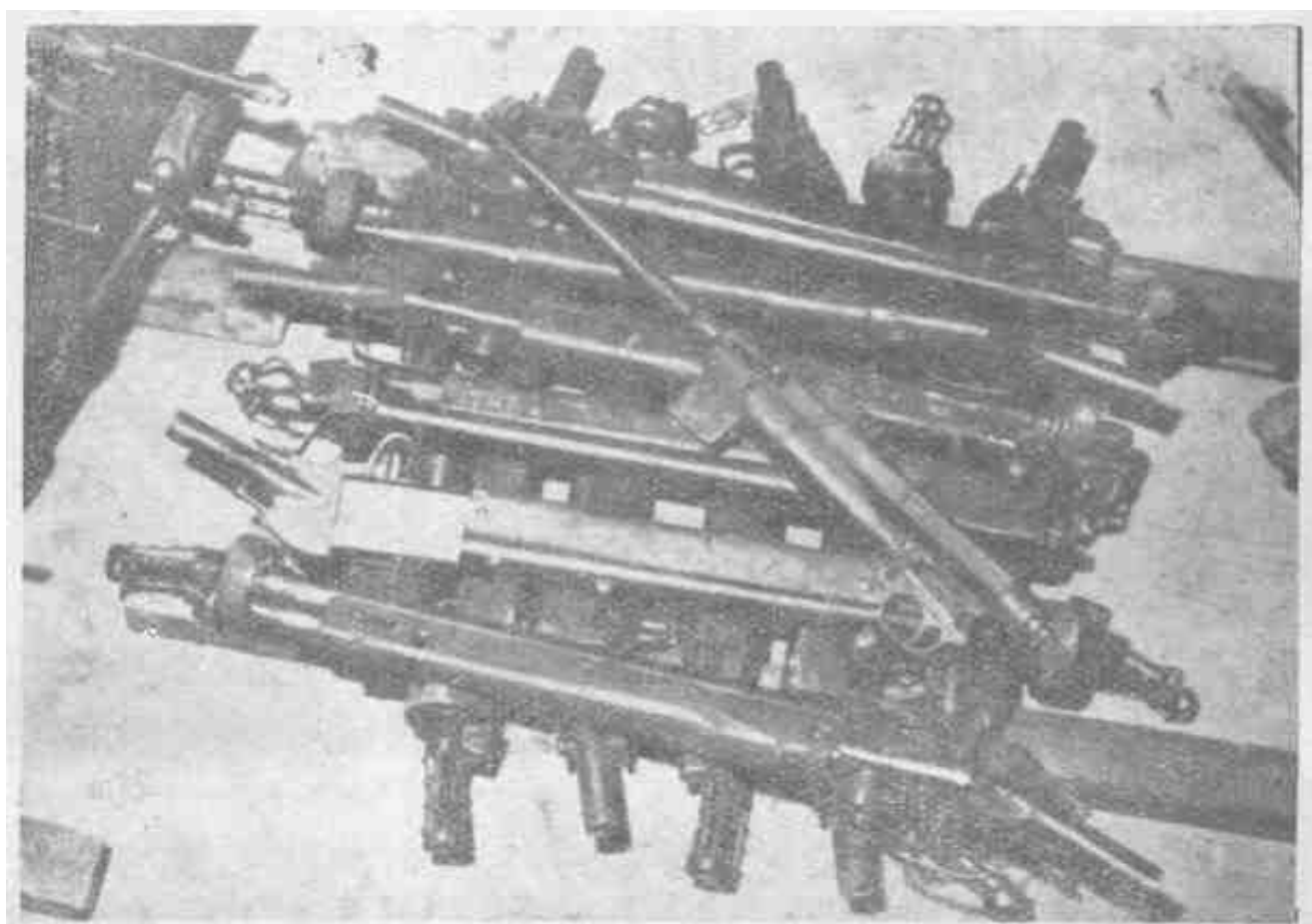
在戰鬥的過程中，我們的電話總機被子彈射穿了，使得樓內的電話聯繫斷絕了。廣播機是由哈爾塔伊和朗格兩人管的，我們只能派人把關於廣播的指示送給他們。在射擊不斷增加的情況下，這樣作並不是沒有危險的。然而，我們還是這樣作了好幾次，因為中央委員會送來了公報，然後又發來一連串的更正。（例如：“中央委員會已定於十月三十一日召開。”這後來又改成“即將召開”，然後又改成“立即召開”。）廣播節目也完全一樣地照計劃播送，一直到我們日常的結束時間。

午夜時，我們全都明白，我們所面對的並不是幾個法西斯分子的一次胡亂搞的、暫時的攻擊，而是一項組織得很好的、大規模的武裝行動。暴動人群沒有散開，使它散開的一切努力都未生效；已經不可能再等待了，於是守衛人員的指揮官向他的總部請示應該怎麼辦。在午夜後 35 分正，他得到了開火的命令。

陸軍上校費倫克·科諾克在命令宣布的時候到樓上



沒收的几种西方制手提机枪。



为了便于暗藏在大衣之内,这些西方制手提机枪的枪托都被锯掉了。

来。他建議不开火，并要求班凱夫人試探其他双方能同意的解决办法。他剛从外面来，他曾与在門口的青年談过話；他們只要求在扩音器中宣讀他們的要求——并且急于回家。最初，班凱夫人拒絕了这个建議，她說从五点半起情况一直是这样：每当我們同代表們达成了協議，街上的人群却不願意听从，因為他們是受其他别有用心的人所指揮的。然而科諾克同志反对战斗，他并不可怜那些从他們的安全隱蔽下向我們射击的人，可是他可怜那些挤在街上的沒有武装的青年，战斗将首先危及他們。班凱夫人和我們电台人員，以及在場的其他指揮官都同意他的这种看法。尽管看来毫無希望，还是做了另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努力。

科諾克同志再一次走到街上去，带了一个看来像是个工人的成年人和两个青年一起回来。班凱夫人个人承担了广播他們所带来的文件的責任；我們不再反对这个文件了，而他們也很随和。可是，甚至这次最后的努力也失败了，虽然这个代表团尽了他們的一切力量，尤其是那个成年的工人，他为了使人群退走，把喉嚨都喊哑了。

这一段过程是重要的，因为它表現了大楼的守衛者們如何作了一切的努力来避免武装冲突。群众中对国家保安局的敌对情緒是由謠言煽起的，而不是由于国家保安局本身的行动引起的。

清晨一时左右，指揮官們看到已沒有其他解决办法，就向他們的队伍發出开火的命令。

我們以为，只要街上的平民一退尽——这点不久就實現了——守衛电台的武装队伍就能很快肃清叛乱分子——因为原来設想他們的数目很小。可是事实后来表明他們进攻的力量竟远較我們的估計为大；显然他們也有充足的武

器和足够的后备力量，而在大楼中的我們的人却除了諾言以外什么也沒有得到。

三点左右，守衛者的处境变得很危急了。他們几乎沒有任何彈藥，只剩下很少的人。在大楼里有許多被打死和打伤的人；增援或者換防的人——因為我們被包圍了——沒有到來。我們的守衛者不斷向總部發出信號，呼呀說如果沒有后援他們就不能繼續守住电台了。總部一直答应給予援助，守衛者因而就尽力坚持下去。

黎明时，形势已經很清楚：在卜柔迪·山道尔大街的一翼已經守不住了。除了我們的某个領導者有时走出去打電話以外，我們呆在一間后面的屋子里已有好几小时了。電話所在的主任房間处在密集的射击之下。与外界的电话联系也难于保持。电台的領導者們共同決定到播音部（技术中心）去，以便尽可能坚持广播。10月24日清晨4点30分我們开始了正常的节目。六点以后我們出發到轉播台去，可是由于密集的射击我們有些人未能到达。播音部也在射击之下，但是火力不如卜柔迪·山道尔大街那边那样密集。七点一刻以后指示台也被严重地破坏了，从那里广播也只得停止。从那时起，广播是在城外的拉基哈吉进行的。八点鐘，我們重又接通了一次電話——据我所知，是同爱尔諾·格罗通的話——我們說明了我們將不得不在数分鐘內放弃电台。甚至在那时我們还得到增援的諾言。

九点鐘，还活着的几个兵士決定放下武器。他們几乎已經沒有彈藥了。他們到化妆室来同我們待在一起，我們給了他們大衣，等待着叛乱分子前来。播音部是設在走廊的尽头的，这样，我們就如入陷阱，而使得我們的处境很是危險。和我們在一起还有許多妇女，甚至还有些小孩（托兒所的孩子

們，前一天由于外面的人群而未能离开大楼)，这样就造成了一种惊惶的气氛。我們可以听见密集槍声，但是沒有人走近我們。我們害怕一旦叛乱分子进了这个狭窄走廊，就会扔过来一顆手榴彈，从而把室內所有的人都杀死。因此，班凱和賽奇決定我們應該出去，宣布我們願意投降。我們在楼梯上遇到武装的人，他們看到走下来的是电台雇員(杂役女工和技术人員)而又不認識班凱夫人和其他电台的领导人，就把我們圍住后，帶到街上，放我們走了。那些未能把他們的制服藏起来的国家保安人員則被扣留了。

这就是我們那一群人在10月24日早晨怎样离开了包圍下的广播大楼的情况。

襲击是怎样組織的

(N.I.叙述)

……为了讓他們說明他們的要求，在傍晚时分守衛者讓一个十人組成的示威者的代表团进来了。他們第一項要求就是必須立即把十六点要求排入广播节目。同时还可以听到这样一些含糊的要求，像：“这是人民的电台，所以，讓我們把它交給人民，”或者“讓我們来共同管理这个电台，”等等。

大約在晚間八、九点鐘，示威人群截住并焚毀了好几輛开过卜柔迪·山道尔大街和卡尔文廣場的汽車，这个事实足以表明这些人群咄咄逼人的气焰。攻击不断加强，守衛者的指揮官一再报告不可能抵抗住这种压力。可是每一次他都被命令既要擋住人群而又不許开槍。

尽管守衛者曾得到一些增援，情势却变得愈来愈緊張。十一点半左右，从卜柔迪·山道尔大街那边朝大門向

院子里打来一排枪。在院子里的一位少校和另外一位军官登时被打死了。即使这时，守衛者也并未以同样的手段进行报复。

后来，火力愈来愈猛烈。大楼上的彈痕可以看出射击是从好几个方向来的，从而可以証明武装的叛乱分子已完全包围了电台的所有五座大楼。在夜間，当我们被槍彈迫得从一間屋子逃到另一間屋子时，我們才明白我們遭到了来自周圍所有的樓房的射击。攻击者隐藏在卜柔迪·山道尔街的几幢公寓樓房中，还藏在国立博物館里、藏在森基拉伊街和博物館街一些房子的樓上。槍声的緊密甚至使示威者也吃驚了，我們可以看見一些惊惶失措的人从街上跑掉。

槍口上的閃光暴露了在一些樓房中的射击点。这种非常猛烈的射击整夜不断地繼續着。

早晨七点左右，攻击者开始从閣樓、从地下室或通过其他樓房滲入大楼，而到了十点鐘，他們就以有組織的手段占領了电台。

我們根据事件發生的过程断定，我們必須应付的乃是事先早已准备和組織好的一次有目的的武装攻击。攻击者的射击陣地安排得使他們差不多可以射击五座大楼中所有能够从外面达到的房間。

当射击开始时，我和我的几个同事正在普希金街的那座大楼里。射击愈来愈猛烈，我們不得不从一間屋子跑到另一間屋子去躲避子彈。从卜柔迪·山道尔街和普希金街拐角处的大楼那个方向来的攻击特別猛烈，因为这里可以打入花园，那里——据我們知道——有許多死伤。

早晨八点半，我們在播音室大楼的一間靠里面的屋子里被俘，和在大楼的这一部分被解除了武装的守衛者一同

被当作俘虏在粗暴的威胁和毆打下押往汽車房。①

俘获我們的一伙武装分子中大部分是年紀較大的人，他們摆出一种威胁的态度，显然是屬於犯罪的下流社会的。其中有一个外貌像学生的青年，他願意挽救我們，可是由于其他人的威胁态度而不可能。我們被带去跟集中在汽車房的五六十个被解除了武装的国家保安人員一起。另一个看来也像是个学生的武装分子从这种絕望的情况下挽救了我們。他走到我們这些平民（一共三个人）面前，說：“对不起，这不是我們所要求的，”說时指着躺在院子里的那些在夜間战斗中被杀害的人的尸体。在我們的請求之下，他用他的自动步枪对着我們，把我們引到地下室，从那里我們通过隔壁房子的院子逃出了广播大楼。

(N.N.的回忆)

主要的問題——假定这真是主要的問題——是电台所在地周圍發生的射击是什么时候和从哪一边开始的。为了推断这一点，我正在試圖編一个記錄事件發展的时间表。当然，我不能負責使每一瞬間都絕對准确，由于这一夜显得特別长，每一分鐘都發生着可怕的事件，因而，至少对于目击者而言，这些分鐘的重要性就被格外扩大了。但是，讓我們看看這張时间表：

五点半——电台前示威开始。

傍晚六至七时——从电台上面进行努力使人群安靜下来，从陽台或从开出街上的輕便載貨車頂上對他們講話；代表团的选出，武装增援通过博物館街那头的車房門到来。

① 費黑尔少校，武装部队的指揮官之一，在被捕之后在主任办公室內被毆打致死。

晚7至8点之間——与各大代表团的談判，从陽台上作鎮定人群的新的努力，利用洛松奇、吉梅什或者伊姆雷·納吉的影响的嘗試；通过窗戶对电台的侵入；靠卜柔迪·山道尔街的大門被砸碎。負責守衛的保安警察徒手地用体力将示威者从門口赶开。

晚8至9点之間——山道尔街方面的压力增加了，我們得知大楼从波洛克·米哈里广场方面也遭到威胁。催泪瓦斯彈在爆炸，門口的人群被用花园水龙抑制住，示威者投擲磚头、未爆炸的催泪瓦斯彈、还可能有装有汽油的瓶子被擲到二楼的屋子里；一間屋子里的家具着了火。保安警察扫清了山道尔街，直到普希金街和森基拉伊街拐角，在拐角处設了警戒綫。这一切的發生既未通过直接射击也未放槍示警，但是由于投擲来的石头，許多守衛者却受了伤。我不知道是否在示威者方面也有人受伤，如有也不知道有多少。

晚9至10点之間——新的軍隊增援到来。被从山道尔街赶退的人群試圖从波洛克·米哈里广场方面拥来，在那里压力加大了，已經可以听到槍声。根据接到的命令，武装部队只准鳴槍示警。兵士們說他們已經遭到来自博物館花园的射击。停在街上的一些汽車被焚燒。用来冲破大門的那輛輕便裝貨汽車被拖进院里。兩輛装甲車从博物館街方面开来，在其后示威的“步兵”向山道尔街故綫涌回来。装甲車恰好停在大門前被当为掩体，后来大門整夜遭到来自这掩体后面的射击。

晚10至12点之間——守衛电台的队伍所使用的唯一武器仍旧是催泪瓦斯彈和水龙。然而，街上的槍声却在增加。不过这时只能听到步槍和手槍声，攻击者沒有手榴彈、机槍和手提机槍。我們已經不时地听到自动步槍的射击声。我們

中間，國家保安局的馬格亞少校是第一個被殺害的。馬格亞走出門去，企圖勸導人群散開。他的手槍在槍匣中，不在手裏。人群中有一個人用槍把他打死了。當他被抬進來時，其他軍官檢查了他的手槍的子彈匣來判斷他是否曾開過槍。槍夾沒有動過。這是在十點半左右。據我所能記憶的，就是這個時候兵士們被命令向空中放槍示警。

不論怎樣，當時我們已經處於各種武器的不斷射擊之下是一個事實。射擊特別是發生在靠山道爾街的入口，來自裝甲車的後面。許多次人們企圖在射擊的掩護下用暴力沖進來。從波洛克·米哈里廣場的方向也傳來了猛烈的射擊聲，向博物館街樓面的射擊則是較短的排槍。我不知道當時森基拉伊街樓面的情況怎樣。我們不能走近臨近那條街的窗口，都退到靠院子的一面，大多數人避到班凱夫人的辦公室裏。

我們希望他們很快就會耗盡彈藥，情況在午夜就會平靜下來，這個期望並沒有實現。隨着時間的過去，攻擊者的火力不斷增強。十一點左右，手榴彈爆炸聲，後來一排排機槍和手提機槍聲，都能聽到了。

由於守衛部隊沒有開槍並且一般保持着守勢，因此攻擊者得以毫無阻礙地占領了最有利的陣地。於是，在卜柔迪·山道爾大街那邊，他們在街上布置了射擊陣地。到了十二點左右，我們已被完全包圍住了，並且處於愈益猛烈的射擊之下。山道爾街也開始不那樣擁擠了，那些不想拿起武器來的示威者散開了。

真正的、武裝的、有組織的對電台的攻擊在午夜時分開始。從那時以後，即使要從博物館街那邊的汽車房的門離開也困難了。絕大部分是婦女的一群人在十二點半仍舊得以離

开,其他的人則被陷在樓中一直到电台投降。

我認識到“誰首先开槍”這個問題的容易引起爭論的性質。关于电台周圍的战斗有大量含糊而別有用心的謠言和关于暴行的傳說被散布着。我知道在当晚八點鐘已經有各色的人和一队队坐着卡車的人在首都到处跑来跑去,叫喊着:“国家保安人員在电台周圍屠杀人民。”那些散布这些謠言的人的明显意圖是想把更多的人群引到电台去,煽动他們的忿怒直到必然發生流血事件的程度。簡言之,这就是反革命分子所干的事。守衛电台的部队接到总部的开火命令是在12点半。在12点半时,示威者設法派了另一个較大的代表团到班凱夫人的办公室里来。在那里士兵們通知代表团他們已接到了开槍的命令。他們要求代表团回去报告在20分鐘之內守衛电台的部队就要开始同攻击者战斗了。我还記得代表們的蒼白和惊异的臉色。他們解釋說他們不能阻止攻击者开槍,他們影响不了他們。班凱夫人后来談到,代表团中两个成員曾声明既然他們在街上已無能为力了,他們願意留在大樓里和士兵們一同守衛电台。

虽然我不是軍事专家,我以一個外行的身分也能証明对电台所采取的軍事行动是很有准备的。指揮这次行动的那一个或那几个人对于这里的地形很清楚,并正确地指定了最好的射击障地。在这里各色各样的修建工程形成了一系列極端复杂的走廊,可能在电台周圍战斗着的絕大多数人,在这許多大樓所形成的迷魂障中,并不知道應該如何行动,和應該占据哪些地点来作为主要的障地。可是領導者們却能够根据事前精密設計的軍事計劃来發布命令。他們所采取的战术是:把守衛者逼退到愈來愈小的圈子里,或者,更正确地說,使守衛电台的部队变成許多愈來愈小、愈孤立

的单位。这种战术是成功的。晚間，包圍从邻近的房子开始，到了半夜以后，已經在屬於电台的大樓的樓上和屋頂上取得了射击陣地。从大樓的一部分通往另一部分的过道和走廊都一直被置于火力之下，楼梯也是一样，这样守衛者就不能从一層樓到另一層樓。叛乱分子显然拥有無限数量的武器和彈藥，也就是說，他們的供应是不断地以有組織的方式补充的。我們在电台里的人从十二点半起，也就是从包圍开始时起，就缺乏彈藥。我可以断言，包圍者的軍事指揮比守衛者的更統一，更有預見。因为守衛的部队除了一部分增援的国家保安警察外，都是从各种組織中招募来的。足以表現守衛方面的軍事上的弱点的就是他們仅仅“保全”了大樓本身，但是——不願一些外行人（例如我自己）的一再建議——却未作任何努力去占領屋頂，更不要說邻近的房屋了。換句話說，他們讓他們自己——我們讓我們自己——被驅入了一個陷阱。

电台守衛部队一位指揮官的报告(摘要)

我在下午三点鐘和一連軍隊一同到达卜柔迪·山道尔街的电台大樓。

在游行队伍通过的全部時間中，大樓里一直是安靜的。卜柔迪·山道尔街上第一批示威的人群大約在六点或六点半时出現。人群愈來愈大，也愈來愈咄咄逼人。尽管我們一再警告，他們并未离去，因此，我們开始形成一个“楔子”并使用催泪瓦斯彈来驅散他們。后来我們鳴槍示警，有两次赶光了卜柔迪·山道尔街上的人。但是看見我們只是向空中放槍，他們又跑了回来，从此就拒絕讓步。

第一陣实彈的散槍是叛乱分子从卜柔迪·山道尔街發

出的，几乎同时在七点三十分也从国家博物馆方向经皇宫花园发射过来。这些枪是瞄准楼上的窗口的，当时那里有许多人站着。

这第一阵枪械的攻击造成了几个死伤。到我们接到开枪的命令时，被枪杀的守卫者已在二十人以上。

我们射出猛烈的排枪的结果，街上又空了一阵，但是到这时对面的房子和屋顶已被占领，我们遭到来自这些地方的射击。不仅在卜柔迪·山道尔街上有机枪扫射，在森基拉伊街的屋顶上也有……。步兵武器的射击一直继续到清晨三点钟。然后有一阵暂时的平静。从皇宫花园的围墙侵入的叛乱分子开始向大楼的内部进攻。剩下的守卫者被迫退入地下室。我们在那里一直呆到星期五早晨。星期四夜里大楼受到坦克的攻击。在索里莫西中将指挥下的政府的装甲部队在早晨 6 时夺回了大楼。

在播音室大楼里，叛乱分子打开了橱柜，搜劫了办公室，带走了贵重的技术设备。花园里和警卫室的地板上都散布着前几天的战斗的遗迹：死尸、军服和武器零残断片、成千公尺的录音带和破碎的留声机唱片。

下午 3 时，遵照上级命令，我撤退了增援的守卫者，把大楼移交给一个由道查步兵军官学校学生组成的政府部队。

K.N.少校

在袭击播音室的过程中陆军少校 考伏契是怎样被杀害的

(裴多斐军事学院讲师 Z. E. 上尉叙述)

晚间 10 点左右两辆匈牙利坦克到来了，其中一辆在播

音室的大門口停下来，正堵住大門。这以后，大約有一小时到一小时半相对的平靜（不时还听到槍声和爆炸声）。我个人不知道为了什么緣故，这輛坦克在 11 点半左右离开了它在門口的位置。这时街上的人群开始涌进来。当时我們站在門道里的大約一共有十个人，冲上前去拦住他們的路，赤手空拳地，并未使用武器。那时我已經看到站在前排的两个平民手里拿着自动步槍。其中一人立刻向我們开槍，站在我旁边的考伏契少校就被槍杀了。看見杀害了人，人群突然停住了，两三个平民走进来，把考伏契少校抬起来搬到播音室院子里的一間小屋里，把他放下。当考伏契死去时（由于打在头部的一槍他是立即死亡的），在国家保安人員中已有几名受了伤（他們部分为石头所伤，部分为槍彈所伤）。在 11 点半左右在后面博物館那一边，也有平民在开槍。对播音室的有組織的圍攻就在这时开始，一直繼續到早晨九点半。必須承認，从軍事角度來說播音室的防禦工作是糟透了。在播音室的地下室里有一道后門沒有把守，叛乱分子后来就从这里涌进来。正确的防禦應該要求占据周圍的楼房。可是这些楼房却落入了叛乱分子之手。他們从对面和附近的楼房把播音室全部大楼置于火力之下。显然那些組織对播音室的攻击的人对于現場有透徹的了解。叛乱分子有大量的武器，包括机槍和成堆的彈藥……

国立博物館在对电台的圍攻中的地位

如目击者所敘述的，在 10 月 23 日电台被襲击那天，下午六点半时已有許多武装的人侵入了博物館的花园。守門人守住博物館在卜柔迪·山道尔街上的門，虽然武装分子几次企圖用暴力冲进去，都被他擋住了。在他执行任务的时

候，他还遭到从花园对面他自己的小屋窗口来的射击。午夜前他曾能守衛住这所建筑，但在午夜后，通向博物館街的博物館后門被武装分子打开了，这所建筑遂告失守。这批武装分子可能是由熟悉該地的人率領的，因为他們直接走上后楼梯，一下子就到了那隔离开了的考古学圖書館，而那間屋中的窗口正好对着广播大楼。就从那里，武装分子开始向电台射击。因此，反革命队伍把这巨大的建筑物当作了战略据点，从而也就对博物館的破坏应負直接責任。事件之后，在考古学圖書館，在各个陈設室等地，搜集到了成筐的子彈壳、榴彈导管和手榴彈。在其中一間屋里还找到了裝滿了汽油的两个瓶子。在面对着电台的一扇百叶窗上挖了一个洞，作为一个火力点。在那里也有成堆的各种子彈壳。

10月24日清晨，一支穿着匈牙利軍裝的新的队伍接管了这座建筑物。下午一点半鐘就發現这座建筑物已在燃燒。由于在建筑物周圍进行的战斗，消防队到了次晨才能开始工作。但是由于持續的巷战同火焰的斗争仍遭到了巨大的困难。由于激烈战斗，消防队曾經几次被迫撤离。还有狙击手向消防队射击，阻止他們的工作。

到了星期四(25日)夜里，消防队的英勇努力控制了火势。而同时，那举世聞名的矿石珍藏，古代稀有生物的珍藏，和那受欢迎的非洲展覽却已遭破坏；無价的珍藏和圖書都已付之一炬。

襲击約瑟夫电话局

目击者 O.K. 的报告

10月23日，我在下午6时30分回到了家。在街上，我遇到了异常之多的人，我还注意到在費倫克和約瑟夫大街上越聚越多的人群。在巴罗什街和約瑟夫大街拐角的地方，多得出奇的人到处站着，大声地談話。同平时情况比較起来，这一情景很是突出。我离开了人群回家，是因为我在大学函授学校答辯定于10月25日和26日举行。我在家学习到七、八点，就到大街拐角的一家飲食店去买啤酒。我没有买成啤酒，因为就在那“第32团”广场的地方我撞进了一大群人；“文学报”的特刊正在發售，大家都在搶着买。最后有人从报童手里搶走了剩下的几份，然后發給聚集着的人。那份特刊只有一单張，可是到如今我还不知道它到底刊登些什么内容。后来我又回家了。在11时到12时之間，我的邻居 P. J. 叫醒了我和我的妻子，我們就去到 P. J. 的公寓里。他的房子的两扇窗子面对着霍瓦特·米哈里广场。我們就守着那两扇窗子，观察着在我們眼前發生的事件。

起初，我們只看到30到40个武装的人跑来跑去。他們制止并扣留了各种途經此地的車輛。

也曾有这个或是那个司机拒絕開車，于是他們就被赶开。一两个反革命分子乘一輛車向不同的方向駛去。这样地被扣留的車輛有几輛小轎車和卡車，还有两輛救护車。从11

点鐘起，电话局就已被包围了。到了早上1点鐘，有三部卡車开来，载来了戴着灰色鋼盔的武装平民。每部卡車滿載着一个挤一个地站着的40个左右的人。原来已經在那里呆了一些时候的那些人迎接着新来的武装人員，然后指揮他們走向电话局的大門和那矮空花的鉄門。武装的人員就这样平均分配到这两处。出現了一面一面的国旗，也可以听到种种不同的口号。大群的人开始挤在那两个門口。这种混乱情况大約繼續了一个鐘头，其間我們已經听到了一个反革命分子說：“扔一顆 Tritwo，門馬上就会开”。同时，一輛黑色的 BMW 型轎車出現了好几次；大約每10分鐘到15分鐘就开到霍瓦特·米哈里广场一次；停一下就經過福托街开走，然后又开回来。它总是略停一会兒——很可能是为了讓坐在里面的人發出指示——然后就又开走。在那輛車上挂着一面大国旗。电话局大概在清晨2时被反革命分子占領。在这占領过程中，我們只看到两名战士和一名警察被解除武装，被朝福托街送走。此外，在我們看来是被从电话局赶出来的五名文职雇員也朝福托街方向走去。后来，那三部卡車中的两部又滿載着武装人員，經巴罗什街向卡尔文广场开去。这样，电话局就由大約40个武装人員繼續占領着，此外还有那原来就在街上的人，他們繼續制止住过往的車輛。

10月24日清晨5时左右，一小队国家保安人員打了几槍就夺回了电话局，并且还繼續守住了三、四天。这一队国家保安人員不仅守住电话局本身，也維持了广场的秩序。反革命分子不分昼夜向电话局进行了分散的攻击。他們的集結地点在基斯塔秀街的莫特拉飯店的一角和福托街上的一块空地。他們八个人或十个人一組从集結地点向电话局射

击，每次約一小时。但是保安警察并不反击，武装反革命分子也就从福托街撤去。

10月25日下午4时，两队反革命分子又开始从上述两个集結地点向电话局射击。每队有一架德国造“闪电”式机枪，消耗了两箱子弹。然后他们也从福托街撤走。这个作法一直繼續进行着。政府解散保安局的队伍时，这一批保安警察由带着臂章的士兵接替过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一队士兵也經常遭到反革命分子的攻击。在霍瓦特·米哈里廣場上有一个人在战斗中打死了。他跳上了一輛坦克，打开了油箱，可是电话局門口的一个守衛人員一槍就把他打死了。在基斯塔秀街上一个女人也被打死了。是誰打死她的，我不知道。在第32团廣場上躺着一个保安警察和两个平民的死尸。在攻击“共和国廣場”的市委大楼的时候，装备着机枪和手提机枪的約50到60个武装人員从福托街走过来，从約瑟夫街向着拉科西廣場方向走去。

* * *

向电话局的进攻是和向广播电台的进攻同时进行的。战术也一样，都先有一群被引入歧途并且激动的人，被引导着在将要遭受攻击的建筑前面和四周示威，这些人群又都是早已就組織好了的。小股武装人員就利用这种騷乱的机会来制止住并且征用各种車輛。同时，有組織的武装人員就在将要遭受攻击的建筑四周进入陣地，然后在午夜前——几乎是同一时刻——开始向电台和电话局排射。从这些事实看来，很明显这次暴动乃是有組織的并有軍事准备和指揮的。

布达区暴乱分子的领导人

布达区的那些股叛乱分子也是由反革命叛乱的军事领导人所组织的。调查证明,10月24日他们配置了下列队伍:

1. 大布达组,
2. 罗查敦布组,
3. 塞纳广场组,
4. 盖勒尔特山组。

“布达队伍”是由一个人民军复员尉官、名叫埃曼努尔·卜特科夫斯基的人指挥的。他是由一个自称“革命同盟”的中心机构任命来担任这一职务的。他的付手是前霍尔蒂陆军尉官丹尼斯·考伏契。卜特科夫斯基的对手之一是一个名叫凯末尔·埃克林的南斯拉夫移民,领导着塞纳广场的一个组。塞纳广场组的另一个头领是亚诺什·萨波。埃克林和萨波都属于杜道什的“民族革命委员会”指挥的一个组织。

具体小组的活动范围都划分成“区”。每一个“区”里有80到350个人的一个队。每一个“区”有一个指挥员和一个副指挥员。为了适应变化中的情况和由于具体小组之间及其首领之间的敌对和分歧,这一建制后来也有所改变。

“盖勒尔特”山的一组同拉科西街和博物馆大街的叛乱分子队伍有着联系,从而使它们能够把这一地区置于协同的大力的控制之下。欧布达的一组同样也同罗勃特·卡洛

里大街上的叛乱分子队伍有着联系。

布达区最重要的队伍就是在塞納廣場的那一組。它的活动范围从馬格瑞特桥一直伸展到吊桥的布达一端，包括城堡山的一大部分，維尔梅澤地区，法罗什馬約尔和馬尔西班牙額依廣場。

在暴动开始之前，布达小組只配置了約 200 个有过訓練的武装人員，但据說两天之內就已增加到 1,200 人。他們是通过不同的方法收到以及部分自行取得他們的武器的。10月24日他們在馬格瑞特桥附近用下述方式取得了武器：他們在两个武装“軍事巡邏队”陪同下制止了开近該桥的几輛軍用卡車；接着一声笛响，穿着便装的武装叛徒就冲向卡車，把他們的槍支对着卡車中的士兵并解除了他們的武装。通过这种方式夺取的武器都运到他們在塞納廣場的基地。

發生在10月24日的这一具体行动是由丹尼斯·考伏契本人指揮的。他向在貝姆兵营值班的D少校提出要求“至少 20 名到 25 名軍士”来协助这种行动。为了使他的要求起作用，他允諾說：“如果你肯帮我这个忙，少校，我可以保証到了明天你就不再是D同志，而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眞正紳士了。”（D少校拒絕了他的建議。）無庸置疑，参加到暴动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并不願意那些归霍尔蒂分子及其走狗再一次作为“紳士”騎在人民的头上。然而，其中許多人却落入了这一圈套。

同塞納廣場叛乱分子的談判

10月27日，D少校受命同塞納廣場的叛乱分子接触，就他們的投降进行談判，允許那些放下武器的人可以自由离去。D少校首先同卜特科夫斯基和丹尼斯·考伏契进行

联系，并在他們的陪同下去找塞納廣場的叛亂分子。卜特科夫斯基和丹尼斯·考伏契是以“革命同盟”代表的身分參加談判的。

当时，叛亂分子的斗志已經大受挫折。那些抱着善意參加进去的人中，日益扩大的一部分对于这次暴动的真正目的和对于他們的真正首領开始怀疑，其中有大量的人已經开了小差。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看到进一步流血沒有用处，还由于相信已經指揮着政府新成立的武装队伍的貝拉·基拉伊那一組会不久就占了上風，因此卜特科夫斯基和考伏契接受了可以自由离去的保証并支持投降。他們可以尤其放心地这样作，因为政府的武装部队的各部門——也就是貝拉·基拉伊和他的同伙們——已經在把那些放下武器的人作为“国民警衛队”队员而重新武装起来。

据D少校报告，塞納廣場小組的大部分首領都准备放下武器。但是埃克林和他的同伙却宣布他們接到“上級領導人的具体指示要繼續战斗”。在埃克林和卜特科夫斯基之間發生了冲突。后者宣称只有他有权向布达区的队伍發指示。另一方面，埃克林宣称卜特科夫斯基不能够給他命令，因为他“通过西方大国駐布达佩斯的公使館接受他的指示”。埃克林甚至还指名說出他接受指示的那三个公使館。他宣称那些公使館向他保証过：“到了明天，援軍就要从西德到达了”。他的小組还希望联合国軍的到来。埃克林还宣称說，他們不承認伊姆雷·納吉政府——D少校就是代表这个政府来进行談判的。他告訴D少校說：“这整个政府里的任何一个部长，甚至于貝拉·考伏契，對我們都沒有任何用处，因為我們已經有了适合各部部长职务的人了”。

塞納廣場的整个“參謀部”都一致不承認伊姆雷·納吉

政府，但是他們大部分都对埃克林另組政府的計劃提出抗議。

投降談判尚未結束時，暴動的人就已經有四分之三放下了武器，並且趁機自由撤離了。那些把希望寄托在來自西方的援軍到來的人則繼續戰鬥，並且其中一支隊伍還違反了作為談判基礎的停火狀態，而向前來運送蘇軍傷員的一支蘇聯巡邏隊和一支蘇聯軍醫隊開火。但是，蘇軍並沒有對這一挑釁進行報復。暴動者繼續解除武裝。學生們把他們的武器交到馬提亞什教堂旁的學生寄宿舍。在托洛格托街工會學校附近占有陣地的暴動者也放下了武器。貝姆廣場兵營的部隊清除了塞納廣場小組的基地。

停火及其後果

西方所允諾的援軍——埃克林曾強調即將迅速到來——確實到來了。把從監獄中釋放出來的政治犯和普通刑事犯的一大部分武裝起來並且指派到各個不同的暴亂隊伍中去，這對於反革命分子來說比較那些出自善意的學生是更為適合和更為“可靠的”援軍，儘管那些學生對於把青年人引入歧途這一目的是有用處的。然而，對於埃克林小組最重要的援助還是伊姆雷·納吉政府的“停火政策”，這一政策實際上意味着向暴亂者投降。其後果是：在10月28日下午，由貝姆廣場兵營派去的軍事守衛人員由暴亂者在塞納廣場的基地撤出來，埃克林小組重新佔據了那一基地，從而使埃克林—薩波隊伍能夠毫無阻礙地恢復了活動。

隨後，埃克林和他的同伙就到貝姆廣場兵營去締結一項關於停火的協議。埃克林是這樣開始他的談判的：“我們的談判還是簡短些好，因為如果我到晚上11時不回去，我

的人就要向軍事部隊開火了”。他宣稱條件應由他們來專斷，因為停火“是政府請求的，而這是政府軟弱的一個標志”。

停火的主要條件之一，就是暴動者應自行改編為“國民警衛隊”——這是根據馬勒特的呼喚確定的。雙方就巡邏隊的組成展開了爭論。軍隊代表要使每個巡邏隊各包括一名暴動分子、一名軍士和一名警察。另一方面，埃克林則要求每個巡邏隊應各包括兩名暴動分子，一名軍士或一名警察，也就是說他的人應占多數。最後雙方在對一的基础上妥協了每隊一名暴動分子和一名戰士，或是一名暴動分子和一名警察。根據埃克林的要求，協議中還規定：由國際紅十字會運給他們的食物和醫藥應直接、無阻礙地送給他們。

10月29日，那人數減少但卻由各種西方製造的自動武器裝備起來的塞納廣場隊伍，重新進入了他們早些時候被迫放棄了的射擊障地。隨後，埃克林和薩波又以他們小組的代表的身分去到貝姆兵營，要求宣布停火協議無效。埃克林解釋說，他曾訪問過西方公使館之一，在那裡，由於他接受了這種停火條件而受到了“嚴厲指責”。薩波則提議，作為補充條件，在停火之前沒收的武器彈藥應該交還他們。新的協議沒有達成，但埃克林的隊伍卻制定了逮捕共產黨干部的廣泛計劃，並開始執行。埃克林—薩波小組佔據了摩諾什街的国家保安局的兵營，並把他們所捉住的任何国家保安人員和共產黨干部帶到這一基地。卜特科夫斯基的隊伍把費厄街的軍事法庭和監獄大樓作為它的總部。11月4日，蘇軍從摩諾什街兵營解放了150名国家保安人員和共產黨干部，從費厄街的監獄中解放了107名共產黨干部和幾百名国家保安人員。蘇軍的干預制止了反革命隊伍完成他們的恐怖計劃。

反革命分子在医院

裴多斐·山道尔街医院 中的反革命中心

11月17日，一个民兵支队在裴多斐·山道尔街医院的防空室中发现了约有180人的一群品质可疑的人。其中有28名曾因各种罪行被判处徒刑的人、经常出入于“体育场”咖啡馆和“白牛”茶室的妓女、丑名四溢的终日泡酒馆的人物和两个外国公民和许多堕落的少年。^①

在裴多斐·山道尔街医院的一个防空室的太平门通道里，发现了一架伪装了的無線电收发报机。这架电台调整的对象是薩尔茲堡，正在同自由欧洲电台联络中。离太平门不远的一间房间里，发现了油墨的痕迹，可以想像曾在这个地下室里印刷过煽动叛乱的传单。在进一步的调查中，又发现了四架油印机，两架打字机，一架有斯拉夫字母的打字机，油墨和其他油印器材，这些都隐藏在医院病案底下。在同一房间里还存放有大约450公斤油印纸张。

反革命在这个防空室里编印煽动叛乱的传单，隐藏在

① 这些刑事罪犯中，約瑟夫·奈美特曾因搶劫、盜竊等罪被判刑十二次；伊斯特万·梅索洛什是盜竊犯；伊林·雪略西是貪污偽造犯；貝拉·摩約洛什和本亞明·黑尔采格是貪污犯；佐尔坦·費瑞什是盜竊欺騙犯，妓女爱尔捷貝特·安得拉什是偽造盜竊犯。逃犯約瑟夫·哈尔雷特有廣泛長期多次判刑的記錄。

这里的人就是用来散發傳单的。这些傳单印着形形色色的签字。鼓动罢工行动的傳单，是假托新佩斯和柯班雅青年，切佩尔工人，建筑工人和鋼鐵工人的名义散發的。民兵們就是这样在这个医院里發現了并且清除掉佩斯区的反革命宣傳中心之一的。

但是，这里的并不仅只是一个宣傳中心。

在这个医院的防空室中，發現了龐大数量的衣服，都是在搶劫服装公司的时候搶来的；而据証人的說法，盜劫来的商品已有很大一部分被迁移走了。

隱藏在医院里的这一伙人还在那里設立了一个軍械庫，分發武器和彈藥。他們利用所有紅十字伪装的車輛，向首都各区运送武器、食粮和煽动叛乱的傳单。这些武器的一部分是在医院对門，裴多斐·山道尔街 19 号的一家汽油零售店里發現的。那里藏有一些冲锋槍，手榴彈，步槍和一支小手槍。另一部分藏在临近的果拉伊街10号装修公司里，儲存在公司的礼堂的舞台底下。在这个儲藏的地方，民兵發現了 142 支装好子彈随时备用的冲锋槍、4 支自动步槍，79 支步槍、14 支手槍、装好拉簧帽的手榴彈約 350 顆以及 450 公斤彈藥。

在調查中發現的綫索进一步引导到对街的一个学生寄宿舍，在那里發現了一些丢弃了的軍装和一些搶劫来的衣服。在这寄宿舍后面，巴罗什廣場 19 号的楼房里，發現了大量的炸藥、武器、差不多 1,500 公斤油印紙張、打字机和油印机。

裴多斐·山道尔街中心的一个武装支队打通了几道牆壁，把裴多斐·山道尔街医院同巴罗什廣場19号联接一气。巴罗什廣場 19 号乃是所謂巴罗什廣場抗击組的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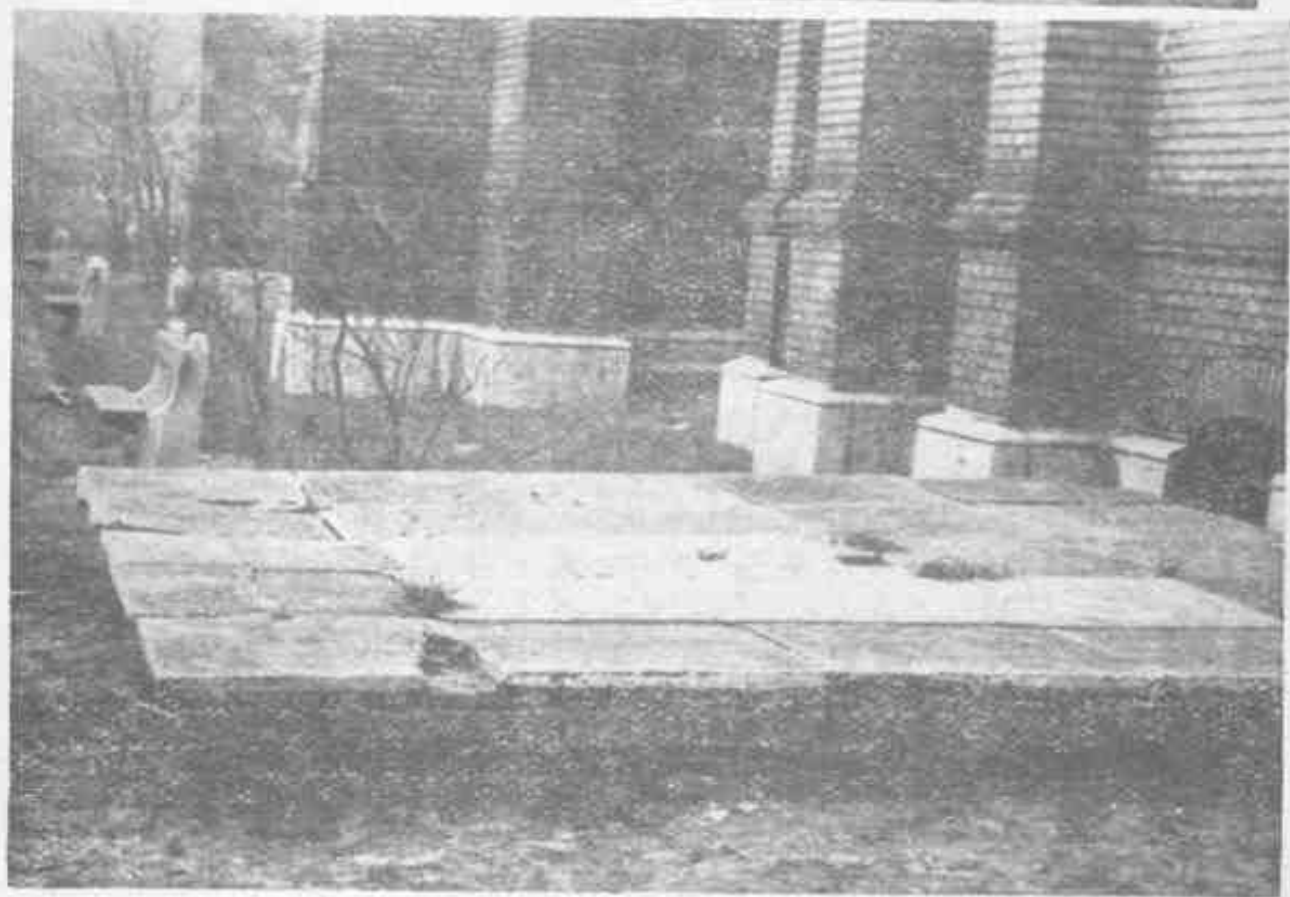
反革命小組還盤據在果拉伊廣場，在朗德雷爾·叶乃街和慕拉額伊依街拐角處的一個工人寄宿舍里，和朗德雷爾·叶乃街和道查·吉厄爾吉街拐角的一家旅館里。這一小組的組長兼軍事指揮是一個自稱陶特中尉的通信兵軍官。他的副官們都是些囚犯和前箭十字黨黨員。例如其中之一的米哈里·帕費爾就是一個有着長期犯罪記錄的酒徒，他的任務是在小組活動區域之內搜捕和消滅共產黨員。

* * *

反革命的分支中心還設在其他的醫院里，其中包括烏聖亞諾什醫院和布達凱西·科拉額伊醫院。同裴多斐·山道爾街的一組一樣，在布達凱西·科拉額伊醫院的一組也配有一些盜竊得來的轎車和卡車，由一個降職而又被開除的陸軍軍官貝拉·洛松奇負責指揮。暴動者從裴多斐·山道爾街醫院領取偽造的證明文件，使他們可以很容易地乘坐繪有紅十字標志的車輛滿城通行。他借口運送傷員，實際上卻從醫院的廚房運出食物，從設在汽油零售店內武器庫中運出武器彈藥，從醫院地下室運出混淆視聽和煽動叛亂的傳單。

一個反革命的虐待狂者的面目

11月1日，實習醫生伊洛娜·季捷拉·陶特當了裴多斐·山道爾街醫院設在道蒙科什街的臨時附屬醫院的院長。早在暴動的初期，這個青年女醫生搜羅來了幾個武裝人員，他們在一個名叫米克洛什·吉昂吉西的，有過犯罪記錄的布達佩斯居民率領下，在鄰近幾條街上“獵捕”共產黨員。（在解放後，吉昂吉西作為戰犯曾坐牢三年半。）調查表明，被反革命分子混稱為“彼里”的吉昂吉西和他的同伙，在11



这是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非熟练工人伊斯特万·科尔拉。尸体被隐藏在圣道蒙科什教堂门外一块石板底下。

月18日夜晚阻截住了看到他們在街上張貼傳單的工人伊斯特万·科尔拉尔。他們惧怕这个工人会向警察局告發他們，于是决定弄死这个無法自衛的人，而伊洛娜·陶特则坚持要她自己干这些事。首先她用含氮乙醇使她的受害人入睡，然后在受害人已經失去知觉之后，把苯注射到他的頸靜脉里。这个女杀人犯由于神經緊張沒有注射得好，因此預期的立即死亡并未实现。她于是叫她的同伙来帮忙。米克洛什·吉昂吉西和費倫克·琼奇用脚踩那受害人的脖頸，企圖把他縊杀。当他們發現那受害人还活着的时候，他們就把他拖到隔壁一間屋子里，由那个女医生在他喉嚨上刺了几刀。

这些虐待狂的杀人犯把他們的受害人裹在一張毛毯里，抬到道蒙科什街教堂，把他埋在靠教堂右手边的一塊大石板底下。这一可怖的謀杀案后来終於水落石出，伊洛娜·陶特和她的同謀犯也落入了法网。

* * *

裴多斐·山道尔街反革命分子小組甚至在11月4日之后还繼續他們的活動。他們印刷反革命傳單，出版一份由新聞記者季烏洛·欧貝尔索夫斯基和作家約瑟夫·葛里所編輯的非法的煽動性報紙，并且还企圖謀杀造型艺术家拉斯罗·亞季查，因为他反对反革命活動，結果使他受了重傷。

医院中的火力点

在余略伊路上的几家医院和拉科西大街上的罗庫什医院里，暴乱者建立起射击陣地来反对协助鎮压反革命的苏軍。他們在波开伊·亞諾什兒童医院及其附近的廣場設置了机槍据点，向苏联装甲部队进行射击。

武装的反革命分子也占据了灌木街的科拉額伊医院的屋頂，从那里用火控制了邻近地区。在搜查这所医院时，发现了大量的武器和彈藥，还发现了反革命分子从服装公司搶劫来的貨物。

11月3日在科拉額伊医院的病人N.J.叙述过叛乱分子如何集中到病房里收听自由欧洲电台的广播，并且开了一个軍事會議，討論怎样最好地执行通过自由欧洲电台收到的指示。

在余略伊路和聖奇拉季街拐角上的哈伊納尔診所也設置了射击陣地。病人N.B.就那里發生的事曾叙述如下：

“10月22日，在这个診所工作的朝鮮学生集体离去了。我們不曉得导致这一步驟的原因（实际原因是当时占上風的以反对朝鮮学生为目的的民族主义的反革命煽动——原編者）。10月23日，一个不認識的人在医院工作人員的一个集会上講了話。自那时起，S付教授就停止执行他的工作任务，并同病人断了联系；据我看，他就是那时在医院中进行的武装陰謀的实际組織者，而其精神主宰則是B付教授。

“大約在武装暴乱的第三天，許多面目可憎的生人来到医院，都領到了白色外衣，并且留在楼里。女人也常来——据我所知是来自科尔文巷——并假装病人。其中某些偶然也过夜，但总在次日就离去。

“苏軍遭到了来自医院的五層楼的射击。医生和工作人员的宿舍都在五楼。我的印象是医院里的叛乱分子同隔壁楼里的叛乱分子是配合着的。他們一般同时从两面来向苏軍开火。这两个攻击組之間的配合也可以从这一事实来推断；S付教授曾一度很着重地警告病人不得在病房窗口附近

燃点烟卷。想来划洋火可能是一个约定的信号，因为在病房中吸烟原本就是被禁止的，也不符合习惯”。

* * *

报告，调查，和目击证人都证明：叛乱分子有意地滥用红十字标志，用它来掩饰他们的敌意活动和抢劫。他们时常把医院当作武装反抗的场所，并把医院变成窝藏抢劫来的货物的仓库和反革命的中心。

暴乱集团在大陆飯店

大陆飯店的对面是第七区的陆军新兵站。值班军官从10月23日起日夜都留在站上。

站上的负责军官之一V.上尉对当时发生的事曾描述如下：

在10时进攻电台之后，我們第一次注意到卡車在向匈牙利浴堂运送武器。（这一浴堂就在大陆飯店間壁。）在第一批卡車到达之后，非武装人一群群地随之而来，并且在几分鐘之后装备着武器又离开，向着电台方向而去。浴室位于烟草街，这是一个较为狭窄的地区，因此那匆忙地設立起来的武器貯藏所能够很容易地免于受到攻击。运送武器和武装人群的工作从那时起就一直在进行。担任运输的車輛不仅仅是卡車运输公司的卡車。在第一个晚上，我們就已經看到一輛繪有紅十字的車輛，一次又一次地停在烟草街和卡青齐街的拐角，和烟草街和西普街的拐角，向聚集在四周的人群散發彈藥和武器。

新成立的武装小組的粮食供应也很快地組織起来了。从10月24日起，他們都定期得到食物和饮料的供应。

然而，叛乱分子也还自己設法照顧自己的需求。25日黎明，装载着16个武装人員的一部卡車开进了尼奥尔街。新兵站的一个支队向他們进行了一次突襲，抓到了几个俘虏。被抓的人里有一个是索伊莫尔的居民托馬什·宾德雷

尔，他以前曾因盗窃罪被判过徒刑。被抓的人都是喝得醉醺醺的，每个人都穿着三、四条袜子，新鞋，新上衣，新内衣等等。他们甚至还为将来准备了存货。卡车上还找到了尼龙制品，手套，围巾，小孩手套，便帽，包龙布上衣，大衣，鞋子和靴子。新兵站上的部队也发现了一大批果酒和白兰地。

叛乱分子不仅利用了匈牙利浴堂，还利用了罗库什医院和罗库什教堂来作武器库。向这些地点运送武器在暴动的头几天就开始了。罗库什教堂的尖塔被用作观测据点。罗库什教堂处在一个战略地位，它那古老坚厚的墙壁可以用作遮蔽，附近地区很容易从它的尖塔上望到，在尖塔上配置的武器可以有效地用火控制住好几条街。暴动者充分地利用了这个教堂。早在24日，他们就向过路的一辆装甲车开火，于是那尖塔也就受到了头一次射击。

各个小组之间有着有组织的协作和有计划的配合。每个小组都尽量在本区域内活动，只是偶然地才冲到其他区域内进行一次劫掠。

10月27日，在“国民警卫队”的组织工作开始时，高级指挥部同各小组都进行了接触，以便吸收他们入伍。然而，小组的首领们不愿意谈判。他们并不承认什么高一级的指挥，因而一切谈判都毫无结果。

10月30日以后，武装小组的活动日益放肆了。他们感到权力现在在他们的手里了。

11月1日以后，他们人数由于一个新组的加入而得到增加。从第八区和第九区来了一群80到90个男女。这些人几乎没有安顿一下自己就已经参加到行动里去了。他们冲进并抢劫了尼奥尔街和拉科西街拐角的一家国营粮食店，把其中部分货品分给了过路的行人。后来他们又抢了一

家专门制造出口商品的手工业合作社的车间，并且为了消灭罪证而放火把它烧起来。火焰威胁着车间上层的公寓房子中居住的许多人，那里约有 70 个小孩，在这冬季将临的时候眼看就要因为这一把火而无家可归，然而在非武装的平民试图救火时，这些平民却遭到了一再射来的燃烧弹的射击。在两天之内，他们把那手工业合作社车间点燃了四次，只是由于四邻居民的努力才挽救了那大楼的其他部分。

优质百货公司也被占据了。那些抢劫犯往大陆饭店运货运了好几天，而且在 11 月 4 日在四个地方被火来焚烧这所公司并使用武器制止任何救火的尝试。

11 月 5 日，相距不远的服装商店也被烧着了。在大部分货品在夜间被运走之后，一桶汽油被丢进店内，然后用燃烧弹把它点燃起来。

叛乱分子在饭店里举行了盛大狂欢，并把抢劫来的货品慷慨地分给陪伴他们的那些品行不端的女人。

11 月 8 日，一辆装甲车路过饭店前面，受到了来自楼内的射击。不久之后，坦克和步兵开到了饭店。步兵遭遇到火力抵抗。后来坦克向楼内打了几炮，向前推进的步兵才不再遭遇到抵抗。叛乱分子已经丢下了赃物从后门和地下室的窗户逃走了。警察找到了价值达 250 万福林的赃物。

反革命活动在文理大学

在十月底那几天，“匈牙利知识分子革命委员会”在法学院大力展开活动。这个报告并不想对这个团体的活动加以说明和作突出的描写。無疑，确有一些成员，也許是大多数成员，他們并不了解那些“革命”的口号不过是反革命的假面具，他們不仅不接受明曾蒂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也不接受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然而那些同明曾蒂和西方帝国主义的信徒志同道合的人们，也的确利用了这个成份复杂的团体作为烟幕，日益公开地进行他们的活动。

法学院军事教育系斯少校的报告以及其他人的报告，暴露出那些在“匈牙利知识分子革命委员会”掩护下进行活动的反革命分子的行动真象。

法学院军事教育系的教师分裂为两派。据这位少校报告说：“主要的政治领袖是戴契中尉。戴契中尉的父亲被定为富农，他因为他父亲的缘故吃过亏。原先他曾被派到参谋长那里担任职务，但是后来被改派为中尉到大学里来讲课，这个职位比较不重要。（25日那天，我们得悉他的父亲曾经当过大地主的管家，拥有180霍尔特土地。）”关于军事教育系的情况发展，这位少校报告说：

“28日那天，当我正要走进系办公室的时候，进来了一个身穿便衣的人，他的名字我不知道。他热烈地同伊中校打招呼，伊中校介绍说这是他和貝拉·基拉伊在从前霍尔蒂

軍事大學時的同學，是總參謀部的一位上校。他接着說，貝拉·基拉伊已經去找過他以前幾個老同事。他們要到系里來，我們要給他們騰出些位子以便他們可以進行工作。後來，另外一個大約有五十歲的人走了進來並且自我介紹說他是一個軍需上校。這兩個人接着就彼此用打字機打出各人的履歷，說明他們各人在哪什麼地方奮不顧身地作過戰，每人帶過多少兵。”

在“匈牙利知識分子革命委員會”下面成立了一個軍事小組。有關的報告沒有說明它是什麼人組織的，為什麼組成它。這個小組顯然成為霍爾蒂分子和類似人物的集中的地方。他們的主要口號是為反對蘇聯軍隊而鬥爭。各色各樣資產階級復辟分子的代表們在這個民族主義的口號下力爭上風。領導的地位掌握在他們的手中。

軍事小組把大學的學生們組織起來準備參加暴動。明曾蒂的教士們也參與了這件事。他們供給暴亂分子食物和“鼓舞”，鼓動反蘇反共情緒。參加暴動的人們中有一位名叫納的軍官報告說，在大學中組織了一支警衛隊。文學院警衛隊的司令官是一個名叫格·特·的學生。報告作者說，28日晚他覺得餓了，他問能不能找到一些東西吃，因為他沒有帶吃的，也不知道哪兒可以找到。他寫道：“格·告訴我用不着擔心，因為那些教士們答應供給大學里那些青年人以食物，他說會有好吃的東西。”格·當即陪他到飯廳去。他接着說：“當我們來到飯廳的時候，一群女孩子就把我們圍起來，並且問我們是要吃烤鴨還是要吃烤鵝。我大笑說，我從來沒有這麼闊氣過，我隨便什麼都行，他們隨便給我吃些東西就行了。她們端來那些教士送來的整個烤鴨和烤鵝。每一只烤鴨和烤鵝背上用牙簽別着一張寬三公分長十五公分的紙

条，上面用打字机打着下面这段话：‘亲爱的大学生們，我們請求你們不要放下武器，要战斗到最后一点一滴血，战斗到获得神圣的自由’。我問格·特·，这些教士們为什么这样慷慨。我注意到在那天晚上，有两个教士在‘匈牙利知識分子革命委员会’的办公室中忙来忙去。格·特·說：‘这些教士告訴我們，他們有一个冷藏工厂，他們可以在那里保藏食物。大学学生們因此就帮助教士們把从各省运肥鴨肥鵝的卡車擋住，并且讓它們到那些教士那里去。’格·特·說：‘那里有大量的酒，还有檸檬，我喜欢什么，就可以把什么帶回家去。还有香烟，随便我要哪一种都可以。那些教士們确实比他們說的还要慷慨。’”

古特曼博士露面了

西方帝国主义的間諜和特务也出头露面了。29日晚上，由一个名叫古特曼博士的律师率领的波恩代表团来到文理大学的塞尔勃大街校舍。古特曼找到軍事教育系的一位軍官，并提出如下的要求：

“我必須率領 50 名武装的士兵到維也納去”，这位軍官在报告中写道：“并且把他要从維也納运到布达佩斯来的物資护送來。我問他这些东西是什么，是不是紅十字会托运的东西？他說是的。我問他为什么需要武装护送？这位律师說，他不願意冒这些东西受到損害的風險。我沒有答应作这件事。我提到軍事法規，提到我的职责，但是这位博士說：‘老弟，这都已經同貝拉·基拉伊安排妥当了，你要作的事就只有动手作起来，我們甚至已經給你带来了一輛小汽車。’我說，我对司机怎么办呢，我讓他住在哪兒呢，我从来沒有闊气到可以自己有一輛車。古特曼博士說：‘你会開車，这不是一輛公用車，而是你的私人車。你选一輛吧，我們有三輛胜利牌和一輛哈德遜牌的。’我不同意，并且告訴他或者說要求他不要同我談这个。我上面有司令官，他應該同他談。此外，我还有个家，而且我不能作为一个軍人离开我的国家。对这一点，他回答說我可以把家人都带上，人們会在維也納給我們安排住的地方。由于我不肯，那天晚上他至少来了三次，千方百計地劝我去。当他在晚上十点半來的时候，一个

国家保安局的尉官一进警衛室就报到值勤。这个尉官身穿平民服装。他和警备队指揮官格·特·互相拥抱，格·特·立刻签字讓他担任警衛任务。我問他們既然他們把国家保安人員当作敌人，那末为什么他們又签字讓这个尉官担任警衛任务。格·特·說这个人是他亲密的朋友。当古特曼博士十点半来的时候，他和这个尉官很热烈的彼此問好。我問古特曼博士他是什么人。他回答說：‘現在我可以告訴你了，我是西方情报机关的一名官員。’那个国家保安局尉官說他本人是被派到国家保安局那里去工作的，并且在‘軍事法庭担任偵訊檢察官。’”

写这个报告的軍官納·接着說，他向古特曼博士提出要求說，既然他地位这样高，請他談一談西方政策的总方針。古特曼回答說：

“我們的目标是在赤色分子周圍建立一个中立区来把他們孤立起来，因为不然的話，他們就能够談論資本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和平共处談上半个世紀。这个区将包括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等国。”

古特曼还發表了如下的意見：

“紅色政权本身并不是文明世界面前唯一的危險；如果中国和印度談到一起去了，那末阿拉伯国家很容易同他們联合在一起，这就会成为对西方文明的禍害。这个前途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迫切的問題，必須想办法不使它發生。”

就是这样一些人，他們瞞着“革命委員會”中原来存心不錯一些团体而获得日益扩大的影响。那些古特曼博士們、戴契富农和他們的子弟、明曾蒂的信徒們，他們一起用反苏和民族主义的宣傳，利用被引入歧途的那一部分青年大学生，来实施他們陰險的复辟計劃。

为反革命服务的“首都民族委员会”

随着伊姆雷·纳吉政府的無能和急速右傾，主張資本主义复辟的許多集团急忙利用这种局势来攫取布达佩斯市人民會議的控制权。作为各个新近成立和改組的党派的代表，他們組成了一个所謂“市民族委员会”。这个自封的机构宣布解散合法选出的市人民會議和它的执行委员会，并且在市人民會議办公的地方接收了权力。在各个区人民會議也發生了同样的事情。

在組成“首都民族委员会”时，下列党派各参加代表二人：1. 小农党，2. 社会民主党，3. 匈牙利基督教党，4. 农民党，5. 民主党，6. 基督教青年同盟，7. 共产党。这个“民族委员会”中还包括有一些分散的不屬於基督教青年同盟的“青年”代表。

把共产党人包括到这个資本主义复辟的市机构中，是同伊姆雷·纳吉政府中暂时容納共产党人一事在性質上是相同的。

除了那些老的联合政党以外，霍尔蒂分子的“匈牙利基督教党”的出現在这个复辟机关中是一个典型的現象。这个党想来是願意繼承霍尔蒂政权时代布达佩斯基督教党的傳統的。它不过只来得及开始“組織”成一个党，并且在市人民會議中占了几間办公室（利用那里的打字机和打字員）以便組織它的“全国总部”。它还对同样新成立的基督教青年

同盟进行帮助，这个組織类似大学和中学里的“兄弟社团”、“土魯尔”社等等团体，这些团体曾經在霍尔蒂时期試圖在青年运动中起领导作用。

11月1日的會議

这个“民族委员会”11月1日举行了第一次會議，而在11月2日举行了最后一次會議。两次会都是由社会民主党右翼分子彼得·貝契特勒担任主席。第一次會議的初步决定是恢复市长一职以代替执行委员会，恢复旧的“全体大会”以代替人民會議全体會議。根据小农党的动議，民族委员会“选举”小农党右翼代表約瑟夫·凱伏格为市长，选彼得·貝契特勒为副市长。

接着基督教党的卡洛里·沙伊格瓦里博士提議“民族委员会宣布所有处长以上高級職員应認為已被解职”。經過辯論以后，决定解除“民族委员会不予批准的”那些人的职务。选出了一个小組委员会来按具体情况进行审查。小組委员会中有小农党、社会民主党和农民党代表各一名，而共产党則沒有代表。無論如何，本来的意圖就是要清除共产党人。

在第一次會議上，“民族委员会”就“政治決議”进行了辯論。沙伊格瓦里提出了主要的調子，他要求把华沙条約作廢。談到从全国撤出苏联軍隊时他說：“目前按照国际法这是办不到的，除非匈牙利政府——考虑到在世界历史上曾經發生过更大的違背条約的事件，而且，在絕對必要的情况下面，国际法也承認違背条約的权利——我說，除非匈牙利政府立即廢止华沙条約。”沙伊格瓦里也談到罢工問題。他說：“罢工将把我們大家害死，如果我們不能粉碎这次罢工

并劝服工人結束这次罢工，我不知道民族委员会委員中有誰可以担得起这个責任。”然而他又說：“只有政府立即廢止华沙条約，同时宣布匈牙利中立，……我們才能要求工人結束罢工。”

南道尔·別尔凱伊—哥尔佐(民主党人)談到华沙条約时說，在目前国际形势下，廢止华沙条約是一个危險的步驟，它会引起一場“連 mohács 也無法比拟的”大禍，“因此我們在玩这个火把时必须很謹慎。”

考尔門·波托茨基(小农党人)声明說，他沒有得到就这样严重的問題代表他的党發言的权力。他要求推迟 24 小时，以便他向他的党請示。根据这些理由，于是决定延期作出决定。

就在同一天，正在趋于瓦解的伊姆雷·納吉政府作出了一个决定，并且——按照“自由欧洲”电台的命令，这个电台广播了沙伊格瓦里的要求——宣布华沙条約無效。

11 月 2 日的會議

首都的“民族委员会”再度首先处理清除担任領導职务的共产党人的問題。會議主席彼得·貝契特勒宣布：

他曾經同各处处长开过一次会。他說每一个人都得繼續工作而不要为任何其他的事担心。他沒有講处长以上职务已被全部撤消——他之所以沒有講，是因为这会影响工作情緒。自然，如果高級职位空出来了，民族委员会就应当負責使它們补上。教育处向他报告說，該处处长和副处长已經辞职。鑒于这种情况，建議委任索波斯拉伊担任这个职务。索波斯拉伊在其他方面是一位优秀的教师，从前担任过这个处的处长——他所以被撤职，不过是因为他不同意

政府的政策，后来就被关起来了。

卡洛里·沙伊格瓦里要提出另外一个建議：到現在为止，沒有解除过一个处长的职务。所有处长和副处长都是由可恶的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任命的。如果有关的职务空出来了，他願代表基督教党建議由彼奥尔教派教授伊斯特万·馬扎尔博士担任首都地区的处长，如果这一点得到同意的話，基督教党将不反对任命索波斯拉伊担任副处长。革命并不是为了讓我們的青年教育工作中迄今为止一直占着上風的精神繼續占上風。

亞諾斯·巴拉放伊（共產黨員）支持任命索波斯拉伊，因此这也就意味着恢复他的名誉。

卡洛里·沙伊格瓦里：关于恢复名誉問題，另外还有一个建議，要求讓那好几千被撤职的人都回到首都来。然而，他認為教育处的領導职务極為重要，因为要改变整个精神面貌問題是同它密切相关而且同它分不开的。既然已有另外一个动議，他就要求把任命这个职务人选的事付諸表决。

彼得·貝契特勒：他坚持原議。索波斯拉伊既不是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黨員，也不是共產黨員。他曾經是社会民主党黨員，但是他并不活躍，沒有發表过演說——他只是一个同情党的分子。基督教党会有足够的机会可以替它的黨員取得領導职位，但是我們不應該一开始就这样干，因为如果我們开始这样爭起来，那么我們就会把这件事看得过分重要，这就会打乱我們相互的合作。

卡洛里·沙伊格瓦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是由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合并产生的。各处处长的权力就是从这里得来的。因此，如果基督教党要求得到一个职位，他認為不給

的話就是一種不忠誠的行為。

卡尔曼·波托茨基：如果补充这个职位的事拖延一天的話，并不是了不起的事。他宣布他的同事（一位熟知首都事务的同事）目前不在这里，他本人对这几位候选人都了解，因此不能問心無愧地决定自己的立場。由于他認為首都的公共教育事業是一个極為重要的問題，他要求尽早作出决定；同时，他将去寻找必要的材料。

彼得·貝契特勒作为主席說，他們要延迟到星期一（11月5日）的會議上再作出决定。

沙伊格·瓦里在提出清除共产党人的計劃后，又馬上要求把解放以后被清除的霍尔蒂分子重新安插到首都的市政机关和工厂管理机构中去。他还没有要求讓那些前箭十字党人和“那些仍然引起不安的人”（普通战争罪犯）們复职；显然他是想把这一点留到将来再办，因为很难順利地讓箭十字党人和霍尔蒂分子一同回来。关于这个問題會議紀录上說：

“卡洛里·沙伊格瓦里說他想代表基督教党提出一个建議。他建議民族委員會頒布法令，准許自1945年以来由于政治态度而被解除职务的劳动者恢复他們在政府和工厂中的职务。由于这一点不能这样簡簡單單地就办得到，他对他的建議提出修改，規定就目前來說，由于有一些人可能在別的地方已經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已經死去，或者不願回到原来的职位上去了，因此民族委員會应号召他們不延迟地向民族委員會提出申請，指明他們案件的档案号碼和他們被开除的理由。民族委員會应由每个党各指派一人参加就这个問題进行审查的委員會——只要他們不是公开是箭十字黨員而且也不引起資本主义世界仍然存在的某些不信

任的話，民族委員會就應該讓他們復職，同時適當考慮到已經過去的時間的長短，使他們得到在勤懇工作的情況下原來可以提升上去的級別。

“他要求民族委員會把這一點牢記在心，因為這就會表現出一種革命精神，並且表明的確發生了改變……。”

主席貝契特勒宣布有一批在1945年到1948年期間被開除的人來拜訪他，要求恢復名譽。……他認為一切有關的人都應該向民族委員會提出書面申請。

卡洛里·沙伊格瓦里：這件事到底怎麼作是一個細節問題；另一方面，他要求民族委員會通過一個原則決議，決定自1945年以來由於政治態度而被解除職務的一切職工，將由市政府和其所屬企業重新召回。

主席：“還不能一下子就說‘政治態度’——因為到底還有箭十字黨這樣的人！”

沙伊格瓦里強調指出，他正要加上一句說明“除了那些由於同箭十字黨活動有關而被解除職務的人……。”

主席概述原則決議如下：對於那些自1945年以來因政治原因而被解除職務的人，民族委員會認為有必要肯定恢復名譽的可能性。關於這件事向外界發表的問題，應等待它獲得實際解決後再作決定，委員會因此應暫不作出決定。他要求出席會議而贊成這一建議的人舉手。

卡洛里·沙伊格瓦里對“恢復名譽”這個說法表示反對。他的建議說明要求首都各機關恢復那些自1945年以來由於政治原因而被解職的人的職務（除了那些由於箭十字黨活動和反人民罪的人）。他說，“恢復名譽”是另外一個問題。

主席：市政府或者它的附屬機構給他們一個職務，這件

事就完了。这是一个最可行的办法。他是以決議的口吻那樣講的。他請求委員會不要就向外發表的問題作出決定。這個問題也得同約瑟夫·克瓦格談一下。

卡洛里·沙伊格瓦里說，下次会上將就這件事向民族委員會提出建議。但是並沒有再開會。隨着工農革命政府的成立和蘇聯軍隊的歸來，這個資產階級復辟的市政權力機關也就瓦解而且消滅了。

关于布达佩斯白色恐怖的新材料

一次街上的私刑

中央警察局办公厅第一处人証记录

1956年12月20日记录于中央警察局，約瑟夫·內梅什和警察长阿蒂拉·盖尔該伊在場。

約瑟夫·內梅什（1934年生于布达佩斯，母名：爱斯特·貝凱斐；住布达佩斯第十八区法伊街5号），經濟大学三年級学生，在承認已經得到只講实情的忠告后，作如下發言：

1956年10月23日，我从布达区的罗匪杜姆（玫瑰山）来，下午十一点半到十二点时来到馬格萊特桥，在那里我看到下面这样的事：

在馬格萊特桥靠布达的那一头，有大批人聚在那里，为的是檢查过桥的車輛。我注意到他們只准那些說出“斐多斐”这个口令的司機的車过桥，同时他們讓別的車子的司機或者甚至乘客下車，說他們也許会被利用来同国家保安局通訊、給它帮忙、或者給它消息。当我走到馬格萊特桥靠佩斯的那一头时，我看到一大群人在那里檢查往布达去的車子。离桥头約五十公尺远，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塊磚来擋着那些經檢查小組指令停下来的車。一輛黑色的哈德遜牌8汽缸車从大馬路向桥上开过来——我沒有注意它的牌照號碼。我还記得那輛車背后有一个大的字母“H”。这輛車沒有



費倫茨·賽萊希, 前游击战士, 內政部的木工, 被反革命分子从布达佩斯列宁大街他的家里带走。

按着以前已經提到的那批人的信号停下来；反之，那个司机开足馬力希望能冲过去。这样，人群中就有人喊着要那个拿磚的人——他在掄起他的手臂——擋住那輛車。那个人在車剛到他跟前时把磚砸到車前面風档玻璃上去，車于是就停下来了。司机被拖出来，我后来就沒有再看見他了。他可能在人群里蹣走了，因为人群团团圍着那輛車。那位乘客，国家保安局的一位中尉被人从后座上拖出来。他穿着大衣，扎着皮帶，年紀大約有 26 岁到 28 岁之間。人群开始問他国家保安警察在广播电台干些什么。有些人恐吓他，并且喊叫說應該把他丢到多瑙河里去。那位中尉臉吓白了，連声請求讓他过去。然而到这时，人們把他圍得那样紧以至于他簡直一动也不能动。人群中有一个女人用鉄棒朝着这位国家保安警官头上当头一棒，結果他就倒下去了。后来他跟前一些人——有些穿着市运输工人的制服，有些是女人——抓住他把他拖到大桥栏杆那里去。同时，上面所說的那个女人繼續用鉄棒打他。到大桥栏杆以后，他們就把那个这时确实已經昏迷不醒的人丢到多瑙河里去了。他們把車子推翻了。但是一个半鐘头以后我再經過那里时，就沒有再看見它。关于这件事我可以講的就这么多。紀錄同实情相符，在讀过以后我謹簽字証明如上。

約瑟夫·內梅什

阿蒂拉·盖尔該伊

謀杀費倫克·勃洛道里茨案

警局紀錄

布达佩斯市第一区塞納廣場 a 1 号居民費倫克·勃洛道里茨夫人在第一区中央警察分局提出控告，状詞中說她的丈夫，国家保安上尉費倫克·勃洛道里茨原奉派在內政



在凱爾台斯街被反革命分子槍殺的一名青年士兵的屍體。反革命分子硬說他是一個“國家保安隊上尉”。

部第四司工作，10月25日（星期四）奉命前往第七区普拉特街协助驅散一次示威活动。暴徒襲击他，把他的衣服撕掉，而在發現他的服务証以后，把他从普拉特街一座建筑物的三層楼上丢下来。費倫克·勃洛道里茨因伤身亡。

“国民警备队”的山道尔·格什帕尔和他的名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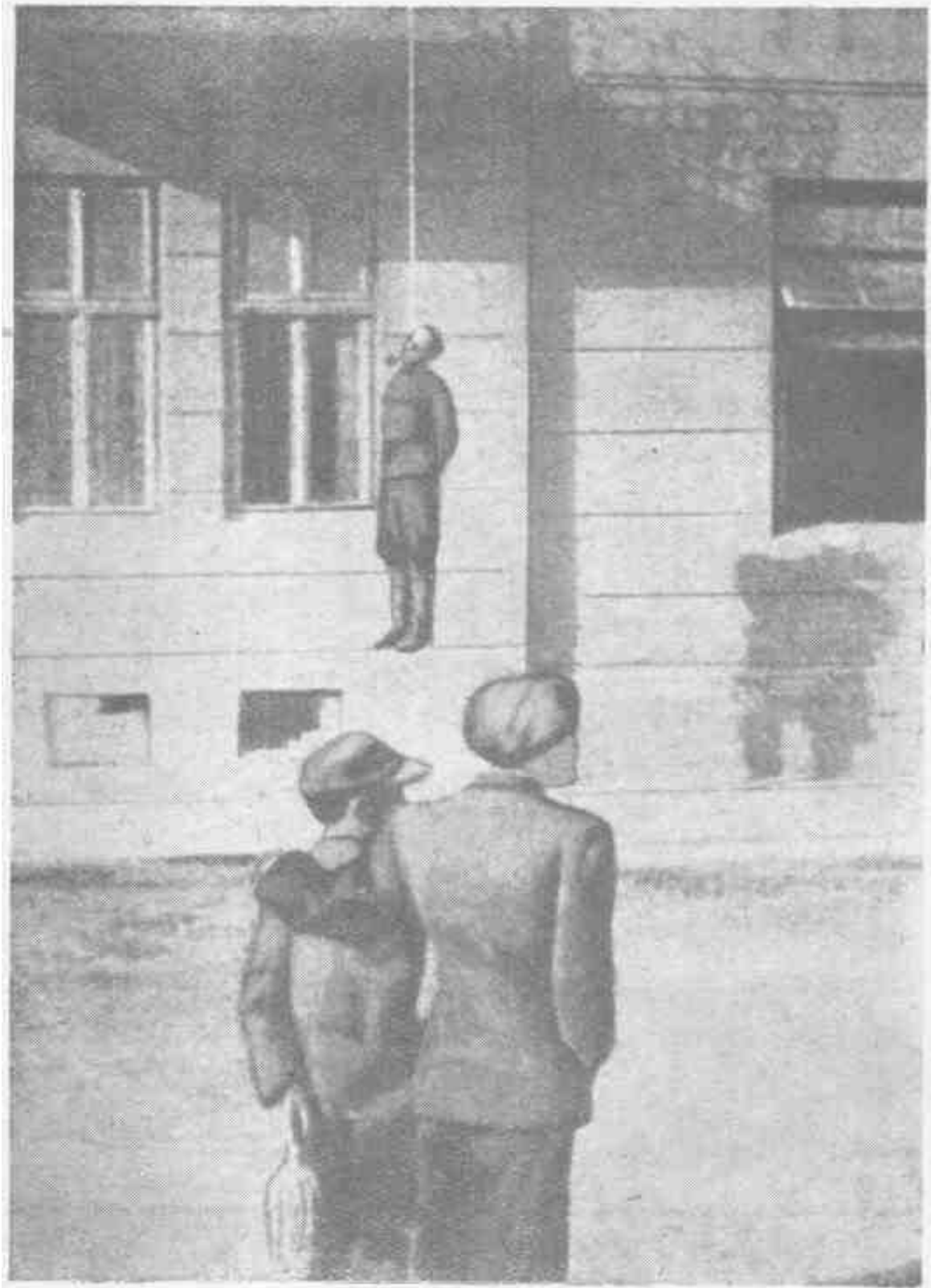
警局紀录

1956年12月1日，第16区警察局逮捕了第16区居民、食品企業經理山道尔·格什帕尔。他曾經担任他那区的“国民警备队”副司令。当时，格什帕尔仍然握有一張該区共产党干部名单，这張名单原来是用来作为加以流放和处死的根据的。作为“国民警备队”的副司令官，他冲开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第16区区組織的办公室，从里边偷走了許多貴重物品。按照他的命令，前区人民陣綫委员会主席馬济、前伊卡魯什工厂党委会鼓动宣傳書記、和第36警区指揮官山道尔·索姆少校这些人被人从家里逮走了。1956年11月1日，格什帕尔和他的帮凶到伊斯特万·格尔的家、辛科塔区广播电台街24号去，把他当作一名国家保安人員来盘問，并且想把他带走。他还用槍逼着第16区党委会第一書記米哈里·埃尔台伊，要他編制出一份共产党干部名单，以便进行逮捕和处死。埃尔台伊拒絕照办。

1956年10月26—27日董帕大街事件

工程师L.F.目击記

在那些日子里，时常可以看到武装披挂的年輕人单独或成群地在这一带走来走去，因为他們有很多人同科尔文巷集团有着联系。



這張被反革命分子吊死的國家保安人員的照片轉載自維也納出版的無綫電傳真報。

然而，在 26 日清晨，我們注意到有三四个攜帶手提机枪的人在街上站崗。后来我們看到他們在搜查車輛和車內乘客。起先，我們認為这是同防守基利安兵营有关的一种安全措施。

上午，当那些武装的人搜查一輛一家公司的車子的时候，他們發現了一册紅色的党証。他們當場就把那个人槍杀了。他們还打了其他的乘客，把他們赶走并且把車子夺过来。

1956 年 12 月 20 日于布达佩斯

杀害警察少校卡洛里·亚卡勃案

警局纪录

卡洛里·亚卡勃，33 岁，矿工家庭出身。弟兄共五人，全为工人。父亲是矿工，早已去世。亚卡勃本人是在物質环境極為艰难的情况下长大的。童年时讀完八年制的小学以后，他曾經当过面包师的送貨工，替花匠貼过招貼、跑过杂差事。后来，他在多瑙維亞工厂成为一个車床徒工，在那里一直工作到 1945 年。在那一年，在工人們的提議下，他被选举参加新成立的民主警察部队。1947 年，他进了軍官学校，畢業后担任中尉。1956 年，他升为少校。十一年来，他除了在警察部队中服务外，他还担負政治工作。由于十月事变的緣故，他奉派守衛高尔基大街粮庫。10 月 28 日，当苏軍撤出首都时，他正要离开高尔基大街的警察医院回家去，当他走到街上的时候，他被一个放冷槍的人打死了。把他抬走的医务人员在他身上找到一張黑边的小紙条，上面写着：“这就是人民的敌人的下場”。亚卡勃的姐夫也是这样被打死的。

1956 年 12 月 15 日于布达佩斯



被前霍尔蒂警察人員杀害的共产党员铁工卡尔曼·土尔纳的遗体。



被反革命分子杀害的一位国家保安局的女巡官的遗体。

謀杀卡尔曼·土尔納案

1956年11月21日，布达佩斯中央警察局民兵营逮捕了伊斯特万·米齐納伊（1917年出生于配尔倍台，母名：赫尔米娜·芭伊达；前霍尔蒂警察，不是党员，半熟练钳工，匈牙利公民），布达佩斯第20区（配什特约别特）居民，住埃尔道街32号，謀杀罪嫌疑犯。

調查証实伊斯特万·米齐納伊曾于1956年11月2日到第20区警察分局报到，願参加民族近衛軍服务。1956年11月4日，他遇到了他的朋友山道尔·朗格，配什特约别特居民，住帕托克街7号。（朗格——年約四十五、六岁，霍尔蒂时代当过警察，一度担任过伍长——他也曾經在民主警察部队服过务，一直到1949年他被解除了职务。）朗格給他一支7.65公厘瓦特式手槍，并且要他跟他一道，去逮捕配斯特塞别特区拉科西大街2号居民卡尔曼·土尔納。

他們一道去山道尔·朗格的宿所，在那里他們粗暴地对待住在同一座房子中的一位退休的警察卡洛里·巴尔查，并且想槍杀他。朗格的妻子把他們擋住了。

他們从那里往埃尔道街32号米齐納伊的住所去。他們把住在同一个院子的警局調查員約瑟夫·拉扎尔夫妇拉出房子去，并且毆打了他們。朗格想把他們兩人都槍毙，但是米齐納伊的妻子把他擋住了。

以后，他們兩人就到拉科西大街2号去。他們找土尔納，后者当时在地下室里。朗格在院子里用冲锋槍打了几槍，米齐納伊用手槍打了几槍，他們喊叫說：“快出来，土尔納！快出来，街长！出来，土尔納同志，我們来成立共产党！”

后来他们就走进地下室去，把土尔纳夫人和他的孩子们以及她的邻居约瑟夫·凯莱明夫人都赶出去，以后把土尔纳打死了。子弹打中了土尔纳的心脏，他立刻就死去了。这次凶杀事件没有别的人看见，据米齐纳伊的供词说，枪杀土尔纳的是朗格。现有的物证（按照弹道专家的意见）表明米齐纳伊也开了枪。在凶杀以后，他们两人离开了犯罪地点。以后米齐纳伊回到家里把他的武器藏起来了（后来在搜查时在屋子中找到了）。据我们所知，朗格跑到国外去了。

审问判词同证人证词和医学专家以及弹道专家的意见相符合。

警局调查员

拉斯罗·科尔拉尔中尉

1956年12月13日于布达佩斯

警察伍长伊斯特万·达诺齐关于 普拉台尔街凶杀案的证词

中央警察局第一处纪录摘要

1956年10月24日，当我坐车经过普拉台尔街14号那座房屋时，“暴动分子”对我们进行袭击。我就同我的同伴帕尔·萨波到普拉台尔街14号那座房子的二楼上去躲避。在那层楼上，有两个看来是学生的人，还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我们从厕所窗口爬到通风过道里，然后从一楼一间洗澡间爬进了一座后来我们才知道是一个前霍尔蒂军队中校的房子中去。房子里没有人。不久以后，有几个人从走廊里叫我们，要我们投降。他们喊叫说，如果我们不投降，他们就要用汽油或者手榴弹把我们轰出去。这间屋子的主人正好在外面，他要求他们不要毁坏了他的屋子，他会给他



↑ 这位惨遭杀害的警察人员尸体上放着他的党证，嘴里塞着一支香烟。

一位惨遭杀害的军官的遗体。

們把門打開。當他開門的時候，我開了槍。那些暴動分子還了幾槍以後就走了。

我們在上面所說的那座屋子里一直待到10月28日3點30分。

我們從這座房子的窗口可以看到街對面伊洛納·齊額伊中學，那裏有一群武裝的人，大多數是18歲到20歲的青年。他們有一架機關槍，幾支沖鋒槍和自動步槍，有幾個人拿著一些汽油瓶子。

10月28日，我們在住在這座房子里的人幫助之下挪到地下室去。同時，那些暴動分子從一個九歲的孩子那裏聽說我們在地下室里。他們就來抓我們並且把我們帶到街對面伊洛納·齊額伊中學去，他們把我們鎖在裝煤的地下室里。

在伊洛納·齊額伊中學里，發生了如下的事件：

10月28日下午10點鐘，他們把我和另外十個囚禁在同一个地下室的人帶到院子裏去，在那裏他們讓我們排成一排。在這一隊人中間，有幾個人從他們穿的軍官皮靴和他們的話看來，應該是國家保安警察的軍官。只有我一個人沒有拴起來，據說因為我是一個警察，其他的人雙手拴在一起，看得出來他們曾經被拷打過。不准講話，因此我沒有能夠知道更多有關他們的情況。

人群中有一个人，一名前國家保安警察中尉，被挑選出來，雙手拴着，站在院子中央。他們一面惡狠狠地破口大罵，一面開始拷打他。他們先踢他的腳，然後狠狠地打他，打得這樣的厲害，以至於他倒在地上。以後，他們就把他雙腳倒吊在院子裏一根電綫杆上。然後一名陸軍中尉（從他的外衣看來）開始用一把30到40公分長的刀子戳他的肚子和

腰部。后来，把他的右耳朵割下来，并且用刀子割破他的小腿。那位被惨杀的同志还没有死去，就有十几名暴动分子把一名年约28岁的年轻女子带到院子中去。她一看到被惨杀的那位同志的样子就哭起来，她请那些暴动分子看在她的三个孩子的份上饶了她，因为她从来没有害过任何人。那个中尉走到她跟前说：“我们到底还是把你抓住了，你这个臭特务！你和你那16本身份证，还有那9,000福林！”说了以后，他就用他手里的刀子戳她。那个女人倒下去了，一个穿着囚犯衣服的男人抓住她的头发把她翻过身来，而那个中尉又扎了她几刀。据我看，这时那位女同志已经死去了。

后来，他们就把我们又带回装煤的地下室去。

10月24日下午，当我们躲在普拉台尔街14号那座房屋中时，那些暴动分子在搜索我们时开枪打死了一位年42岁的男子，因为他没有把我们躲的地方告诉他们。

我在证词中说的全是实情，我了解伪造证词所应受的处分。

伊斯特万·达诺齐

1956年12月18日

圖書館工作者克腊拉·斯·的証詞

1956年11月1日十点一刻，三个带着冲锋枪的年轻人到我家里来。他们在屋子里搜查了以后对我说，我被逮捕了，他们用車把我带到科尔文电影院附近一座学校中去。在审问中他们通知我，因为那座房子中有人告诉他们我担任国家保安警察的职务，所以他们才逮捕我。他们不肯相信证明实情并非这样的我的两件身份证，他们说，即使我并不属于国家保安局，但是对他们来说，我也是一个靠不住的人。

以后，他們就把我帶到一間教室去，那裏有 15 個男子已經關了好幾天，還有一個女子是頭天晚上關進來的。那些男子中大多數曾經在國家保安局作過事——但是他們多數已經好幾年沒有在國家保安局擔任現職職務了。我的女難友是奧托·科爾文醫院的一位護士；她被帶走后，她的兩個年幼的孩子留在家裏沒有人照管。三個年紀大約 18 歲的青年帶着沖鋒槍看守着我們。囚犯數目越來越多了，他們帶來了兩位作黨的工作的干部以及幾名據說是國家保安人員。我們坐在椅子上，有時他們准許我們站着，他們給我們吃的。

那些被逮捕得早一些的人說，現在比早幾天要好一些了，那時他們有些人曾經被拷打，還有些人被處死了。每隔一會兒就有人進來盤問那些囚犯，問他們的工作，並且對他們的職業加以嘲笑和謾罵。例如，其中有一個翻譯人員，他回答說他把法文譯成匈牙利文。他們就對他說：“對，也許你曾經把皮翻過來。”後來他們帶來了一個大約有 14 歲的男孩子，那孩子在玩的時候開槍打死了他的朋友。

時間就這樣過去了，我越來越為我的生命擔心。我的運氣還不算壞，人民軍報編輯部一名記者到這裏來，他說他很久就認識我並且証實我同國家保安局沒有任何關係，他要求他們把我放了。一個半鐘頭以後我就被釋放了。我後來聽說留在我後面的人們也被釋放了。那個指揮部的領袖們在聽說蘇軍就要到來的時候，就一個個地逃走了，最後就剩下那些年輕孩子們。在蘇軍來到時，他們就把他們的犯人放出來了。

約瑟夫·索包齊的証詞

紀錄摘要

1956年12月1日于布達佩斯

約瑟夫·索包齊

1908年生于明德聖

1956年10月30日，暴動分子擋住了約瑟夫·索包齊中尉的車子并且把他和他的兩個同伴逮捕了。下面是他關於這次事件的証詞：

暴動分子捉住了霍瓦特、瓦爾德和我，他們還搜查了我們身上。他們把我們三人帶到新佩斯區的所謂“革命委員會”的房子里去。那些暴動分子在路上毆打我。到了那個委員會以後，他們又搜查了我們一遍。他們拿走了我的黨証、身份証和一張在我指揮下的30個人的名單——內務部的同事們——還有我的游擊隊員聯合會會員証；他們脫下了我的制服，給我穿上一件破爛的平民衣服。對瓦爾德他們也這樣對待。對霍瓦特，他們只拿走了他的身份証。然後他們就把霍瓦特、瓦爾德和我關在該委員會大樓的一間小房子里，派了武裝警衛人員看守着我們，並且禁止我們談話。

五分鐘以後，所謂調查就開始了。他們先把我叫進去審問。房子里有科薩，他坐在桌子後面，他左邊坐着一個高大瘦長的人，大約有30歲的樣子，瘦長臉，面色蒼白，留一小撮山羊鬍子。他們讓我坐在一把椅子上。在我周圍有15名帶着沖鋒槍的人。我記不很清楚了，但是顯然是科薩對我發出問題，問我們往哪裏去，干什么？……審問的人說我撒謊。有幾個拿沖鋒槍的人好幾次打我的腦袋和脖子後面。他們大聲嚷着說要把我交給那些暴動的群眾去審判。然後其中有一個人命令我把皮靴脫掉。我照辦了，脫下了我的皮靴。他

們命令我把光着的脚放到桌子上。我也照办了。以后那个讓我脫去靴子的人就用槍通条打我的脚指头，他用力打我的脚指甲想把它們从脚指上敲下去。我痛得厉害，忍不住啜泣起来。由于这样的拷打，我的脚失去感觉了。我一想起这次拷打，就禁不住渾身發抖。甚至現在当我回想起那些可怕的事来，我就忍不住要哭。以后他們强迫我穿上皮靴。我的脚肿了，不願意穿上皮靴，但是他們强迫我穿，我只得忍着疼照他們說的办了，我非常吃力地站了起来。我后面一个带着冲锋槍的人命我轉过身臉对着牆站着，我的鼻子已經碰着牆壁了。他从后面用力打我，打得这样厉害，以至于我口鼻鮮血直流，他們还不許我把血擦掉。

相反，他們在地板中央放了一个盘子，要我弯下身去，用两个食指放在盘子里来支持我的体重，然后讓我繞着盘子走。我試圖把我左面衣袖上的血擦掉，結果我挨了狠狠地一拳。他們强迫我就这样子繞着盘子轉圈，一直到我軟瘫下来昏迷不醒人事。后来那个留山羊鬍的人往我臉上噴水，我又醒来了。他們强迫我再用手指抵着盘子繞着盘子轉。我又一次昏迷不醒。他們又用水把我澆醒，然后又讓我繞着盘子轉。

在他們折磨我的时候，那个留山羊鬍子的人两次打電話到第 21 区警察分局，要他們查对我在內务部作什么工作，并且向他报告。这次可怕的拷打从晚上九点鐘一直进行到十一点。他們把我帶进地下室，告訴我說要槍毙我。我一个人关在一个小房子里。我不知道当时霍瓦特和瓦尔德在什么地方。

夜半的时候，那些人又來找我。审問再度开始，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五点半。也許我說的时间会錯几分鐘，但是我声

明这次“审問”有五个小时之久。其实不是什么审問，而是不断的肉体的酷刑。他們打我，說这是因为我曾經在国家保安警察担任过科长；說我自从 1945 年参加工作，长期以来，沒有受过一次党的或者行政的紀律处分；因为我是一个中尉；因为我每月都繳比較多的党費（我每月繳 50 个福林，占我每月工資的一定百分比）。他們要我把給各省部队带去的通报的內容告訴他們（因为我是信使），他們还要我把我所听到的內务部各指揮官之間的談話告訴他們。我沒有照他們說的办，因为我不知道这些事，他們就又打我。在拷問中間，他們好几次把我带到院子里，威吓說要把我交給那些在委员会門口拿着繩子等着吊死我的暴动群众。最后他們因为我不肯照他們要的那樣招供，并且說因为我使他們一夜都沒有睡觉，因而又打了我一頓。

早晨五点半左右，他們把我帶到地下室去。他們說要是我自己找不到路，他們就要槍斃我。他們還說他們一定要把我干掉，苏联軍隊也救不了我。

在新佩斯区的所謂“革命委员会”大樓的第一夜就是这样过去的。

打我最多的是那个留山羊鬍子的人、那个水兵和那个要我脫去皮靴的人。其他武装分子也打了我。当他們把我帶进地下室的时候，他們給我安上湿綳带。我想这样拷打大概是結束了。但是我錯了。这时那些警衛人員开始来折磨吓唬我。很多带槍的人走进地下室，命令我用脚跟站起来，爬下去，又站起来。他們把我的头往墙上撞，还把我的两只手拴在墙上，說他們要把我的手指一个个用槍打断。一个名叫陶特的年輕人好几次用手槍打我的手。

他們讓几个普通罪犯到我的囚室里来，刻薄地說我就

要被槍斃了，問我有些什麼最後的要求。我回答說：“請問候我的妻子和我的兩個孩子。”他們說他們已經到我家里去過，看到了我的妻子和女兒。他們說得那樣詳細，使我毫不懷疑他們的确到我家里去過。

「當他們離開我的囚室以後，~~我~~ ~~聽~~ ~~到~~ ~~他~~ ~~們~~ ~~的~~ ~~聲~~ ~~音~~」

~~我~~ ~~聽~~ ~~到~~ ~~他~~ ~~們~~ ~~的~~ ~~聲~~ ~~音~~

問过拷打过我，后来他对我說就会把我放出去。因为担心要是我講錯了任何东西，拷打就会又来一遍，我没有告訴这个人是谁人拷打了我。1956年11月3日，我注意到“委员会”中有某种混乱现象。他们拿来了一把扫帚，我把地扫了一下。晚上，来了两个人把地下室中的囚犯放走了一部分。

晚上九点鐘，他们把我和其他17个人带到第4区检查官的办公处去。……

……我們在那里一直待到11月5日，后来一个老人同暴动分子談着話分散他們的注意，同时他的妻子把我們三三两两地放出去了。有四天之久，我一直躲在新佩斯区街上和地下室里，只是在苏联军队占領了切佩尔以后，我才回到家里去。我發現那些匪徒曾經四次冲进我的家，砸开了鎖，偷走了我的东西。……

“自由人民报”总部中的“猎取人头者”

調查报告摘要

在盘踞着“自由人民报”总部的杜道什反革命匪帮中分成好几个集团。其中一个叫做“菲里大叔”集团。这个“菲里大叔”，他的真名字是費倫克·帕尔哈齐，从前曾經是一个霍尔蒂军官。他这个集团中还有三名西方“军团分子”，这些人坐着标着紅十字的車子全副武装来到匈牙利。这三个“军团分子”带着德国制的装有望远瞄准器的步槍，他们还有一架德国造的机关槍。“菲里大叔”集团以“猎取人头的人”而著名，因为他們的专门任务是搜捕国家保安局人員以及国家和党的高级干部，并且把他們处死。

就是他們在11月4日杀害了伊斯特万·薩尔卡齐检查官、帕尔·弗多尔中尉和一位被俘的苏軍士兵。“菲里大叔”



这幅触目惊心的照片原载美国“生活”杂志的一期特刊。
图示一位军官横遭非刑处死后遍体鳞伤的遗体。

和他那个集团的其他成员先审问过他们，后来在半夜时把他们带到科尔文百货商店后面那条街去。在那里他们让那三个人面朝着墙站着并且把他们枪杀了。

*

反革命分子集团屠杀了成百的匈牙利工人、农民、职员和知识分子，他们还大规模逮捕那些他们要进行报复的人。

在11月4日上午，他们在首都监狱和许多武装集团的牢房里，囚禁着1,500多名共产党员、前国家保安局的工作人员以及党和国家的工作人员。例如，凯巴放集中监狱囚禁了400名国家保安人员和104名党的工作干部；中央警察局囚禁着107名党的工作干部和几百名国家保安人员；11月4日，从科尔文巷放出了约一百名被囚禁的人。

应该记得，在整个这一时期中，政府中仍然有共产党人，匈牙利境内仍然有苏联军队；因此这次白色恐怖的组织者不得不小心行事，他们还不肯“过分”猖狂。他们曾经准备在以后来一次更加血腥的清算。各个反革命组织和集团都编选了将要逮捕和处决的人的名单就可以说明了这一点。比如说，在布达佩斯某些区——在耶诺·朗德勒街，在布达区的纳普海吉等地附近——他们在共产党人的门口上划上十字作为标志。

根据这些情况看来，显然反革命正在为大规模血腥报复进行准备，只是由于苏军11月4日打回来才制止了它的实现。

关于圍攻布达佩斯市委大楼 事件的新材料

我們在本書第一册中已經敘述过进攻布达佩斯市党委员会大楼事件。我們認為有必要根据两份报告和一份証詞記錄对已經發表的材料再作一些詳細的补充。第一个报告是警衛队的一个队长写的，另一个报告是党委员会大楼管理員写的；另外还有一份警局記錄，是一位受过拷打的女職員的証詞。

共和国广场党委员会大楼和劳动青年联盟大楼警衛队长伊斯特万·通巴中尉的报告

1956年10月23日下午六时，我同国家保安局的瓦尔科額伊准尉和45名士兵来到共和国广场那座大楼那里。士兵們都是20岁到22岁的青年，是在1955年应召服兵役的。我負責指揮这支警衛队。我接到的命令是接管保衛党委员会大楼的工作，負責以一切力量保护大楼和大楼里面的工作人員。在10月23日事件以前，只有三名下級警官負責这座大楼的警衛工作。

我的第一个任务是向麦澤同志和党委员会女書記納吉同志报到。在同他們商榷以后，我开始組織并派出警衛。我的部下装备着通常的武器。士兵携带着步槍，班长有冲锋槍，軍官們有手槍。我自己在二楼，瓦尔科額伊同志在三楼。



美国“生活”杂志1956年11月特刊刊载了这三幅关于杀害六名青年军人的经过的照片。反革命分子是在攻占共和国广场市委大楼后俘杀这六名军人的。

24日早晨，一支苏联装甲分队增援到我们这里来（三辆坦克，由一位上尉指挥），还有一辆装甲车带着一支混合编队，其中有苏联士兵和一些由一位炮兵军官指挥的匈牙利通讯兵候选军官，那位炮兵军官还担任译员工作。那些士兵一直待到10月28日（星期天），那些坦克也是这样。……

……在这段时间内，警卫队人员的士气越来越坏。他们不了解为什么电台所广播的要取消国家保安局的法令。我让他们认识到这只是同战术部队有关，目前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保安部队——因此那些士兵都决心用一切办法保卫市委大楼，必要时牺牲他们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10月30日早晨九点钟左右，据报有些带枪的人开始集



合。不久以后，有几个带枪的人向在外面站岗的老警卫队人员打听国家保安警察人员的情况。他们硬闯进来，并且要检查警卫队人员的证明文件。我们把那些闯进来的人赶出去并且把他们领队的人逮捕起来。我把他带到麦泽同志那里去，他盘问了他以后，下令把他看管起来。

到这时为止，并没有开枪，但是开头这些事情预兆前途并不美妙。那批武装的暴徒越来越气势汹汹，人数也越来越多了。

围攻以步兵武器的齐射而开始。我认为围攻组织得很好，无疑那些进攻的人拥有训练有素的军事领袖。

在大楼外面，“前线”到中午为止一直是稳定的。他们没办法接近党委员会大楼。党委员会大楼中的一位陆军军官阿斯托洛什上校告诉我，国防部答应增援，我们应当坚守到“解围”部队来到。萨姆埃伊兵营的保安部队也答应给我们帮助，但是两方面都没有来。

在中午的时候，炮击开始了。开头有一辆坦克，后来有三辆把它们的大炮对着市委大楼，用排炮进行射击。这时我们已经有好几个人受伤了。广场上的人群越来越多，他们开始从周围的楼顶上对我们开枪。

对于守军停止抵抗、围攻结束以后的情况，通巴中尉报告如下：

那些武装的反革命分子乱七八糟地一拥而进。这时不再有领导和指挥，而只有破坏，乱打乱砸，残暴地虐待妇女，大喊大叫，殴打党的工作干部。

一位上年纪的头髮苍白的工人同暴动分子一起进来，当暴徒们要对付我们时，他试图使他们安静下来。后来他给我们拿来了一些便服，并且帮助被堵在楼里的几名警卫人



这一系列关于共和国广场惨杀案的照片也是转载自美国“生活”杂志 11 月特刊。

員逃出去。

在市委大樓前面廣場上混亂異常。看來人們是在無目的地跑來跑去，沒有人指揮他們，他們不過是聽那些湊巧喊得最響的人的話。坦克已經不在了，這時那里停着一些豪華的小汽車，車上的人在拍照片。

他們拍照的主題是慘殺陸軍上校派普的事件，這次慘殺案是以最殘酷的方式進行的。暴徒們在他的臉上和上身上澆上汽油，把他的腳吊起來，以後就點火把他燒着了。……

當我那天下午穿着便服離開黨委會大樓時，廣場上瀰漫着燒焦的屍體臭味，人們在大肆搶掠，地上躺着我們的同伴的屍體。那些武裝的“暴動分子”用腳踢着已被慘殺的共產黨人並且向他們吐口水。

警衛部隊實踐了他們的誓言，他們堅持不屈，但是眾寡不敵。他們中間只有少數人逃脫了性命。瓦爾科額伊准尉和大部分士兵都被屠殺了。

關於搜索秘密地下室的報告

報告是由黨委會大樓管理員寫的，他在11月2日被人從家里帶走，要他指出並不存在的秘密地下室的入口。

共和國廣場上的工作（指為了找出並不存在的“秘密地下室”而進行的挑釁性的挖掘工作——編注）是由一個中校和一個文質彬彬的穿便服的人指揮的。在那里組成了一支雄厚的機械化力量（鑽探機、掘土機等等）。有三個鐘頭之久，“談話”的主題是通往地下室的入口。他們對於這些建築物很熟悉；從他們熟悉藍圖和現場的情況看來，他們對於那個地下室的每一個角落比我熟悉得多。



反革命分子在攻下共和国广场市委大楼后的兽行。
这幅照片原载1956年11月11日“时代”杂志。



反革命恐怖統治下一位受害者在共和國廣場慘遭
非刑的情況。照片轉載自11月4日“德意志周刊”。



这幅照片原载12月8日“慕尼黑评论”，图中是一名保衛共和国广场市委大楼的战士，这位战士在
大楼投降后在广场被杀害的。

我問他們除了由于神經病以外，有什么証据說有那么一个秘密的地下室以及有一些人在里面。我問他們：

1. 如果你們這些人是一些技術專家，而且你們掌握了一切技術裝備，那末你們怎樣說明你們找不到一個有人的深二、三十公尺的地下室，而人家可以在幾百公尺深的地方找到石油和煤呢？

2. 你們為什麼不找這些房屋的建築師和造房子的人呢？

3. 你們為什麼不沿着電纜和其他管綫前進呢？

他們對這些問題不去正面回答，並且開始談別的東西。在我們談話過程中，鑽探隊的隊長向那位中校報告說，他們先鑽透了一層黃土，以後又鑽過了一層泥灰磚；他說再鑽下去沒有用處了。答复是：“把鑽探機往前挪五公尺！”有時另外一些軍官插進來談幾句。

他們在大樓前面、公園里、廣場上、拉科西大街、巴羅斯廣場以及劇院後面進行挖掘和鑽探，但是無論在哪裡都沒有找到絲毫關於一個地下室或者地道的跡象。

這些人明白地看出他們這些力氣花得毫無意義，但是他們好幾次說：“這件事已經鬧到國外去了。”那個穿便服的人說：“我們姑且假定你是對的，並沒有什麼地下室。我們本來應該把這件事告一結束，但是我們怎樣可以罷手而不受到損失呢？給我們幫幫忙吧。”

答复是：“把那些挖溝的工人帶到每一個坑那里去，讓他們弄清楚那里什麼聲音也聽不到；同時找三個記者來，讓他們也看看，並且在報上發表說並沒有什麼地下隧道。”

對這些話的答复是：“這個想法不錯，但是我們不能用它。但是已經引起的歇斯底里太大了，他們不會相信我們，

這只會給我們引起麻煩——我們只能繼續鑽探下去。”

共和國廣場黨委會大樓管理員

伊斯特萬·凱爾台斯

1956年12月15日于布達佩斯

文書工作者阿格內什·凱萊明被拷打事件

第7區中央警察分局內務部布達佩斯區報告

1956年11月30日于布達佩斯

阿格內什·凱萊明(1930年3月12日生于吉厄爾聖伊凡。母名：吉塞拉·基拉伊)，住布達佩斯第7區巴羅斯廣場17號。部長會議秘書處行政處人員。

我願作如下聲明：

1956年10月28日，我到黨委會大樓去。我的哥哥在中央委員會作一個輔導員。以前，在1949年到1952年期間，我也在那里工作，先在幹部處，後來做麥澤同志的秘書。我想如果我到黨委會大樓去，我會對那里的同志們有些幫助，他們可能有些行政工作要做。在圍攻黨委會大樓時，我同艾娃·卡拉伊同志和伊達·夏耶斯同志以及黨委會另外一個我不知道名字的同志在二樓一個房間里。在黨委會大樓被攻佔以後，當時每一層樓上都有暴動分子，我們到走廊里去，有一個反革命分子把我挑出來並且說：“讓我去干掉這個國家保安人員……”。他們把我帶到街上去，那里有十來個以各式各樣的方式被慘殺的人，他們這是為了給我看會把我怎麼辦。來往的人群中有很多人踢我，把我打倒地上，用腳踏我，把我拉起來，給我戴上一頂警察帽子。他們告訴我朝牆站住，要在那里槍斃我。我不肯戴那頂警察帽子，他們于是在一個女人的提議下，把我的裙子和襯褲扯下

来，做一个样子給每一个臭国家保安警察婊子看看。我没有办法保衛我自己或者讓別人听到我的话，因为那些暴徒們不断地大声喊叫，而且挤到党委会大楼去，从那里把我們的同志們推到人群中來。在我已經进入半昏迷状态时，有人提議說應該檢查一下我的身份証。他們把我装有400个福林的手提包拿去，并且翻閱我的証明文件。那个拿着我的身份証的人同时把我推到一輛救护车那里，有两个人出来把我扶上去了。我就是这样被帶到安娜·科尔托依医院去的。我到处是輕伤，手肘和膝头上擦破了，嘴唇和耳朵裂口了，手上和腿上到处是青一塊紫一塊的。……在医院里我向他們要一条裙子，并且說我家离那里不远，我就要回去。一个女外科医生或者是一个女护士——我不知道她到底是什么人——告訴別人不要給我裙子，因为也許那些人会要找我。救护车中的那位护士請那位女医生給我一点鎮靜剂，因为我的脉搏是240下。但是那个女医生沒有理她。……后来，当那些暴动分子到医院来找我的时候，她一点也不猶豫地把我交給他們了。事实上，我听到有人抗議說，这样作是不对的，她回答說：“她为什么到这里來，誰送她來的？我們不要把医院变成戰場，她一人作事一人当。”两个年輕人（我記得他們）把我从医院里帶到普拉台尔街学校里，他們在那里找一位“大头目”。那位大头目不在，所以他們又把我帶到科尔文巷去，在那里两个人（我清清楚楚地記得他們的面孔）盘問我。在科尔文巷，他們吓唬我，希望从我那里打听到在党委会大楼內有多少国家保安人員，有怎么样的地窖。我什么也沒有告訴他們，說我只是完全碰巧才在党委会大楼的，要是有什么地窖的話，我一定也进去了。

晚上，他們放了我，我請他們陪着我到我家里去，因为



阿格內什·凱萊明，一位文書工作者，正在共和國廣場遭受着反革命分子的折磨。

虽然我在医院里得到了一条裙子，但是我沒有穿袜子，我的外衣也留在党委会大楼那里了。我穿得不像样，我的連衣裙已撕成碎片了。他們一直陪我到“百貨商店”那里。以后我就一个人回家了。

我願提出如下几点：我的工作証和身份証被搶走了。当我在党委会門前被人毆打时，我注意到他們在拍照片。

我沒有別的話想說了，上面的記錄同实情相符。在讀过这个声明以后，我謹签字表示認可。

拉約什·范姆

阿格內什·凱萊明

外省各地的反革命事件

在“匈牙利 10 月事件中的反革命势力”第一册中，我們描述了白色恐怖在無数城市和乡村里的种种行为。下面，我們要以更多的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恐怖主义、暴行、搶劫等事实来补充。

誰鑽进了“革命的”机关？

在 10 月底到 11 月初的期間，在無数城市和乡村里組織起了新的民政机构，出現了新的地方权力机关。反革命的政治代表，和普通罪犯一起，混进了这些机构，想要把社会主义的支持者推向后台并且威胁他們。所有那些喜欢在混水里摸魚的人都显出了真面目。这里举一些例子：

在契翁格勒，选举了一个名叫彼罗什卡的当市长，他和声名狼籍的米哈里·法兰契亚—基什，伊凡·赫加什一样，1919 年以后就是白色恐怖分子分队的司令。那时他在契翁格勒的行动之一——在一个舞厅里扔了一个炸彈——曾使 18 人死亡。彼罗什卡在 1956 年当了三天契翁格勒的市长。

在沙托拉饒赫伊，所謂教区革命委员会的主席是布拉格伊，是一个霍尔蒂份子，委员会的委員中有稅务員汗托什博士，地主霍尔罗博士等。

在額伊萊吉哈紹州“工人(1)委员会”的領導人是富农出身的拉斯罗·西拉基，他曾經在盖世太保偵察学校受过

訓練。他的“同伙”有富农迪索·卡包伊；安托尔·林吉尔博士，犯了反人民的罪而曾經被監禁过；霍尔蒂軍官吉厄尔吉·卢普科維奇；薩波罗什—薩特馬尔村的前霍尔蒂村长安得拉什·托馬索夫斯基。

在額特里吉哈利，霍尔蒂办的一所声名狼藉的士官学校的畢業生，皇家近衛軍的成員伊斯特万·品特尔，穿戴起他的旧制服和他所有的裝飾品，大声叫喊道“我等待这个日子已經等了12年了”，他向兵营走去去获取武器。然后由他朋友的协助，很快地組織起当地的民兵。

在戴勃萊森的所謂“社会主义革命委员会”里，同支持社会主义的几个忠誠的工人和知識分子并列的有这样的人物如反革命分子的主要組織者之一拉斯罗·戴地助教，和公共汽車司机季烏洛·考尔罗，他在戴勃萊森以毫無道德的騙子而出名，而且是常常和人吵架的酒鬼。委员会中無政府主义傾向的作家拉約什·爱格里起着重要的作用。他因为伊姆雷·納吉政府“并不适合他”，开始在戴勃萊森組織一个新的反对政府，由他自己来領導。这个委员会組成了一个包括霍尔蒂軍官、律师和其他霍尔蒂分子在內的“內部安全委员会”。它的工作是逮捕共產黨員、搜查房屋、干其他的所謂偵察工作，并且准备和执行一項反共產黨員的計劃。在戴勃萊森市政厅里，反革命律師領導的“戴勃萊森公務委员会”篡夺了政权。这个委员会撤換了信仰共产主义的各部門負責人，把工作分配給他們自己的人。他們甚至为戴勃萊森前法西斯市长一个名叫凱尔采伊的“买得”了市长候选人的資格。这些各种各样的戴勃萊森委员会得到了最异己分子的支持，例如季烏洛·考伏契(在下層社会里以“尾随者”出名)，他在戴勃萊森的名声就如流氓一样；伊姆雷·渥罗斯

是戴勃萊森一家最大的酒館的前老板的兒子，他是一個中學生和戴勃萊森咖啡的浪蕩子之一，後來在11月4日以後還不期而然地逃到了西方；等等人物。卡爾曼·陶馬，前法西斯副州長，也在戴勃萊森委員會上提出要恢復他的養老金的要求。

在許多戴勃萊森企業的工人委員會里，敵對分子鑽進了忠誠的工人隊伍。例如，戴勃萊森電車工人委員會的主席山道爾·道比，是一個前箭十字黨憲兵；農業機器廠工人委員會的主席是一個名叫加爾的走私者和投機商，他曾經被判刑幾次，而且剛從監獄里釋放出來。“工廠伙食事業”臨時委員會首要工作之一就是“恢復”該事業的前會計主任的職位，加上15,000福林的補償，這個人1944年時是黨衛軍軍官，後來當了會計主任以後，搜括了好多錢。屠宰場的臨時工人委員會是由以前的富農屠夫組成的；這個委員會逼迫在那裏工作的共產黨員把他們的黨證都投入火中，並且威脅說如果他們不這樣做，就要殺死他們。

在戴勃萊森，一個以前曾經被判過18個月徒刑，後來在1956年6月，又被判決監禁三年半的盜賊安得列·維朗額伊，宣誓就職為“國民警衛隊”隊員。他的“釋放”被證明以後，就被接受和被委托來保衛國家的財產。

在納吉卡爾羅，一個前霍爾蒂軍官卡洛里·納吉，在另一個霍爾蒂警官，梅額海爾特·伏什的協助下承接了陸軍司令之職。

在欽蓋爾，一個前民政長官帕爾·愛契齊博士，和前霍爾蒂檢察長蓋齊翁·愛契齊博士奪取了當地的行政權。

在考爾村里，組成了所謂“考爾基督教匈牙利民族革命委員會”。它的領袖包括巴蘭科維奇黨的前候選人及檢票員

卡洛伊·陶姆波，当地箭十字党的前行政委员会委员亚诺什·伊格拉齐（他当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以及安得拉什·崩海吉伊，也是一个前箭十字党的党员。

一个霍尔蒂行政长官，伊斯特万·索姆巴齐，当了爱格区的“革命委员会”的主席；他的同伙，拉约什·维莱什、拉约什·萨波和拉约什·凯莱都是霍尔蒂政权下的上尉。

在波尔哥尔村也组成了一个所谓“革命委员会”。其中的委员有伊斯特万·帕罗托什，他因为挪用公款并且不合法地越过边境曾经被判处三年半的监狱；费伦克·考伏契，他因为偷木料曾经被判刑四个月；莱叶·波尔索齐前铁路仓库管理人，因偷窃卡车曾被判刑五年。

过去的政治代表和其他的罪犯不是简单地鑽到这些假民主的机构里来的。这些人类的渣滓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以后混进反革命的組織里是在有組織地进行的。在杜納潘台莱的一个街头大会上，听到这样的命令：党衛軍軍官們，軍士們和以前的宪兵們，归队！不用說，市党委書記拉斯罗·科查是不被允許在这个会上講話的。

在海維什州的班森岩戴莱克乡里，伏克监狱里的一个被判了無期徒刑的罪犯亚诺什·维齐在反革命活动中很积极。

非法的逮捕和打开监狱

各人民會議和其他民主团体民选出来的領袖們很自然地成了反革命道路上的障碍。他們中間無数人如同在各省一样最后都被逮捕起来。薩波尔契州人民會議主席弗克西和匈牙利劳动人民党薩波尔契州委员会第一書記山道尔·伏尔格都遇到了这样的事。戴勃莱森市人民會議主席亚诺

什·梅尼什和哈伊杜州人民會議主席拉約什·托托尔·基什也都是这样的命运。这些逮捕的消息在十一月三日出版的“戴勃萊森新聞報”上用重体字登了出来，說那是“工人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做出的决定”的结果。同样情况，其他 39 名共产党员被关了起来，其中有一些在“詢問”的时候遭到毒打和虐待。革命委员会副主席，拉斯罗·戴地助教逮捕了大学党委员会的書記。在班森岩戴萊克，他們逮捕了执行委员会的主席拉斯罗·伏德納伊；在杜納潘台萊，逮捕了警备司令的司令官納吉埃利上尉；在紹拉埃格尔賽格陸軍部队里逮捕了軍官亞諾什·吉奥尔馬齐和拉斯罗·霍瓦特；在沙托拉饒赫伊他們把区党委書記伊斯特万·許契、陸軍上尉亞諾什·派普和拉斯罗·凱牟維什当做人質带走了。

反革命分子和囚犯集团以这种态度来排挤民主和进步势力，在全国各地制造可怕的罪行和政治迫害。而且尽可能地取得許多誤入歧途的人的支持。在不止一处，一方面，他們利用自由欧洲电台为自己取得指导和鼓励，另一方面，采用恐怖的方法使越来越广大的群众听到他們顛复的号召来支持他們的反革命目的。例如在馬柯的“民族委员会”書面命令当地的邮政局长讓当地的广播网播送自由欧洲电台的节目来代替布达佩斯电台的节目。邮政局长服从了。在薩波尔契州的考尔村發生了同样的事情，那里命令是由“考尔基督教匈牙利民族革命委员会”發出的。

各种“革命”机构为了要有足够的武器和“武装力量”，他們在乡村也采用了無数的“行动”。他們从額特里吉哈利監獄里釋放了 140 名罪犯，借口說“政治犯應該釋放”。事实上，140 名中只有两名是政治犯，其余的都是普通犯人如拉斯罗·托布因为盜窃罪被判 6 年徒刑，貝拉·塞普，因为



一位惨遭反革命分子非刑杀害、遍体鳞伤的警察尸体。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徽被扔在这位遭受反革命恐怖暴行毒害的人的尸体上。

暗杀判处10年徒刑，等等。他們把这些案件未决的罪犯带到沙什托避暑飯店供給他們舒适的房子，并且把他們組織到武装队伍里。州“革命委员会”的某些人員还到这里来訪問他們，并举行了狂喝乱舞。

凱契克梅特的反革命分子从当地監獄里放出罪犯，襲击了監獄的軍械庫把武器放在救护车里带到設在他們占領的中学里的司令部。为了要避免过路人的注意，他們把他們的神秘的貨物放在盖起来的担架上从救护車上搬运到大楼里。然后叛乱分子、剛放出来的罪犯和一些吉普賽区的草率地武装起来的居民結合起来干出恐怖的行动和搶劫。吉普賽人打死了六个当地警备部队的士兵，因为这六个士兵企圖要解除他們的武装。

搶劫和武装恐怖行动

在乡村很多地方，党組織和党委会的房舍都受到襲击和破坏。在契翁格勒州的道馬塞克村里，党委会大楼的門窗在10月28日都被搗碎了，房子被放火烧掉。

在亞斯聖拉奧茲罗，暴动分子由当地的居民貝拉·佐姆，和基什孔迈薩的伊斯特万·青盖齐率領着，搗碎了党委会房舍的窗子后，强迫打开用鉄条加固的銀箱偷走了公款。只有自衛队的干涉才能阻止他們去干已經計劃好的恐怖、謀杀、搶劫等等行动。

在戴勃萊森由于“革命委员会”的贊同，并且在一個名叫薩波的軍官的領導下，党部被占領和破坏了。几千福林的現金，13架打字机、地毯和帷幔都被偷走了。

在馬柯，在从塞盖特来的国民警衛队副司令官凱齐的領導之下，一支四十人的武装队伍攻打了区和市的党委会

房舍，向房間里開槍，把紙張和文件散亂滿地；後來，檢查屋子時發現很多東西被偷走了——其中有專門放在一旁的付薪金的錢。

在沙托拉饒赫伊武裝的匪徒和馬柯的不相上下。那是由地主的兒子包拉茲——他是憑所謂“學生議會”的名義出面的——領導的。他和他的一群武裝分子，強行進入區黨委會的房屋，逮捕了一名委員。由以前的農產品商人和巴蘭科維奇黨的候選人卡洛里·托什里領導的一群武裝匪徒破壞了考爾村黨委會房舍，拿走了文件夾，扯下列寧的像和黨旗，等等。

在村庄里，很多地方都有反革命分子的活动。这些活动的目的在于分散和消灭農業合作社的財產和恢复以前富农的和其他財產。在西貢德，在一个名叫約瑟夫·弗多尔的富农的领导下，他們“分配”了斐多斐農業合作社的土地并且将鋸木厂交給一个富农。

在波羅什波托克，他們放火燒掉了道查農業合作社的一万公斤的干草。

在考爾，他們把当地手工業合作社房舍——合作社合法買來的——還給它以前的主人富农貝拉·法卡什。

在道姆勃拉德，“革命委員會”的首先的行動之一就是准备恢复以前的教堂土地，很快地制出一張旧教堂土地的地契。

普通的偷竊和搶劫也成了反革命領袖和他們的爪牙以及“革命”机构的活動指南。在契翁格勒，在“市長”彼羅什卡的领导下，他們劫掠了33家人家并且殘酷地虐待住在里面的人。他們毀坏了家具工厂經理山道尔·捷琴海姆的家庭。他本人由于工厂工人——工人們把他藏在店鋪里——的幫

助，得以逃跑。

在沙托拉饒赫伊，在挪用公款的（前）罪犯卡洛里·庫姆梅爾的領導之下，“國民警衛隊”搶劫了很多商店。

戴勃萊森“革命委員會”的最初的行為之一是从國家銀行里弄到一筆800,000 福林的貸款來做為委員會的“開支”；這筆款子花光了，而且被算在“革命的賬上”。

聖埃什村的貝拉·黑林，山道爾·黑林，伊斯特萬·阿波托夫斯基，山道爾·迪爾和山道爾·伏斯以及普爾格爾村的格波爾·維赫，季烏洛·霍瓦特，米哈里·塞克萊額愛西和其他一些“革命委員會”的委員扒走了為布達佩斯征收的糧食。在聖埃什的那些人“括”到如此多的錢以至於其中兩個人買了250公分容量的“潘諾馬牌”機器腳踏車，而在波爾格爾的那些人得到了幾張地毯，18塊帷幔，大批馬鈴薯，288公斤豬肉，90公斤的豬油和咸肉，50公斤的糖和其他供應品；他們在14個工廠和企業里募捐，這樣他們淨賺6,900福林。

在齊沙塞台爾凱額，居民卡洛里·歐托卡爾和貝拉·伊勒什穿上蘇軍制服執行死刑或放逐來威脅鄉里的很多居民。

反革命分子的謀殺行為

武裝的反革命分子干出了不計其數的恐怖行為來反對黨和國家幹部、農業合作社的社員和許多其他人。

在沙蒂馬茲，亞諾什·沙斯、安托爾·哥姆波什、亞諾什·皮哈里、約瑟夫·科爾馬額什到前黨書記伊斯特萬·霍瓦特的家里去搜捕他。他們只找到書記的父親安托爾·霍瓦特在家，于是就可怕地毒打他。

在聖馬尔通卡德，納吉卡德区党委会的候补委員米哈里·小貝內的家10月26日遭到攻击。第二天晚上，农业合作社社員、1945年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員米哈里·老貝內被綁走而且被淹死在非里。

在塞翁格勒，生产征收部的领导人被毆打得如此严重以致第二天他才恢复知觉。在貝賽哈里，党書記格波尔·海格伊被毆打了，他的稻草堆被放火燒了。他的不那么值錢的家具被拿出来扔到火里。

在达巴什，警长伊姆雷·考伏契少校在街上挨了打而且被刺伤得很严重。

在馬柯，一个五人特別委员会組成了，这个委员会开了一份要处死刑的共产党員的名单。

在西貢德村，反革命分子也准备了一份要处死刑的65人的名单，甚至“雇用”了一个劊子手貝拉·苏普，他曾在監獄里服务过8年并且以“每一个头”100福林的代价担任劊子手的工作。

在基什孔迈薩，在貝拉和弗倫克·克魯楚——这两人都有監獄記錄——的教唆下，基什孔迈薩的居民伊斯特万·波齐，馬特奥什·科罗姆波尔，伊斯特万·迪尔和馬特奥什·小霍額特克，受到严重的虐待，后来村人民會議的商業部的一个較年老的雇員約瑟夫·尼梅額伊被打死，他們用一根旗杆戳进他的身体。

在桑克，亞諾·維萊什和拉斯罗·霍拉斯把桑克人民會議的一位工作人員伊斯特万·梅德乔西从家里誘騙出来用一把屠夫的刀把他杀死。

孔薩尔洛什的一个馬販子伊姆雷·魯卡契·納吉和他的妻子以及伊斯特万·托波齐破坏并燒毀了农学家帕尔·

佐納的房子。

在斐多斐伊薩洛什，当地居民約瑟夫·陶特、山道尔·陶特、蒂波尔·包尔薩因为在伊姆雷·赫·陶特(人民會議的一位工作人員)家里沒有找到他，把他的农場房子破坏得不能居住，还狠狠地毒打他家里的人。

10月29日，在卡魯契村，有四个人名叫里茲馬雅、哈拉淨、斐伊勒和格什帕尔强行进入前人民會議主席后来的农業合作社党書記約瑟夫·波格罗的家里，打他并用一把刀刺死了他。

10月30日，在布吉伊村，从另一个村来的本亚明·斯姆萊克，开枪打死了“新生活农業合作社”的主席拉斯罗·兰吉艾尔。

在塞格萊德，反革命分子开枪打死了警察局的職員亞諾什·貝凱希。

在达額，一个当地居民伊斯特万·汗古齐，在警长弗洛里安·拉薩尔少校回家途中伏击并打死了他。

首席檢察官关于奥茲德暴行的报告

1956年10月29日，奥茲德“国民警衛队”的司令伊斯特万·德萊克，在“警衛队”的协助下，逮捕了当地的警察，并且解除了他們的武装，把他們赶到墙角。

工人委員會的委員們为了要平息伊斯特万·德萊克而且要給警察一个逃跑的机会，便把德萊克請到警察总局的另一間屋子里。德萊克在离开以前，命令国民警衛隊員們在他放一下手槍为暗号的时候，就向警察射击。

当伊斯特万·德萊克和工人委員會的委員們談話时，他表現得非常激动，以至在那里的几个人想要抓住他。德萊

克在掙扎中，想法抓住了一支手槍而且開了槍。手槍放了以後，院子裡的“國民警衛隊”隊員中間發生了混亂，於是開始了射擊。他們以為警察總部向他們開火，於是便朝屋頂開槍。站在牆角的警察就趁這機會逃跑了。

當射擊正在進行的時候，有人把這個消息帶給奧茲德冶金工廠的工人說警察和國家保安局人員攻擊了“國民警衛隊”，而且一部分攻擊者正向工廠走來。工廠的擴音器向工人宣布了這個捏造的消息，並且號召他們武裝起來，到警察局去。工廠的汽笛立刻拉起了警報。糊塗的、激動的工人羣眾離開了工廠，用鐵錘，鐵撬，鋼纜，鏟子等武裝了起來。一部分工人衝進工廠的防空洞，搶走儲藏在那裡的武器和炸藥。

狂怒的暴動者衝到大街上。“國民警衛隊”的一支隊伍包圍了警察局並且阻塞了所有通向警察局的道路。當時他們阻擋檢察署的一位調查員費倫克·霍爾寧，他是到火車站坐火車到米什科爾茨他工作的地方去的。由於他在奧茲德是一個陌生人，他們要求看他的證件。“國民警衛隊”人員檢查了他的證件，驗明他是檢察署的職員，他們不承認這些證件，說他“可能是一個國家保安人員”。他們找到霍爾寧的公務手槍，使用武器來威脅他而且要把他帶走。霍爾寧為了自衛，企圖推開對着他的一支槍的槍筒，接着拿那支槍的人開槍了，子彈朝著一個九歲模樣的孩子的射過去，沒有打着，但是“國民警衛隊”的人，在走向工人委員會辦公室的路上，散布謠言說他們捉到的“國家保安人員”打死了一個孩子。不久羣眾之間流傳着一個新聞說霍爾寧打死了幾個孩子。

費倫克·霍爾寧遭到毒打之後，被帶到工人委員會的辦公室的。激怒的暴動者要求把費倫克·霍爾寧交給他們。

几分鐘后他們的要求达到了，工人委员会把費倫克·霍尔宁交給了人群，他們就毆打他了。他們打他，踢他。对霍尔宁处私刑的两个領头人是扫烟囱工人拉約什·米什科維奇和貝什托兰·康約。后者当霍尔宁企圖逃跑的时候用一把小斧子劈他的脑袋。米什科維奇也用他的鉄鈎子敲打他的头。

康約和米什科維奇领导的暴动者，把霍尔宁踐踏得奄奄一息之后，他們把他的脚捆在一起拖到工厂里，要把他投入溶鋼爐里或者吊在起重机上。工人们不允許把尸体拖进工厂的土地上，因为“它要弄脏工厂”。瘋狂的暴徒于是又把霍尔宁的已經沒有生机的身体拖回到工人委员会办公室前面的廣場上，并从一个救火器具的柜子里拿出繩子，把他倒吊在办公室前面的一棵栗树下。

对霍尔宁的私刑并没有平息暴动者。武装的成群的人在市鎮上徘徊搜尋警察和其他可“怀疑”的人。一群住在塞納村的以前的宪兵抓住了这个机会行动了起来。离他們的家不远的地方住着一位国家保安局中尉約瑟夫·霍瓦特。那天早晨他碰巧在家。約瑟夫·霍瓦特快五十岁了，是三个孩子的父亲——按照他的历史他可以复員了——沒有听从好心的人劝他躲到树林里去的警告，并且說他沒有犯过什么罪因此沒有理由要离开他的家庭逃跑。

以前的宪兵坐了一輛淡綠色的斯科达車到了約瑟夫·霍瓦特的家里。他們一部分看守着霍瓦特家里的人，其余的人帮着把他拉出去。由于人群太挤，他們不能够把約瑟夫·霍瓦特带到工人委员会办公室前的廣場上去。后来他們把他从車上拖下来，捆綁着双脚；其中一个人在他头上打断了来福槍的槍柄。（几天以后有人还在大街上見到那折断了的槍柄。）霍瓦特當場被这一击打死了。曾經吊起費倫克·霍

尔宁尸首的暴徒現在把約瑟夫·霍瓦特的尸首拉着脚拖到廣場上,也吊在栗树下。

發生了前述的可怕的事情以后,一些到現在尚未判明身分的人物在大街上抓住警察偵探上尉捷格蒙德·契·納吉,把他拖到暴动群众面前。当捷格蒙德·契·納吉看見两个牺牲者吊在树上的时候,他轉向暴动者請求他們放他走,因为他沒有做錯事。他們不理睬他的請求,拉着他的头髮拖他,然后扔到地上,把他同其他两个受伤者一起活生生地倒吊在栗树下。

对捷格蒙德·契·納吉施加酷刑的主要人物是汗可額的居民約瑟夫·科斯卡。科斯卡好几次用一把干草叉戳捷格蒙德·契·納吉的身体。当他想戳穿那吊在树上的身体几次都失敗以后,便跑到工厂里去磨他的叉子。回来后,他开始把草叉戳进捷格蒙德·契·納吉的身体里,干这勾当的时候还野蛮地咒罵着。約瑟夫·科斯卡的特別殘忍的行为可以用以下的情況最好的加以解釋:大約一年以前,科斯卡在搬运貨物的时候,曾經从他的受害人那兒偷了一只手表,而后者在后来曾經發現是誰偷的。

这些只是放縱的反革命分子在匈牙利城市和乡村在那几天里干下的恐怖行为中微不足道的一部分而已。普通的老百姓像农業合作社主席拉斯罗·吉艾尔、前土地改革委员会委員米哈里·老貝內,村党書記約瑟夫·格勃罗,檢察署工作人員費倫克·霍尔宁以及很多其他的人在凶暴、殘忍的白色恐怖下牺牲了。这就是法西斯分子、以前的警官、宪兵軍官和箭十字党人,联合起普通刑事犯所干的反对匈牙利人民,反对人民的自由,反对匈牙利民族很多杰出的和勇敢的兒女的一次嘗試。

約瑟夫·杜达什及其匪帮

以約瑟夫·杜达什为首的武装起来的政治冒險家匪帮在十月事变之初就从陰暗中出现并且很快地就扮演了主导的角色。

杜达什，44岁，生于德兰斯瓦尼亚。据说他是一个工程师——但他的文憑是在何处、何时和如何弄到的，却始終是一个謎。年青时，他参加过德兰斯瓦尼亚的工人运动，但后来他就做了羅馬尼亚秘密警察“西古朗薩”的情报員了。

1940年他离开羅馬尼亚，到了布达佩斯。战争将结束时，他設法鑽进了抵抗运动。虽然事实上杜达什从未反抗过德国占領軍，但拉卡托什法西斯內閣在1944年却将他和其他的人一起任命为“抗战代表”参加米克洛什·霍尔蒂派往莫斯科去同苏联政府談判匈牙利投降的代表团。

在解放以后，杜达什成了布达佩斯市政当局的成員，代表小农党。1946年末，他因被怀疑参加一个企圖推翻政府的反革命陰謀而被逮捕。后来他被移交給羅馬尼亚当局，羅馬尼亚当局因他战前作过警察局情报員的工作而把他判处了徒刑。他一直被监禁到1954年，释放后回到布达佩斯，在工厂中做工到十月事变。

在布达佩斯暴乱期間，杜达什又出头露面，寻求作反革命領袖的政治生涯了。他和他的同伙成立了布达佩斯第二区的所謂“民族革命委员会”，以杜达什为主席。他們把暴徒

和青年組織成武装大队，并宣布杜达什为“总司令”。他的副官們都是前霍尔蒂軍官和其他法西斯分子。这些匪帮从事反对政府和公共秩序的暴力行为，目的在擴張杜达什的势力。此类匪帮中的最初的一伙是杜达什那伙人在第二区成立的，其头目之一是有过罪案的亚諾什·薩波。在停火期間，一队武装匪徒占領了共产党的报纸“自由人民报”的总部，他們并且在那里又組成了几个队，由前霍尔蒂軍官帶領，入伙的人許多都是些逃跑的罪犯。从那时起，杜达什就成了一个并不存在的全国性的“匈牙利民族革命委员会”的自封代表。他手下的各个匪帮以該委员会的名义攻打手無寸鉄的人們，主要是攻打共产党人、劫掠科尔文百貨公司并且謀杀了許多人。

到了11月初，杜达什就已經感到自己是掌握大局的人了。后来他自認曾經会見過馬勒特，商談革命軍的統帥問題。他还曾作为中央当局的代表同作家协会和其他团体等进行过談判。

見証人的証詞証明，他最近的活動使不少無辜的人喪失了生命。

对于严重危害人民民主政权利益的政治、經濟犯罪行为，应由总檢察长担任初审起訴人。对此种案件，法律(刑法第二十三条甲，第一、二、三款)規定应进行秘密审訊。因此，杜达什及其同伙一案是秘密审訊的。杜达什及其同伙的主要罪状是：圖謀推翻人民民主政权。

起訴書提出了如下的主要罪状：

“1956年10月28日，杜达什写成內容包含25点的顛复性文件一册，强迫‘自由人民报’印刷厂把它同其他几本具有法西斯傾向的小册子一道印刷出来。这



約瑟夫·杜达什——并不存在的“民族委员会”的主席。



亞諾什·薩波, 約瑟夫·杜达什的副官之一, 賽納廣場暴行的頭目。

种小册子向全国散發數十萬册。

“杜达什反对合法的政府。他在小册子中宣称, 他和他的一伙不承認政府。宣布停火以后, 他在10月30日的‘匈牙利独立报’上說, ‘不会有放下武器的事, 自由战士们將繼續武装着并且將公开携带武器。携带武器許可証是由民族委员会頒發的, 只有在自由战士扰乱公共秩序时, 警察或武装部队人員才能查看他們的証件。带有民族委员会証件的武装人員只能受他們自己的队伍的逮捕。’”

杜达什的意圖——这是他想仗着他的武装匪帮用武力加以實現的——是: 他, 杜达什, 和“民族革命委员会”應該取得对全国的控制。一开始杜达什就替該委员会要求六个部长的职位, 其中有国防部长和內务部长的要职。在攻占“自由人民报”的总部和印刷厂后即行出版的杜达什报纸

“匈牙利獨立報”竟要求聯合國承認杜達什和他的委員會。
該報稱：

“現請求安全理事會承認匈牙利民族委員會（指包括杜達什在內的委員們和主席——英文版編者注）和自由戰士司令部（按杜達什為最高指揮——英文版編者注）為交戰方面，並請派遣一個停戰委員會到匈牙利來。”

該文第十點中宣稱：“我們不承認現政府”，那就是說，伊姆雷·納吉政府。

當然，杜達什並未把他的活動只限于提要求和進行威脅。他利用政府的軟弱無力，依靠他的武裝力量行動起來了，那些武裝力量大部分是由逃跑的罪犯組成的。他在“自由人民報”報館中急忙地建立起法庭，以拿破侖的姿式在那兒接見西方的新聞記者和攝影記者，向報界發表聲明，分封高官厚爵，或者簽署逮捕令。11月2日夜間，他組織了對外交部的進攻，力圖占據大樓并替他的“委員會”奪取印信。

他的小冊子和他所編的報紙大大有助於煽動、傳播反革命的瘋狂情緒和血腥屠殺的氣氛。

杜達什匪幫的恐怖行動和劫掠——單是劫掠一項便造成價值數百萬福林的損失——的進行都是得到“首腦”的知悉和批准的，並且不少是由他首倡的。這些事實在審判中起了相當大的作用。被告們不能否認他們為奪取政權的目的而進行的主要武裝行動，他們的報紙的行動也是不能否認掉的，他們不得不承認這些。雖然，他們極力抗辯說他們沒有犯盜劫、掠奪、殺人之罪，他們把罪過推到他們已經逃走同伙身上。但是在物証和人証的壓力之下，他們的罪狀無可辯駁地定案了。

杜达什指揮着兩股武裝匪徒。一股駐在賽納廣場和馬羅什大街，由上述的亞諾什·薩波和其他人帶領。另一股將“總部”設在“自由人民報”大樓，杜达什安置了一個前霍爾蒂軍官安得拉什·考伏契——他在警察局也有案子——來帶領這一隊。

亞諾什·薩波，59歲，曾因非法越境和間諜罪服刑。他承認在10月25日加入到叛徒里面，三天后杜达什要他帶領賽納廣場和馬羅什大街的一隊，任命他為中校。

皮里什維萊什瓦爾的伊斯特萬·考伏契，18歲，他的庭訊証詞揭露了薩波一伙中的首腦人物以及他們所犯的好幾起殺人命案：

“我知道薩波是司令官。10月27日，當我到布達佩斯來的時候，我便卷入了十月事變，再不能回家了。於是我和別的一些人到了賽納廣場，在那兒人家給了我們武器。我一直守衛着大門。有一次我在馬羅什大街‘薩波大叔’的門上站崗。關於指示，我什麼都不知道。我知道一個癩腿的男孩子被殺死了，因為據說他曾向蘇聯軍隊檢舉我們。一個名叫愛爾齊的女孩子把這件事告訴了我。她說‘薩波大叔’的人因為那個癩腿男孩曾經檢舉他們而殺死了他。一次有一個年青的國家保安人員到賽納廣場找‘薩波大叔’。他被捕了，據說他是來偵察我們的。他被關在地窖里，後來被殺死了。

“在馬羅什大街，第一連連長也被殺死了，據說是因為他企圖引我們走錯路。

“有命令要抓國家保安局的人。偵察兵告訴我，奉‘薩波大叔’的命令，他們曾把國家保安局的人帶進來，一共是51人，其中兩個是婦女。

“11月4日，薩波警告我們不要放下武器。有一支擁有48人的特遣隊，但我不知道他們歸誰指揮。他們是屬於‘薩波大叔’那一群的”。

見証人在回答副檢察長的訊問時說：

“我親自看見曾來賽納廣場的那個國家保安人員的屍體。”

見証人回答一個關於被告亞諾什·薩波的問題說：

“那人是活着被帶進地窖的，隨後蒙上一條毯子被抬了出來，但那時他已死了。我們甚至還看過他的臉。”

特列茲·古斯曼，16歲，一個曾經屬於薩波武裝匪幫的女服店學徒，確証考伏契的口供如下：

“一個國家保安人員據說在馬羅什大街的兵營中被殺害了。我是從一個叫做伊斯特萬·科契什的人那裏聽到這件事的。據說那人把那些尋找國家保安局高級軍官的人們領錯了路。別人告訴我說，他是按照‘薩波大叔’的命令被槍斃了。我還聽說他們殺死一個據說做過蘇聯諜報員的癩子。這是一個名叫厄爾西的女孩子告訴我的。”

蒂波爾·塞伊費爾特，36歲，生于納吉塞班，統計員，杜達什匪幫的軍官之一，曾被杜達什任命為中校，領導了對外交部的進攻。他提供了有關亞諾什·薩波和他的一伙的証詞如下：

“標志着薩波一伙的特點的，主要的倒不是無紀律，而是匪徒作風。他們攔阻並且射擊汽車。薩波一伙也把國家保安局的人交給我們，但我不是把他們放掉就是把他們移交給弗街。

“我在五日以後聽一個名叫安托爾·許培爾的人

說：在賽納廣場，薩波打死了兩個騎機器腳踏車的人。薩波并不服從任何人。甚至在停火期間他也总是對搭客的車子開槍。

“我听薩波一伙中的人說，在沃羅斯·哈德色列格路上有好幾個國家保安人員被打死。

“賽納廣場的那一伙乃是一群暴徒。薩波老是把機關槍挂在脖子上整天地到處跑；他像是一個神志失常的人。”

关于總部設在“自由人民報”大樓的另外一伙匪幫，總檢查長的起訴書如下：

“杜達什在前‘自由人民報’大樓設立總部。在他指揮下的一伙武裝匪徒從事謀殺，帶走黨的工作人員，其中若干人已失蹤。”

集中在“自由人民報”的武裝叛徒是在一個前霍爾蒂軍官、杜達什的副手之一安得拉什·考伏契的有效控制之下的。另一個領導軍官是一個被稱做“非利大叔”的人，他以陶特中尉的假名進行活動。事實上他乃是另一個霍爾蒂軍官，原名為費侖克·帕爾哈齊。

雖然他們的行動還未完全揭露，但一些見証人和記錄材料業已將要點透露了。

約·弗·，一個印刷所的工作人員供述如下：

“就我所能看到的，在‘自由人民報’大樓中約有200名武裝匪徒，他們——據我了解——曾得到約瑟夫·杜達什的命令，以11月1日起，不准外邊的人——不論他們是什麼人，甚至連印刷工人也在內——在大樓中過夜；衛兵得到命令，遇有任何人出現，不必警告即行開槍。我還知道匪徒們把印刷工人的櫃子強行打

开，偷去他們的工作服。我更知道，逃跑的犯人曾在那里换衣服。这也可以由这个事实证明，条子布的囚犯衣丢得满屋子都是。”

在“自由人民报”大楼設立总部的叛徒們經常搶劫街对过的科尔文百貨公司。

这里是科尔文百貨公司雇員吉·恩·証詞的摘要：

“在11月4日和那天以后，武装匪徒从‘自由人民报’大楼来到科尔文百貨公司……他們一小群一小群地进来，并且要求我們打开庫房以便他們取衣服。就我所記得的，那些冲进百貨公司的人里为首的是一个叫做‘非利大叔’的人……除大量的衣服、靴子之外，匪徒們还就近搶去了表和照像机。”

艾·比·的証詞引述如下：

“好几个从‘自由人民报’大楼过来的武装匪徒都穿着囚犯服；他們显然是从監獄中放出来的罪犯。这些从前的罪犯以及其他武装匪徒偷去了大量的衣服。就我能所判断的，約有300名武装强盜在百貨公司换了衣服……百貨公司由于武装反革命分子的搶劫而遭受的损失，估計大致有三百萬福林。”

武装反革命分子們把他們迫害的对象带到总部并关在那里。关于此事，百貨公司一个年老的女工作人員陈述如下：

“1956年10月31日早晨，我受到警告說，反革命分子在百貨公司找我，我最好回家去。我穿上了衣服，就要离开大楼了。当我从职工出入的門出来时，我看到五个武装青年人同百貨公司已辞退的两个工作人員，彼得·沙尔巴塔基和伊斯特方·包德杭諾茨基一起站在

那里。(其他人作証說，这两人是因盜窃和侵吞公款而被解职的。)当我向前走的时候，沙尔巴塔基向我奔来，抓住我的头髮，把我摺在地上……然后他們把我推过大街，推到‘自由人民报’大楼的萊克·西拉德街的大門口，对我横加污辱詬罵。我被領到二楼的一間屋里，那兒有个名叫安得拉什·考伏契的，是約瑟夫·杜达什的副手，在指揮着。我进去之后，他們搜查我，拿走我穿戴的一切。我的帆布提袋、自来水笔、自动鉛笔和一些吃的东西都一去不复返了。他們叫我靠着牆，两手反翦背后，于是审問开始了。审問是由安得拉什·考伏契进行的。

“后来，另外的几个人也被带进这个房間。我記得到傍晚时我們一共是十二个人，其中，連我自己有三个妇女。据我判断，被带进来的人是国家安全局的人員，还有軍隊和警察人員。屋內有带机关槍和手榴彈的守衛。在审問中有好几次武装匪帮的‘軍官們’插进来提問題。他們中間有一个叫做‘非利大叔’的人和一個黃头髮、帶眼鏡的年輕人。在晚上九时左右，房間里乱了一陣，显然地每个人有些發慌，等待着司令官杜达什进屋。杜达什穿着黑馬褲，用帶子扎紧的高筒靴和便装上身。他的举动显然像个發号施令的人，給別人下着命令。”

見証人吉·思·的証詞揭露了“自由人民报”大楼中那些“猎取活人的猎人們”所从事的恐怖行为：

“星期一(11月5日)上午7时，我瞧見大門(意指什陶伊大街13号的入口)右手边約五、六公尺远近之处有三具尸体，其中兩具穿便服，一具穿着苏联制服。从

他們躺臥的樣子看來，顯然他們不是在当地死的，而是被拖到那里去的。随着血迹就可以很显然地追踪出他們被拖过来的路綫，那血迹一直引向萊克·西拉德和什陶伊两条大街轉角上的那棵树旁。那棵树位于科尔文百貨公司的一角，正对着科尔文飯店的第一个窗子。”

被告列索·伏尔格，生于1938年，是拉科什森米哈伊的居民，在警察局有案子，他証实了以上的陈述并且还講到另外几件杀人案。

“我以侵吞公款的嫌疑被拘押在馬尔科監獄。十一月二日我們被放出来了。一听到叛徒总部在‘自由人民报’大楼，我就去那兒报到了。指揮官是安得拉什·考伏契，給我武器的就是他。当夜，他們带进来一个名叫沙尔卡齐的檢察长。我們看守他和另一个人。后来我們把他們拉出去带到科尔文百貨公司后面，两人都在那兒被处決了。”（注：那“另一个人”是中尉帕尔·弗多尔。他們的尸体曾被見証人吉·思·所看見。）

“抓到的人被带到哈尔什法大街的警察局。其中有些人准許离开，但国家保安人員却不行。

“这一帮在凱茲塔尔沙沙格廣場上处決了三个俄国人，在‘日夜熟食店’中处決了一个苏联軍官。这些处決都是考伏契亲手执行的。

“在6日，我們都到科尔文百貨公司那边去了。一个叫做‘非利大叔’的人带进来两个人，他在科尔文的院子里把他們杀死了。第二天他又对一个叫做貝拉·薩波的人干了同样的事，据說那人曾告發了我們。有一次‘非利大叔’夸口說曾經在樓上用他自己的刀子刺杀

两个人。他的衣服上染滿血迹。

“一天，在巴罗斯廣場，我們俘虏了六个国家保安人員。其中两个負伤的，由我亲自带到了‘雅典印刷所’。剩下的四个人中，一个头上中彈而死，考伏契带走了一个，‘非利大叔’带走了两个。沙尔卡齐和同他在一起的那个人是在4日晚上被处决的，其他的人則是在那天以后”。

审判材料表明，約瑟夫·杜达什是依靠由霍尔蒂軍官和罪犯所編成的武装匪帮建立起他的权力的。这些匪徒犯下無数普通罪案，他們进行搶劫、屠杀，以胁迫人民，借以摧毁人民民主制度和建立杜达什的統治。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最高法院軍事法庭判处約瑟夫·杜达什和亞諾什·薩波死刑。此項判決已于1957年1月19日执行。

西方資本主义和匈牙利事件

——西方报刊述評

(一) 煽起火燄

西方对各人民民主国家內政的干涉以及它利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反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殘酷斗争，实質上已經进行了好几年了。参議員麦卡倫1951年8月6日在美国参議院的演說中（見当天的美国国会記錄），曾經強調指出向正在建設社会主义的各国展开侵略性的斗争的重要性。他在演說中說，他倡議：

“給予共产党控制地区內的地下叛乱团体以最大的支持，同逃离共产主义而現在正可怜地住在西欧以及亚洲大陆的边緣的好几十万流亡分子进行公开而有效的合作。……同样也沒有理由使我們自己的攻势限于政府的行动。有很多事情是一个政府在和平时期不能公开地做的，然而可以通过私人团体来做。就我們这方面而言，我們正在做着某些这一类的事情。‘自由欧洲’委员会就是一个例子。它已經設立了一个针对衛星国地区的無線电广播系統。可是这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各种可能性是無限量的。”

麦卡倫参議員所提到的“各种可能性”包括准备、組織和掀起武装陰謀和暴动。1955年春，在美国制訂了“反对世

界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的詳細計劃。这个計劃規定了武装行动的准备工作，而这些武装行动牵涉到从各人民民主国家潜逃的叛徒們。据美国报刊报导，美国無線电广播公司的董事长戴維德·沙尔諾夫在綜述将做些什么的时候，曾經說过：应该大量地利用从組織完竣并且經過良好訓練的反共团体中征募来的人員。根据他的意見，这些人在将要到来的紧要关头应该有可能作为領袖人物而回到他們的国家去。应该从流亡分子中組織十个人到一百人的軍官支队。他們应该处于准备好的状态以等待适当的場合和时机。

組織上的准备以外还有思想上的准备。自由欧洲委员会的理事阿道夫·柏尔利綜述暴动的思想准备的一篇演說，就是許多証据之一。柏尔利先生是一个前美国外交官，在1938到1947年任助理国务卿。上述演說是在所謂“自由欧洲大学”發表的。那所大学在斯特拉斯堡，由“自由欧洲”委员会这个美国組織負責維持，實質上是一个情报工作的訓練学校。这所“大学”的学生是由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流亡分子中挑选来的。1951年12月1日的“曼徹斯特衛报”透露說：

“学生必須尽速在环境許可时回到他們的祖国。的确，他是被作为新的精华人物的一員而加以訓練的，这些新的精华人物在各人民民主国家被‘解放’时将把这些国家拿过来。”

1952年3月13日，“紐約时报”关于这所“大学”的学生有如下的描述：

“其中有些人希望战争早日爆發，認為这是重新打开他們的老家最可能的办法。”

柏尔利先生就是对这所“大学”的学生演說的。演說的内容以及后来用匈牙利文通过国际文化关系协会的途徑来

散發这个演說，表明柏尔利先生把协助顛复欧洲各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他的职责的一部分。

在他的演說中，柏尔利先生把最崇高的任务規定为：干脆移走共产主义这个阻碍走向作为二十世紀革命的基础的新的偉大目标的障碍物。

根据柏尔利先生的意見，美国当然應該起领导的作用。他說：美国既然在使資本主义社会化方面获得成功，就有权利告訴一个从共产主义桎梏下被拯救出来的国家說，“我們知道怎么做。”

在当前反共斗争中的思想方面的主要战术，就是貶低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間决定性的差別，尽可能消除两者之間的鴻沟。柏尔利先生坚持說：在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只要有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只要每一个人都能向往于幸福，那么，到底铁路系統和工厂是由私人公司还是由社会主义的机构控制，这是無关紧要的。他还說：对“我們”來說社会主义的内容比它的外在形式更为重要。

柏尔利先生声称：只要他們高兴，那么，制度在名义上到底被称为資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是沒有实質意义的。他宣布說，絕大部分准备已經完成，不过他不能無所顧忌地說出将要在适当的时期到来时动手干这件事的人的名字。

柏尔利先生的演說（其譯本曾在匈牙利境內散發），無疑地是干涉了其他国家的內政。但是还有屬于另一完全不同性質的关于西方干涉匈牙利的种种証据。例如，匈牙利軍隊的一名戴少校10月28日在賽納廣場同一些武装队伍就他們的投降进行談判后报告說：

“絕大部分带头的人贊成放下武器并自由离开。一小部分十分頑固的头子却坚持要繼續打下去。有一个

名叫爱克兰的代表这一批人声称：他們从上头得到明确的指示要繼續斗争。……爱克兰轉向我說，‘因此，我們必須打下去，而你可以告訴派你来的人說：今天晚上……这些（原报告在这里列有三个外国公使館的名字）和其他一些公使館向我保證：明天将有来自西德的增援。’然后，有些人說：武装反抗并不是在10月23日組織的，而是远在1953年秋天就开始組織的。……第二天，即10月29日，我們看到賽納廣場的队伍尽管在数量上有相当的减少，可是却占据着原有的障地，不过这一次是用德国的和其他西方国家的自动武器装备起来的。我記得在29日清早，爱克兰和‘薩波大叔’来看我，肩上挂着的德国自动步枪来回晃着。他們要求廢除停战協議。我問爱克兰这一次他为什么反对停战協議。他回答說，他曾經到过外国公使館，并且为了接受停战協議的那些条件而遭到严厉的斥責。”

另一位斯少校也透露了类似的材料。他报告說：来自波恩的一个代表团曾經在他担任过教授的一个大学里訪問过他。他的談話曾經在前面引用过。

比利时的新聞記者雷蒙德·达罗勒在“圖画晚报”上提供了典型的証据，証明紅十字会的运输工具除了被用来运输武器以外，还被用于其他用途。他写道：

“从吉厄尔到首都去的最好办法就是爬上来自奥地利的無数紅十字会卡車中之一輛。这些卡車装有当时所迫切需要的医藥供应和粮食。我們爬上了为我們而停下的第一輛卡車。走了三公里以后，司机就把車停在一間印刷所前。我的同車人很快地就把反苏的小册子和报纸装上車，然后我們又出發了（虽然，我必須承

認，我們是处在一個遠非愉快的狀態)。這些危險物就在蘇聯人的鼻子下被散發到沿着通往布達佩斯的公路的各個村莊。”

除了數不清的法西斯流亡分子、新聞記者和無線電台記者等等以外，其他“更重要”的外國人也出入於匈牙利的國境，而那也是顯然有目的的。某些美國報紙報導說：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擔任戰略服務局（按：系第二次大戰期間和戰後初期的美國主要情報機關）的負責人的杜諾萬將軍，在匈牙利暴亂期間作為所謂“國際救護委員會”的代表而出現在奧地利。據“華盛頓每日新聞”說，杜諾萬將軍在十一月底從匈牙利回到華盛頓，而當他在奧地利逗留期間曾經好幾次越過匈牙利的國境。在華盛頓，杜諾萬告訴新聞界說：幫助匈牙利反革命力量的最好辦法就是向那些仍在繼續戰鬥的人提供武器。當有人問到美國是否在幫助打下去的時候，杜諾萬將軍回答說，這是當然的事情。



佛朗哥將軍的報紙的第一版頭條標題：“西班牙願提供軍隊供國際管制匈牙利領土之用”。

外國報刊的報導中也宣布了外國人對匈牙利的各種各樣的訪問。我們引用11月16日的“新匈牙利”（匈牙利流亡分子在慕尼黑出版的報紙）的一篇文章，作者貝奧特里克·

塞青伊伯爵夫人从布达佩斯旅行归来后說：

“对匈牙利人民最真誠地表示了真正的同情和感情的，有德国的‘馬尔他騎士’的救济組織。”

在罗利唐姆的奥地利公使館，塞青伊伯爵夫人宣布了一个“德国和奥地利的馬尔他騎士代表团”也就是她自己、立文什坦亲王和爱尔茨伯爵的来到。在离开奥地利公使館后，塞青伊伯爵夫人和她的貴族伙伴們直接驅車往明曾蒂紅衣主教的寓所。

“馬尔他騎士”以最多多样化的方式来干涉匈牙利的事务。就是在它的帮助下，两个年青的霍約什伯爵（积极参預奥地利的政治的最富有的貴族家庭之一的子孙）来到了匈牙利。他們都忙于經由奥地利的雷契尼茨村和其他地点而把人員和軍火偷运入匈牙利。人們的确可以感到奇怪：到底这些出身名門的“騎士”們能够提供那一种“帮助”呢？什么东西使得他們慌慌張張地赶往匈牙利呢？

梵蒂岡也不是袖手旁觀的。12月13日的“日內瓦日报”有如下的記載：

“某些匈牙利人显然在責备梵蒂岡沒有給予他們的民族起义以适当的援助。这个意見是十分沒有根据的。……梵蒂岡派出了它的代表（到匈牙利去）。梵蒂岡的一个代表罗德海恩大主教曾經前往匈牙利首都，并且在那兒同剛被納吉政府从监禁中釋放出来的明曾蒂紅衣主教进行商談。在了解了情况并将教皇送給匈牙利天主教徒的一笔錢交給明曾蒂后，罗德海恩就随身带着有价值的一些秘密文件回到梵蒂岡。不久以后，大主教查岡（教廷的匈牙利学院的院长）也做了同样的旅行。他带着匈牙利主教們的書信回到羅馬。后来，一些

特別觀察員被派駐奧地利邊境。他們通過書信同(教廷的)國務院會商。”

在匈牙利國外，不論是在煽起暴動方面或是在發出組織上、戰術上和其他的指示方面起着最突出的作用的是“自由歐洲”電台。好多西方報紙都同意這一點，其中有一些還發現“自由歐洲”電台做得太過火了。慕尼黑的“晚報”甚至要求取締這個廣播電台(這個電台設在慕尼黑)。

“自匈牙利的悲慘事件發生以來，我們的報紙就不斷接到要求、信件、電報和電話，尖銳地對從慕尼黑廣播的電台表示抗議。……‘自由歐洲’電台多年來一直在煽動匈牙利起來暴動，而它最近幾個星期又曾經鼓勵那些叛亂者堅持下去。這個電台答應給予暴動者以幫助，……並且對匈牙利的流血負有責任。‘自由歐洲’電台是由美國國務院資助的。電台的美國人員向美國國務院負責。……假使‘自由歐洲’電台一度曾經有存在的理由的話，那麼，它的任務已經完成了。聯邦政府必須立即把‘自由歐洲’電台的廣播不但在德國而且在全歐洲所引起的緊張和憤怒通知華盛頓。”

11月14日，“紐約先驅論壇報”在談到西德政府對“自由歐洲”電台的活動提出抗議時寫道：

“西德和法國的報紙紛紛譴責‘自由歐洲’電台煽動匈牙利叛亂者起來暴動，而且以答應給予援助來使戰鬥在一切希望都已失去之後還繼續下去。”

最近從布達佩斯歸來的“法蘭西晚報”記者密歇爾·哥爾德寫道：

“我們能夠聽到外國的廣播。它是我們從外面的世界獲得消息的唯一來源。我們聽到一大堆關於布達佩

斯市內的情況的不真實的新聞报导。

“我們也收听从慕尼黑广播的‘自由欧洲’电台的节目。它的激动的語調和拚命地号召暴动当然做了許多坏事。

“在最后一天中，許多匈牙利人告訴我們：‘这些广播引起了大量的流血。’”

东欧問題专家孟德逊在“新政治家与民族”上发表的一篇詳細分析中写道（我們在后面还要进一步引用他的信）：

“与此同时，‘自由欧洲’电台積極地进行干預。它派了一組广播員到吉厄尔（一个由革命者所拿下的外省城市），并且从它在慕尼黑的总台繼續不断地發出战斗的号召。从可靠方面获悉，它广播了由西方給予軍事援助的許多諾言。”

据 11 月 13 日的“新聞报”說：

“他們在慕尼黑、倫敦、巴黎和紐約坐着吃面包夹热香腸和喝威士忌酒来消磨時間时所宣傳的那一套，勇敢而沒有头脑的匈牙利人都当做是聖經里的真理。甚至到了星期二，他們还从当时正遭受猛烈攻击的基里安兵营派一个年輕的軍官到西方公使館去，詢問空运的联合国警察部队什么时候可望在布达佩斯着陆。当他們向他解釋說根本談不上什么伞兵或警察部队时，他完全呆了。”

“自由欧洲”电台通常是發指示給暴动分子和組織反革命运动的机构。其广播不仅限于宣傳的口号，并且也給予战略上的指示。它告訴地下的無綫电台多少波长和如何發报。他們敦促那些武装队伍繼續抵抗下去。例如，伊姆雷·納吉政府一宣布停火，“自由欧洲”电台就煽动暴动分子破坏停

火。据“自由欧洲”电台的軍事顧問兼評論員貝尔上校声称，停火“同木馬計一样危險”。他在10月29日說：

“伊姆雷·納吉和他的同事們想以一个狡猾的現代化的方式來重复木馬計的故事。成为木馬計的停火是布达佩斯政府所需要用以尽可能长久地維持其权力的。自由战士們必須時刻警惕政府的陰謀，因为，如果他們不警惕的話，那么，木馬計的悲剧将要重演。”

如所周知，由于“自由欧洲”电台的刺激和某些西方公使館的不能令人容忍的干涉，停战的确被破坏了。第二天，就在上述广播后的几小时，开始了对共和国广场党的总部和对其他机关的猛烈进攻，以及对成百成千的共产党员和具有民主思想的人的搜杀。

在10月31日的一次匈牙利文广播中，貝尔上校發出了更露骨的指示：

“共产党領袖們必須放弃他們在軍隊中的职位。他們絕對沒有理由待在那兒。为自由而战斗的同志們！要求由你們自己取得国防部长、总司令和參謀长的职位吧！那将是你們最高的保障。”

如所周知，反革命力量也遵守了这些指示；“自由欧洲”电台的要求馬上被滿足了。

同一天，“自由欧洲”电台广播了下述評論：

“內务部和国防部还在他們的手中。自由战士們，不能夠讓它这样。不要把你們的步槍挂在墙上。不要給布达佩斯政府一塊煤或一滴石油，一直到你們掌管國家的內务和国防为止。”

同一天，一个叫做“亞諾什”的新聞評論員在“自由欧洲”电台上广播了政治上的指示，極力主張反对新成立的

“小型內閣”。几天以前，当范圍較广泛的政府組成后，由“自由欧洲”电台控制的“革命”傀儡們反对那个政府。現在根据他們过去的要求已經成立了一个“小型內閣”，但是美国的宣傳却准备好了新的指示要反对它并把政府更推向右：

“小型內閣并不成其为保証。情况是如此的荒唐，以至于即使作为一种暫时的解决办法它也是極端不能容許的。应该做的最重要的事——正如‘自由欧洲’电台所要求的——就是立即組織一个新的全国临时政府，它将把事情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个政府只包括各政党的真正代表和自由战斗的真正領袖。”这就是美国特务的指示。

为使所拟訂的具体政治綱領不致有差錯，“自由欧洲”电台以森古特哈德的“民族委员会”的呼吁的形式，广播了关于退出华沙条約、在国际（也就是西方）监督下举行选举和解散匈牙利駐在国外的外交使团等要求。

（二）华盛顿在匈牙利的魔手

摘自美国記者阿尔伯特·意·康恩的一篇文章^①

多年来，某些神秘而有势力的政府机构，同許多軍事領袖和工業巨头所控制的一些半官方組織一道，都忙于大力地在“衛星国”內組織暴动，这是一个事实。在我的档案柜中，有一些标着“美国在国外的間諜活动”的字样的文件夹，其中藏有一大堆剪报和其他文件。这些資料对照最近匈牙利的事件来看是特別有意思的。讓我提出其中的一叠来。

^① 此段非原文，系从匈牙利文譯出。

牽 綫 者

1948年4月9日，“美国新聞与世界报导”刊載了关于美国在国外的情报和顛复活动的文章。除了談到其他問題以外，这篇文章还說，在华盛顿和在国外，有着这样的一派想法，它希望所謂“X战役”在鉄幕后面采取类似美国“战略服务局”在战时所应用的战术。按照这种看法，应该使用無情的手段，包括必要时进行暗杀在內，使俄国所控制的世界的那一部分动蕩不安。应该向衛星国的地下运动提供款項。

1949年10月30日，合众社报导了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这个局是为协调和促进美国各种各样的間諜組織的工作而成立的）。它說到美国的間諜网虽然乳臭未干，但已經是强健有力而且在稳步壮大。这則消息还說：美国的特务正在全世界暗地里不声不响地工作着。

1950年6月，参議員亨利·卡勃特·小洛奇（后来美国出席联合国的代表团的团长）向国会提出了一項法案，建議允許美国的陆軍征募一万名外国人，据“紐約时报”报导說其目的是要在最后把他們派到鉄幕附近或鉄幕后面地区去。众議員杜威·肖特由于一时發作了“坦白”病，把这个計劃称为“肮脏的勾当”。

安东尼·勒維厄罗在1951年12月12日的“紐約时报”上評論在东欧由美国人（还有那些在“紧要”地区同美国人相勾結的外国人）所进行的宣傳时，把这一宣傳分为三类，即白色的、黑色的和灰色的。他給予它們以如下的定义：

“白色的宣傳是直截了当的公开活动，例如美国之音的广播。……黑色的宣傳隱匿或伪造它的来源。这种

宣傳可以包括：謾罵、造謠、捏造并宣揚別人的丑事，以及其他旨在制造混亂和不信任的活動。灰色的宣傳則用于白區和黑區之間的昏暗區。”

1951年10月，美國國會通過了對共同安全法的一個修正案，提供了一億美元的款項來資助“居住于或逃離……（這裡跟着是社會主義陣營的東歐各國的名單，包括匈牙利在內）的某些經過挑選的人的活動，或是把他們培養成為支持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軍事力量的成員，或是供其他目的之用。”

據“紐約時報”報導，1952年2月曾在華盛頓召開了一次為期兩天的會議。參加的有國會議員、從“鐵幕”後逃出來的流亡分子、教師、外交官和“前共產黨員”。該報說，討論的題目是反對蘇聯及其“衛星國”的心理戰的新技術。會上討論了組織一個將發展到一百萬成員的地下團體來培養“革命氣氛”的成長的提案。

會議的主角之一是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副董事長羅伯特·艾·伏格勒。他剛從匈牙利監獄中服了十七個月的刑期出來（因為他自認曾在匈牙利從事間諜和破壞活動）。

在上述會議後的六個月，成立了一個稱為“美國解放中心”的組織，由伏格勒領導。它宣布其任務為供應45,000名東歐流亡分子以武器，並且給予“鐵幕”後的國家的地下組織網以協助。據說這種活動將導致一次“革命”。

“紐約時報”的一位編輯勒維厄羅在1952年4月號的“國家商業”上所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寫道：特務、破壞分子和一些專家是按照心理戰的最冷酷的方式加以訓練的，儘管沒有任何一個政府官員會承認這一點。有人教他們怎樣靠自己的本領而滲入蘇聯的系統并破壞它。他們也學習怎

样炸毁桥梁、火车和军火工厂，而且受到使用各种武器的訓練。

冒一些流血的險

1955年初，約翰·福斯特·杜勒斯的弟弟艾倫·杜勒斯被任命为中央情报局局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倫·杜勒斯指揮美国从事情报工作和破坏工作的机构“战略服务局”的欧洲組。据“紐約时报”說，艾倫·杜勒斯——沙利文和克倫威尔法律事务所的合伙人，該法律事务所在1930年曾在組織納粹的卡特尔方面进行过合作——几乎从普林斯顿学院一畢業就馬上同情报工作發生关系。

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宣誓就职后，美国的“新聞周刊”杂志曾經說过：艾森豪威尔政府在反苏斗争的过程中准备严重依賴顛复破坏活动，尽管它千方百計地加以否認。据“新聞周刊”說，所以要把这一点保持秘密，是因为华盛顿官方害怕一旦泄露出美国使用这样肮脏的一些手段，将使輿論大吃一惊。

我們不能怀疑这些肮脏的手段在匈牙利沒有达到所希望的结果。

有名的美国新聞記者德魯·皮尔逊在11月8日叙述了一个有趣的故事。远在1950年，一个匈牙利侨民貝拉·弗皮安博士曾告訴皮尔逊关于在匈牙利的“地下准备工作”（他同它保持着密切接触）。他告訴皮尔逊說：匈牙利人民要暴动，匈牙利将第一个起来反抗苏联主子，他十分了解匈牙利农民中的动蕩不安，而只要美国帮一点忙，在匈牙利将燃起大火。皮尔逊問弗皮安：为什么他認為美国政府可能帮忙。弗皮安回答說：美国除非冒次險就不能取得胜利。他还

补充說，美国可能必須冒一些流血的險。

但是，事实証明，到了的确要流血的时候，美国的情报机关却想只用匈牙利的血来冒險。

(三) 匈牙利叛徒們所扮演的角色

参与匈牙利事件的最活躍的力量当然是过去已經背叛了祖国的匈牙利政客、軍官和宪兵等。有关的資本主义机构努力使这些逃亡者能够無所阻碍地进行活动。柏林的“晨报”报导說：

“在十月的最后几天，爱什契維伊勒矿业公司的管理当局給予它所雇用的匈牙利逃亡者和霍尔蒂法西斯分子以假期，使他們能够参加匈牙利的反革命。……爱什契維伊勒康采恩是由西德、卢森堡和比利时的股东所有的。”

“新德意志报”也宣布說：“其他許多西德康采恩的董事会，在收到有关的紧急建議以后，也对它們所雇用的匈牙利人”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与此同时，所有在伏盖尔維赫的美国劳动营工作的匈牙利流亡分子（其中大部分都屬於非法的箭十字組織）也被遣散并且据說一下子失踪了。”

11月9日，皮尔逊在“每日鏡报”上报导說，最近，在十月事件的前些时候，几乎所有各人民民主国家的重要流亡分子都聚集在巴黎举行了一次會議。美国駐西德的軍队的一名少校艾·杰克逊也参加了會議。在提到杰克逊少校同中欧各国（首先是匈牙利）的流亡“領袖”們在那个特殊的时刻所举行的“偶然的”會議时，皮尔逊提出了这样的問題：到底會議的参加者是否得到即将到来的事件的事先通知。

由五名匈牙利將軍組成、代表匈牙利流亡者組織的主要軍事團體的一個委員會，也出席了會議。該委員會（自稱為匈牙利國防會議）的呼聲書曾刊載于西德的“歐洲民族”（一個所謂“為歐洲的復興服務”的月刊，實際上是前納粹黨衛軍分子辦的一個刊物）。呼聲書請求整個“自由”世界支持“匈牙利自由”的事業。在呼聲書上簽名的不但包括像前納粹將軍費倫克·基什鮑爾納基·法卡什這樣的人，而且還有哈布斯堡王朝的約瑟夫大公本人。

關於逃往西方的匈牙利叛徒們的活動，曾有过無數的報導。10月29日，奧地利的“無線電傳真報”寫道：

“在尼克爾什多夫附近越過邊界的一名自由戰士的軍官說：他是到薩爾什堡去同住在那兒的匈牙利流亡者聯系的。”



10月31日的“新德意志報”刊登了來自加拿大渥太華的上述報導：

“據西方通訊社消息，匈牙利自由退伍軍人協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霍尔蒂法西斯政权垮台后逃往加拿大的流亡者組織）曾經征募志願軍參加匈牙利的斗争。到現在已有一千名法西斯分子志願參加。他們將帶着全副軍事装备空运往匈牙利。”

在薩尔什堡这个間諜和流亡者組織的中心，10月31日的“薩尔什堡日报”也报导如下：

“奥-匈边境的交通是有来有往的。同时，从匈牙利提出要求‘西方式的民主’的各‘自由电台’并不真正建立在匈牙利西部，而是流动的美国电台。”

“在薩尔什堡，如同通常一样，美元在滚向赫尔布鲁纳大街的所謂‘匈牙利局’。这个局从来不掩飾它靠美元而存在的事实。目前，这个局已經在匈牙利流亡者中間开始了一个运动，要把霍尔蒂政权所留下的‘人力’秘密送往匈牙利。”

“成百的匈牙利流亡者聚集在薩尔什堡的火車站，等着被运往匈牙利边界。在那兒他們将进行一番准备以便到布尔甘兰德去工作。等着他們去做的工作的性質可以从以下事实中清楚地看出：在边界迎接这些所謂‘自由战士’的先生們是講英語的。”

当然，为了“在布尔甘兰德工作”而被征募来的匈牙利流亡者就在匈牙利边界上編好队以便参加匈牙利的战斗，而他們正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越过国境的。組織他們的中心有好几个。除了上述的匈牙利局以外，由一个名叫伊斯特万·鲍尔托的流亡者领导而地点設在薩尔什堡伊格納什—哈尔莱尔大街2号的匈牙利“卡里托什”組織也起了突出的作用。在十月的严重的日子里，它是一个忙碌的地方。各色人等坐着釘有美国和德国牌照的車子在街上出現，并且同

臭名远扬的匈牙利叛徒們商談。特別是在10月27日，甚至于在那一天的前后，曾有大批的流亡者从薩尔什堡的总火車站出發。其他的人在阿特瑞—普契罕姆和威尔什車站同他們会齐。在最初几天，約有200名流亡者从凱馬坦、匈格堡和萊青瑞的难民营出發。紐倫堡附近的秦道尔夫难民营空了好多。在薩尔什堡的罗利廷难民营（邻近紐托尔夏希）也进行了組織工作。在剛逃出匈牙利不久的人們中有着类似的計劃的一些人都集中在那兒。这个难民营也就是前匈牙利流亡者的总參謀部。

絕大部分住在薩尔什堡的匈牙利流亡者“碰巧”就在那几天离此而去。例如，住在薩尔什堡华尔夫—德特里契大街10号的渥斯卡尔·約凱尔福魯賽（前霍尔蒂的軍隊的上校和美国多年来的特务）就在匈牙利發生暴动的前几天从薩尔什堡消失了。这位先生曾經常同前霍尔蒂軍官、希特勒軍隊的軍官和納粹党衛軍的軍官碰头。彼得·沙勒伊穿梭般地来回于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間。他有一段时期曾經住在威尔什的第1901号难民营。这个难民营是由美国反間諜部队(CIC)主持的，通常被称为“暗杀者的学校”。

在許多难民营里，匈牙利的和其他的流亡者受到有系統的訓練。破坏者在被派往各人民民主国家以前，先在無線电訓練班和其他訓練班里受到訓練。訓練班的負責人之一是林茲的一名名叫什·維爱山托尔的工程师，而受訓練的匈牙利人是由一个名叫納道伊的上校征募来的。納道伊的总部設在庫夫什坦。在十月事件前几星期，維爱山托尔和納道伊訪問了匈牙利的边界，檢查了已移走技术障碍物的狭长地带的寬度。不論是納道伊或是維爱山托尔都是为美国人工作的。而在其他許多場合，他們的会晤地点是維也納的

罗斯福广场9号雷琪娜旅館。关于对匈牙利进行干涉的許多事項就是在那兒达成協議的。在匈牙利的反革命陰謀破产以后，維爱山托尔又再一次回去干訓練流亡者的勾当。他同在音斯布魯克主管这方面工作的机关談妥：在一月份重新開設分三組同时进行的特殊訓練班。这些訓練班是由慕

这幅照片（原来沒有正中的方框）原載1956年11月17日“巴黎前进报”，附有“匈牙利难民”的說明。方框內的人臉已辨明是約塞·路易斯·哥梅茲·泰罗，西班牙长枪会分子以及前藍色师团的成員（藍色师团在第二次大战期間曾同納粹一道在苏联作战）。在听到关于匈牙利事件的消息后，他就来到匈牙利并同霍尔蒂分子进行接触。他的动机是什么，很多人怀疑：



尼黑方面来指揮的。一个匈牙利的妇人安勃魯斯太太（海廷京难民营的头子）在参与这个計劃。她的情夫勃魯諾·布柯維克則被委托从各难民营中挑选出对各种不同的訓練班最为适合的匈牙利或其他流亡者。

在期望取得胜利并且已經准备好为分贓而爭吵的情况下，整个匈牙利流亡者的队伍进入了行动。武装部队排好战斗队列并投入行动。流动無線电台越过了国界。一群群大小特务麇集在奥地利东部和匈牙利西部。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經就緒了。例如，根据法国方面的一个材料，貝拉·伏尔高

(在美国的匈牙利法西斯分子的头子)曾經在紐約的一次記者招待会上承認:他从10月起就已經同非法的匈牙利中心建立联系。在那些重新又浮上来的人物中,最显要的有費倫克·納吉、哈布斯堡王朝的約瑟夫大公、蒂波尔·爱斯克哈特、紹額伊將軍、米克洛什·霍尔蒂父子、季烏洛·格姆別什的兒子和哈布斯堡王朝的奥托皇太子。后者甚至对西班牙的天主教報紙“亞报”發表了一篇談話,敦促西方进行干涉,因为“只有傻瓜才不利用敌人的脆弱的时刻来从中取利”。曾同明曾蒂紅衣主教一起被監禁而后来又同他一道被釋放的帕尔·爱斯特哈齐伯爵也日益引人注意。

許多匈牙利的和其他的反革命分子装作記者或在其他伪装下进入了匈牙利。在这些人当中有西班牙人西班牙长枪会會員約塞·路易斯·哥梅茲·泰罗。人們在前面的相片中可以看到他混在匈牙利流亡者之中。巴朗·蒂波尔·柯拉什男爵(法西斯地主,在霍尔蒂时代曾任財政部副部长,1948年前离开了匈牙利,現居斯圖加特)也拿着一張西德的护照陪同貝奧特里克·塞青伊伯爵夫人来到匈牙利。英国人杰克逊·葛立洪·斯蒂瓦德进入匈牙利的办法也是这样的:他在边境自称是一个記者,但是他的證件表明他是拥有上校軍銜的職業軍人。奥地利人法兰茲·斯特劳勃尔律师和檢察官庫尔特·維尔納博士也陪同爱斯特哈齐公爵和公爵夫人对匈牙利进行了一次訪問,然后又回到奥地利去。

在10月23日前后,無数霍尔蒂軍官、宪兵、箭十字的成員和类似的人物涌进了匈牙利。首先由一些情报組織(有时公开进行活动、有时則伪装福利团体进行活动)对这些人作了簡要的交代。在經過适当的訓練之后,他們就被送往匈牙利。以亞諾什·迪利安和貝拉·科胡特这两个20岁的电

貝拉·科胡特和亞諾什·迪利安，潛離匈牙利以後，又同一群美國間諜一道乘紅十字會列車回到匈牙利為反革命服務。



氣裝配工人為例，他們是在1956年10月2日為了逃避兵役而溜往奧地利的。在奧地利邊境的馬什青道爾夫村，他們被奧地利警察抓住了。從10月6日到15日，他們被關在居辛監獄中。到10月15日，他們獲得釋放，並且帶著發給他們的證件被遣往在格拉茲的“匈牙利局”，交給一個名叫拉斯羅·森吉厄爾吉伊的人。這個人把他們介紹給“自由歐洲”電台以及一個天主教“福利團體”在當地的代表。10月19日，他們到了薩爾什堡。在那兒又有“自由歐洲”組織的一些代表和“美國反間諜部隊”的一個人來看他們。他們獲得了可以找到輕便工作和很容易賺到錢的諾言。到10月27日，他們已經沒有時間經過任何“訓練”就被送回匈牙利參加暴動。

10月28日，在薩爾什堡的公園飯店舉行了一次匈牙利流亡者的會議。在會上發表演說的人中有霍爾蒂軍官拉斯羅·霍瓦特和前憲兵上校鮑爾拉。他們對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大加誣蔑，並且勸流亡者在即將到來的美國武器的

援助下参加暴动。那些表示願意的人就在29日被帶往奥匈边境,并且每人得到50先令。奥地利的边防警察毫不反对讓他們越过国境。他們馬上就到了森古特哈德然后坐上一列紅十字会的火車前往布达佩斯。一到了布达佩斯,他們就同杜达什的“匈牙利民族革命委员会”和“国民警衛队”联系,“国民警衛队”就不費事地把他們編入队伍。

如前所示,匈牙利难民营是本着教授多明尼庫什·格里卡博士11月9日在慕尼黑的“新匈牙利”周刊上發表的一篇冗长的文章中所提出的精神而猛力地进行工作的。这个博士写道:

“在巨大危机的日子里,民族精神是由那些散居在
国外的人来捍衛的。”

所謂“民族精神”在实質上究何所指,上述杂志在这一点上并没有使人有任何怀疑。那就是资本主义和地主制度在匈牙利的复辟。

(四) 在西方的心目中

西方的政界和軍界人士完全了解在匈牙利是什么在遭受危險。当人們在匈牙利本国最多只是微微地觉察到这一点时,西方的軍政界人士却都已经知道了这一点。因此,西方的观察家們毫不犹豫地确认那些武装行动在基本上的反革命和反共的性質,以及它們对人民民主制度的敌視。开始时,他們只打算如何利用匈牙利青年和一部分知識分子根据良好的意圖和正当的要求而进行的进步运动。前面已經引用过的約·孟德尔逊在“新政治家和民族”上所發表的信,最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个事实。他写道:

“革命的开始無疑地是学生和工人所干的。……漸漸地，随着一天天地过去，特别是在俄国军队撤出布达佩斯之后，其他的政治势力插手进来了。”

“首先出現了燒書的人。在工团主义者或社会民主党人的政治示威中，燒書是不常見的。然后，可能更重要的是：示威者所提出的政治要求，据黎斯里·爱因在“新聞报导”上所說，反映了極端民族主义的日益高漲的浪潮。……然后……1945年前的霍尔蒂军队的旧制服也拿出来了。”

“納吉政府的权力漸漸地减少到零。”

“革命的領導日益……进一步右傾。……正如德国一家保守的报纸‘世界报’所說，‘匈牙利陆军的官兵在布达佩斯散發傳单，要求……把政府的所有行政权力都轉交給军队。’……在極端民族主义者领导下的一群人冲进外交部，并且置納吉—蒂尔迪政府关于停止流血的呼吁于不顧。”

“在星期二(11月1日)暴乱的最高峰，佐尔坦·蒂尔迪(一个基督教徒和温和派分子)企圖获得明曾蒂紅衣主教的帮助来稳定局势。……紅衣主教拒絕了这些要求，因而，据西德‘明鏡报’說，这也就鼓励了那些想繼續进行組織‘紅衣主教党’的人。据来自同一来源的消息，明曾蒂紅衣主教的决定使納吉—蒂尔迪政府完全孤立，并使它的垮台成为相当肯定的事。”

西方新聞界并不怀疑：推翻現行的統治制度是匈牙利叛乱的原定的最終目的，或者至少是在后来变成为匈牙利叛乱的目的。从西方报刊中可以摘引和搜集到許多資料来支持这一論断。例如，布魯塞尔的“人民报”在11月1日曾經



法国“世界报”发表一篇通讯，大标题是：“纳吉政府大概即将让位给反共政权”，小标题是：“许多斯大林主义警察被殴打倒毙或被吊死”。通讯一开头就是本书引用过的这么一句话：“革命（或者叫做反革命——如果你喜欢的话）已经在匈牙利取得了胜利”。

这样说：

“以匈牙利和波兰正变成非斯大林化和不再扮演顺服的卫星国的角色为借口，某些人已经不择手段地企图使这些国家重新陷于它们过去的黑暗状态并且使它们离开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很难被指责为同情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法国“世界报”在10月27日还写道：

“叛乱更多地是指向制度本身而不是指向制度的工作方法。这一点是越来越明显了。”

但是，11月1日该报所刊载的发自10月31日的报导



中已經認為：

“当暮色降临于烽烟籠罩中的布达佩斯时，大家都清楚地了解到：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已經不存在了。”

11月2日法国“世界报”所刊載的該报記者讓·罗曼11月1日的报导，是以下面这样几个字开始的：

“革命（或者你願意的話把它称为反革命）已經在匈牙利取得胜利。”

10月29日，法国社会党机关报“巴黎人民报”报导說：

“暴动分子像主人般地在指揮着（伊姆雷·納吉的屈从显示了这一点）。他們已經不再满足于非斯大林化（如同俄国所正进行的）或是非衛星国化（如同波兰所正进行的）。他們坚持要非共产主义化。”

絕大部分西方报刊都同意它們的老板关于匈牙利的人民民主制度已經被清算的假定。尽管它們对于下一步做法还有所爭論，但是就“結局”而言它們是毫不怀疑的。它們相信匈牙利已經是它們的了。与此同时，它們安詳地和冷酷地登載着与反革命行为同时出現的事件——屠戮、私刑和虐杀。

11月初，“西德日报”写道：

“难以想像的恐怖——这就是事件的結局。牺牲者同时包括有罪的和無辜的。私刑法統治了这个国家，把它浸入鮮血中。”

“德意志人民报”（一家杜賽尔道夫的报纸）也公开指出：

“苏联的坦克一离开布达佩斯，一次惊人的屠杀，一个真正的聖巴多罗牟之夜就接踵而至。”

白色恐怖开始后，期待着（匈牙利）出現資產階級制度的西方新聞界曾經精確而扼要地叙述了指派給伊姆雷·納吉和他的政府的任务。“震旦报”在11月2日写道：

“納吉当然还有一个作用可起，而他的政府的非共产党的成員正委托他来起这个作用。他比起他們都更适合于同俄国人談判并获致俄国人的撤退。”

西德的“世界报”在11月3日写道：

“获得胜利的民族共产主义暴动已經被轉变成为一个反共的总叛乱。伊姆雷·納吉用向右逃跑的方式来寻求避难所。……他試圖用日益增长的反苏活动来平衡它內部的政治弱点。他在这一方面做得如此之过分，以致他再也縮不回来了。”

“解放报”引用了美国新聞处主任斯特萊伯特10月31日的一次談話。它的意思是：伊姆雷·納吉的政府被認為純粹是临时性的。它将为一个拥有坚强武装的、包括有流亡政客在內的政府所代替，而后者将同共产主义制度一刀两断，在公務人員中进行清洗，以便領導匈牙利最后回到西方陣营。根据斯特萊伯特的意見，明曾蒂似乎是这样一个政府的合适的領袖。在發表这个談話后，美国新聞处的这位健談

的主任很快就被解职。“解放报”怀疑到底斯特莱伯特只是在白天作梦呢，还是他泄漏了机密？

西方资产阶级越来越相信他们很快就能够取得政治上的领导权了。11月2日的“震旦报”甚至于提出了具体人选：

“匈牙利已经在寻求明天的政府。这个政府将恢复生活的运转并建立秩序。……谁有能力承担这一项迫切的任务呢？”

文章然后提到马勒特上校，他“已经是国防部长，但是他的政治能力如何还不得而知”。也提到了明曾蒂的名字。“震旦报”认为他有资格“把刚从死里复活的各政党团结到一个联盟之中”。

总的说来，西方新闻界挑中了明曾蒂作为最适合于管理这个国家的事务的人。“纽约先驱论坛报”在11月2日写道：

“他今天的归来是天主教会在这个地区的十年反共斗争所取得的最辉煌的胜利。”

德契尔在英国的“苏格兰人报”上写道：明曾蒂红衣主教在全世界从收音机都可以听到的了亮的钟声的伴奏下向布达佩斯胜利前进时，反共的进军达到了它的戏剧性的高潮。由于环境的力量，明曾蒂成了暴动的精神上的领袖。他的话比伊姆雷·纳吉的任何呼吁都更有分量。

据新闻界声称，明曾蒂曾采取适当的步骤来组织他的政党。“震旦报”11月2日有如下的报导：

“红衣主教希望在匈牙利组织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以那些已经存在于意大利、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基督教民主党为蓝本。他曾经指出：匈牙利的天主教民主党，如同德国的阿登纳的党一样，应该把本国的天主教

和基督教分子联合起来。”

曾經被明曾蒂接見过的作家沃瑟·柯維納报导說：

“他（明曾蒂）証实了他希望組織一个基督教民主党。他对于实现这一願望的可能性似乎有相当的信心。‘閣下是否将在下一屆政府中起領導作用呢？’‘那是可能的。’無論如何，到底紅衣主教自己是否将成为临时政府的首脑还不能肯定，那个职位可能由一个政治家来担任，而紅衣主教作为国务部长将准备給予他以精神上的支持。”

11月14日的西德“德国周刊”也刊載了一篇明曾蒂訪問記。它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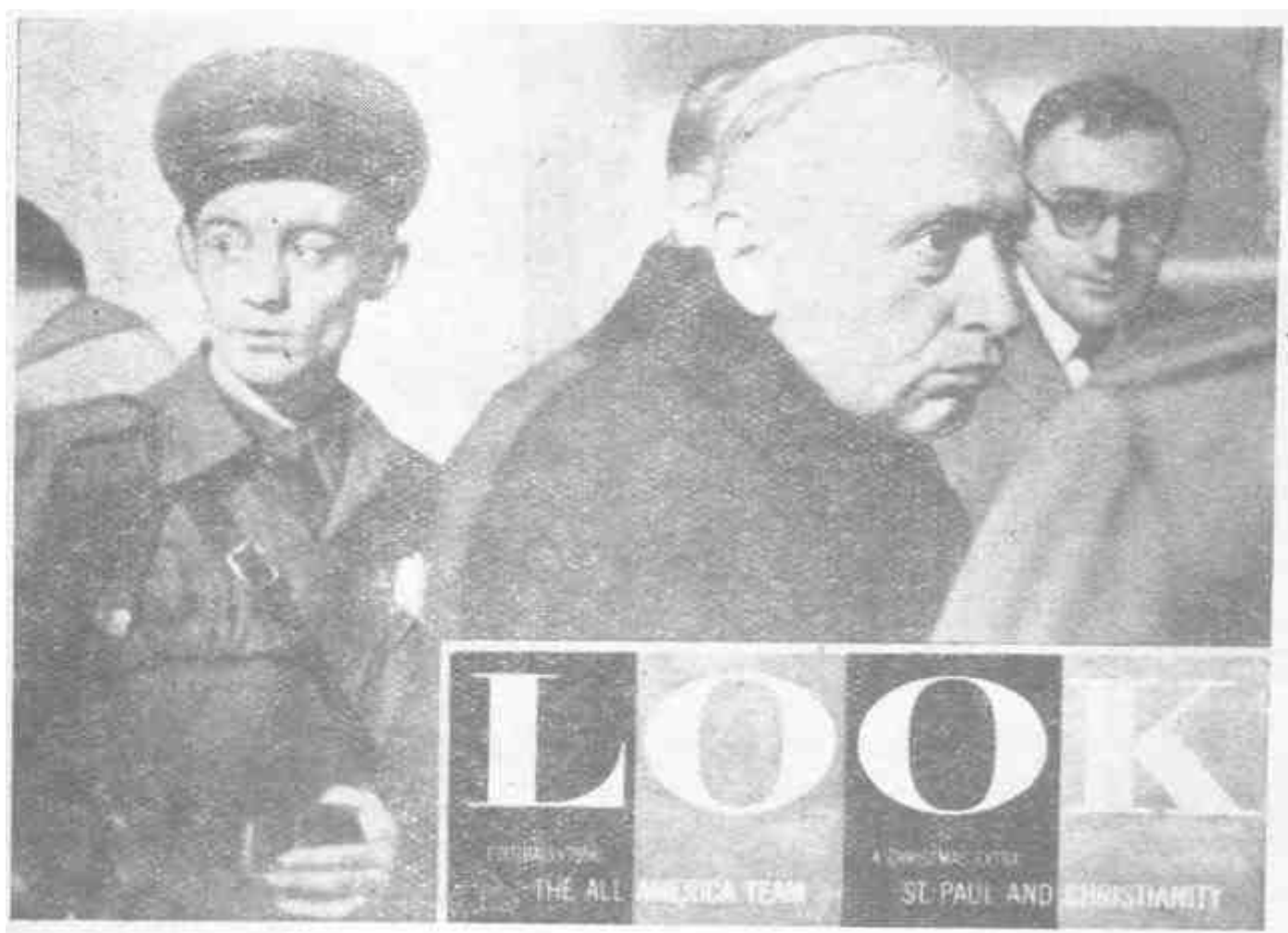
“11月2日，紅衣主教当着新聞界代表的面公开地向西方呼吁，要求在当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給予政治上的支持和帮助。”

“在訪問开始前，他同現住在旧金山的旧同事亞紹什基神父通了电话。明曾蒂通过他把自己的一个口信轉告美国总統，請求后者在匈牙利人民为自由而进行的战斗中支持匈牙利人民，并且安排打开奥地利边境以便供应武器和物資。

上述事实并不是明曾蒂同美国有直接关系的唯一証



本書引用过的法国“震旦报”11月2日通訊，标题如下：
“明曾蒂紅衣主教准备参加一个可恢复布达佩斯秩序政府”



明曾蒂紅衣主教从本宅監禁中被釋放出來以后的情况。这幅照片原載“展望”杂志，并有如下說明：“明曾蒂紅衣主教在布达佩斯受到欢迎”。

据。前面所提到的“新匈牙利报”曾引用了明曾蒂的秘書这样一些話：

“在城內几乎一切电话綫都断了，而你也完全不能同外省通訊，可是今天早上我們已經同华盛顿通了两次話。”

很显然，在明曾蒂簡短的广播文告中，他已經表明所需要的仍然是：同梵蒂岡和华盛顿保持联系。两天以后，他已經准备好了他的很长的声明，由布达佩斯广播电台在11月

3日加以广播。

甚至于从梵蒂冈的观点看来，明曾蒂也做得过火了。这就是为什么教皇认为明曾蒂11月3日的演说“考虑不周”。瑞士的日内瓦日报12月13日以“梵蒂冈不同意明曾蒂红衣主教的固执”为标题对此问题加以评论时，曾经这样写道：

“红衣主教脱离了现实。教皇忧虑地一直注意着明曾蒂红衣主教个人的悲剧的发展。……他在监禁中过了八年，同现实隔绝了。因而，他一被释放，就相信红色的制度在他的国家中已经完结了。他在给教皇、艾森豪威尔总统和纽约红衣主教斯培尔曼的信中都是这么说的。不但如此，他在一次无线电广播的文告中劝他的同胞放弃共产主义，恢复私有财产制度，要求举行自由选举、归还教会财产、保证新闻和教育自由，和组织一个天主教的政党。他反对纳吉政府……然后他向自由世界呼吁，宣称同共产主义的任何种类的共处都是不可能的，请求西方的武装力量尽速解放匈牙利。最后，他直截了当地对一个美国新闻记者说，表示支持的函电对于一个垂死的人民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资产阶级世界的报刊使人对于在匈牙利暴动中进行活动的反革命力量有了一幅清楚的图画（毫无疑问，它们有时是无意中这样做的）。西方的报导和报纸，最后（但是并非最重要）还有“自由欧洲”电台，清楚地说明了资本主义西方在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反革命把他們从監獄里放出来了

反革命分子从監獄中所放出来的数千名政治犯和普通犯人是他們的主要后备力量之一。一万三千多名罪犯，包括近万名的普通罪犯，从全国各監獄中放了出来——伏克監獄 1,080 名；布达佩斯的一个監獄 1,538 名；馬里阿諾斯特拉 348 名；沙托拉饒赫伊 292 名；渥罗斯兰額 1,150 名；帕尔哈尔馬 1,631 名；松巴特里伊 248 名；卡罗却 123 名；乔尔諾克 692 名——这里只不过举了几个。这样放出来的罪犯大多数都編入了反革命的武装队伍。

这里是被釋放罪犯的一个信手拈来的名单，其中多数都在后来的反革命事变中起着积极作用：

貝拉·阿尔佛尔迪，从前的批發商。1944年他答应掩护十二个被迫害的人，后来他把他們都交給了什瓦柏海吉警察局。

阿里斯蒂德·阿特加里，法本化学工業公司駐匈代表的兒子，因間諜罪被判十五年徒刑。他剛被釋放便成为布达佩斯一个武装匪帮的头目。

約瑟夫·巴科斯，1919年伊凡·赫約斯白色恐怖队的一員。曾参加渥尔郭万額的殘酷屠杀。

米哈里·巴洛格，从前的宪兵。作为霍尔蒂匈牙利臭名昭彰的尤哈斯偵探队的隊員，他曾釘梢并且逮捕許多左派运动的人物，其中有伊斯特万·道比和彼得·維萊什。

卡洛伊·巴里茨，霍尔蒂宪兵队的军官。曾指挥过阿特卡尔宪兵队，该队曾在1935年向示威群众开枪打死过八个人。

约瑟夫·贝尔和季乌洛·波科尔，侦探。两人都曾参加残害好几个工人运动领袖，其中包括费侖克·罗利和佐尔坦·商赫尔斯。

阿尔勃特·贝格里，因犯盗窃被判十三年徒刑。

迭索·贝尔托蒂，1944年曾把好几百俘虏从索尔诺克州的俘虏拘留营送往德国的俘虏消灭营去。

艾米尔·巧斯科西，海军上将霍尔蒂手下一个陆军上校的儿子，在1955年因扰乱治安罪被判刑。

阿科斯·乞克瓦里博士，霍尔蒂政权下的警察上校，犯过数起杀人案。

拉约什·纳吉·第文尼，一度为“箭十字党”报纸“匈牙利先驱报”的总编辑。

拉约什·杜杭额，因谋杀一个妇女（尤利亚·纳吉）被判20年徒刑。

罗勃特·恩耶齐，海军上将霍尔蒂属下的州长。

帕尔·爱斯特哈齐伯爵，过去的匈牙利最大地主之一，好几个工厂和面粉厂的厂主。曾参加过一次反革命阴谋。

丹尼斯·戈尔齐，美国特务。

加色尔·基拉伊，前赫约斯特遣队队员，因残杀十一个人被判刑。

吉厄尔吉·拉克海吉和巴尔纳巴什·瑞马赛齐，因领导一个叫做“白色游击队”的反革命地下组织被判刑。

佐尔坦·里托摩里茨基上校，前霍尔蒂统治下一个特别法庭的检察官。

佐尔坦·麦什科，著名的箭十字党首領，一度为箭十字党政府的部长。

拉約什·麦沙罗斯，他曾把八十個有游击队嫌疑的人在布琴处死，亲手杀死了十人。

亞諾什·納吉，他在 1942 年諾維沙德的殘酷大屠杀中是罪魁禍首。

彼得·渥第沙尔契公爵，1956 年以美国間諜机关反間諜部队的特务被捕。

艾米尔·薩卡瓦里，前箭十字党政府中的部长。

里查德·森托勒瑞(休額)，霍尔蒂宪兵队的中校。

列索·伏尔格，犯过投机倒把罪。被釋放后曾参加約瑟夫·杜达什所領導的、总部設在“自由人民报”大樓的大队所进行的两件杀人案（杀害檢察官伊斯特万·沙尔卡齐案和帕尔·弗多尔案）。

伤亡和損失

医院的資料

在1956年10月23日到12月1日之間，共有12,971名負傷的人在各醫院、門診所和紅十字會臨時醫療站受到治療。因為有無數輕傷病人都在家中進行醫治，所以實際受傷人數大大超過此數。上述的全國總數中的絕大多數都是在布達佩斯登記的。

在上述時期內，在布達佩斯的醫院、診所和紅十字會臨時醫療站受到住院治療或流動治療的受傷者為11,513人，而在全國其他各地的相應人數為1,458人。

在布達佩斯醫院中治療的受傷者中，有6,731人臥床不起，其中有559人死亡。

布達佩斯的死亡人數

因作戰或暗殺而死亡的人數經布達佩斯各區人民會議登記者，截至十一月三十日，共計1,191人。這個數字包括在醫院中因傷致死的。但布達佩斯實際被殺人數還要更多些。在這個時期內，由市殯儀館葬入公墓的死者為1,230人。此外，估計有500個屍體仍埋在廣場和空地上的臨時墳墓里。人們相信，這些屍體多數都是那些來自鄉下的人的屍首。現仍在進行搜查，以發掘那些遭受殺害后被秘密掩埋起來的許多國家保安局的人員和黨員干部的屍體。如果將上述數

字計算在內，布达佩斯被杀的人数——包括死伤的苏联人——据估計在 1,800 名左右。

損 失

因反革命暴乱而引起的战斗对建筑物和设备造成很大的損失。掠夺的規模很大。由于运输系統的解体，工業生产遭受了特別严重的損失。

因罢工和运输的解体，工業产值的下降达九十亿福林，这表示1956年国民收入的相应下降。損失总数結果一定会更高些，因为一直缺乏煤和电力，在1957年数月之中生产水平恐怕要繼續較 1956 年 10 月 23 日以前低很多。

政府的商品儲备、商店和倉庫、許多飯店和旅館的食物、运输公司和許多工業公司的供应和设备，由于遭受掠夺和破坏，損失奇重。屬於此項的商品損失达五亿三千万福林，而装备或设备的損失达二亿二千九百万福林，两者总計七亿五千九百万福林。

匈牙利国有鐵路遭受損失总值四亿福林。

軍事物資被掠夺的損失总数約一亿福林。

其他主要損失已登記的有食品公司和其他企業，特別是那些生产消費品企業的原料和产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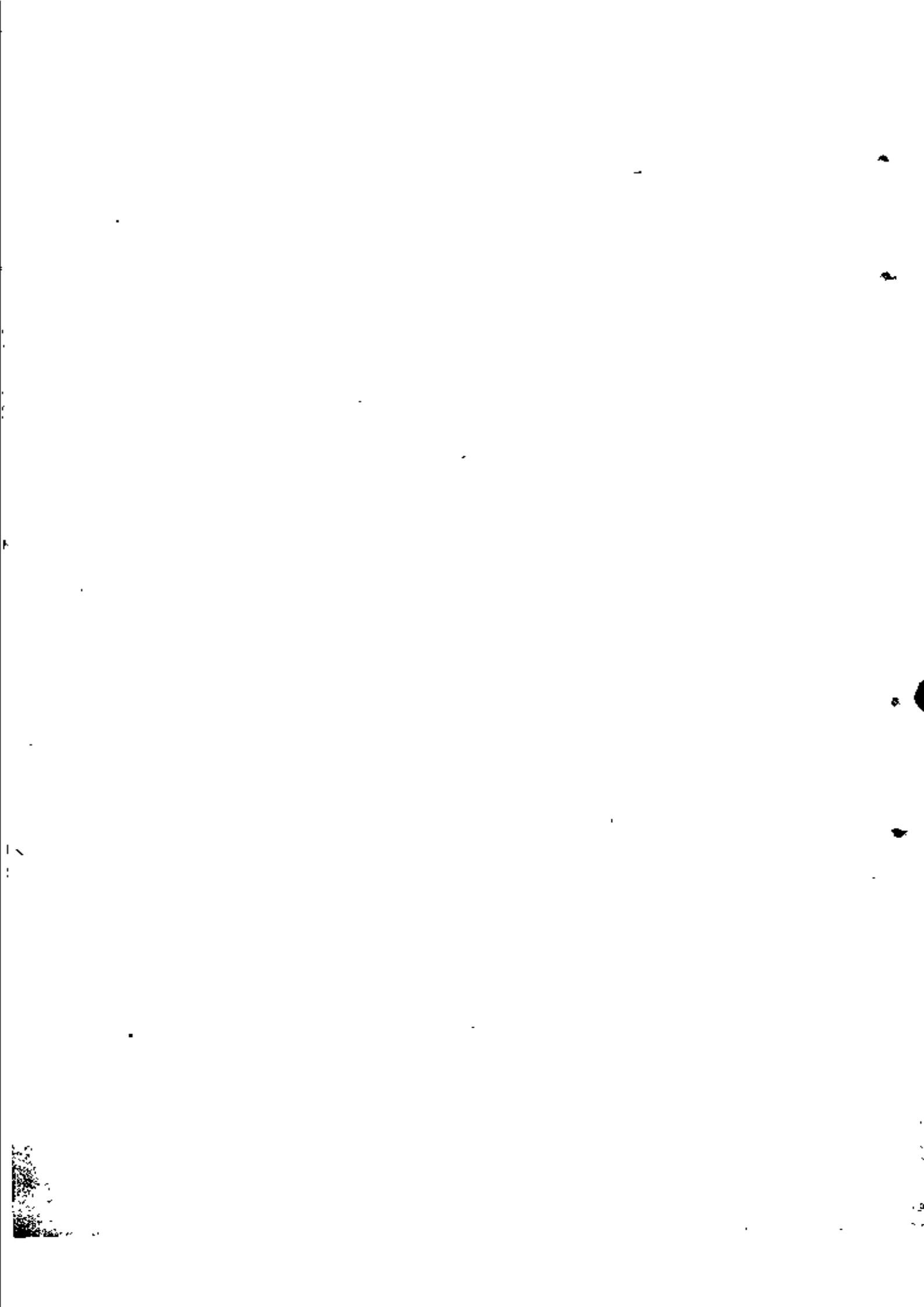
由劫掠和破坏而造成的全国損失总数約达十五亿福林。

反革命分子濫用了心怀不滿的群众的正当意圖，別有用心地竭力制造大規模的搶劫事件。霍尔蒂匪帮在 1919—21 年使用过同样的法西斯伎倆，箭十字党的人們在 1944 年更变本加厉地使用过这种伎倆。随十月暴乱而起的反革命分子的搶劫行动，其目的在于打散或毀灭国家的財產。此

外，国家保安局的人员、党员干部和被抓走的地方会议代表的家都遭受洗劫。这些野蛮破坏行动几乎完全是反革命匪徒队伍，而主要地是他们的“特遣队”进行的。在一些地方，曾发生过对犹太人的迫害和抢劫事件。

在布达佩斯战斗中，许多建筑物受到严重损坏，各省所受到的损坏较少。建筑物的损坏估计值十亿福林。

生产下降，劫掠和破坏以及建筑物的损失总共使匈牙利的1956年国民收入减少一百十五亿福林。



十五位烈士

白色恐怖杀害了数以百計的人們——成百的人們不是在战斗中被杀的，而是被謀害的。我們挑選了其中十五位烈士，把他們的生平在此作个簡略的介紹，說明被反革命所杀害的是人民最忠实的兒女。

在去年十月和十一月的事件中，还有更多的人遭难：普通的劳动人民、士兵、警士、党的工作人員、一些不幸被卷入事件漩渦的、或是一些被引入歧途的人們。我們的国家对我們人民的每一个忠实兒女的不幸死亡感到深刻的震动和悲哀。



伊姆雷·麥澤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布达佩斯市委员会書記

1905年生于拉莫恰哈紹。他的母亲是一个貧苦农妇，很早就沒有了丈夫。为了使她十个孩子吃饱穿暖，她被逼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年紀較大的孩子們也去工作以維持家庭生活。

伊姆雷幼年离开母亲成为裁縫的学徒。只是在他做学徒的期間，他才有机会識上几个字。1927年，他移居比利时，1929年在那里加入了共产党，不久就成为党内匈牙利局的领导人之一。在1936年和1939年間，他参加了国际縱队在西班牙反抗法西斯。在那里，他两次受重伤。西班牙共和国失败以后，他逃往法国，被拘留了起来，后来被放送到一个强迫劳动营。他在1944年回到法国，参加了那里的抵抗

运动。

1945年春季，麦澤回到他的祖国匈牙利。开始时他在布达佩斯党委工作，先在鼓动部，后来是党委書記。1952年，他被派負責工会全国委员会生产部。他的被調离布达佩斯是因为他被指称为“可疑”——这是和拉科西—格罗集团在老共产党员周圍所制造的怀疑和不信任的無耻气氛相一致的。这些老共产党员包括在西班牙为自由作斗争的英勇参加者。但是麦澤对党和人民的忠誠是众所周知的。

在1949和1953年間，麦澤是国民議會議員。但是拉科西派系不允許他充当1953年的选举候选人。然而1953年6月發生了一个大規模的政治复兴，使伊姆雷·麦澤在1954年回到布达佩斯党委会，他被选为書記。他不折不撓地向延迟复兴工作的傾向作斗争，并且頓促党的领导和政府糾正錯誤。1956年7月，在拉科西去职以后，他成为党中央委员会委員。

1956年9月30日，当反革命分子襲击布达佩斯市委总部时，伊姆雷·麦澤組織了保衛它的工作；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化在保衛人民政权的武装斗争中。当对市委大楼的包围快結束，他和二位高級陆軍軍官拿着停战的白旗走出建筑物和襲击者談判的时候，墮落的法西斯劊子手杀害了他。

伊姆雷·麦澤的生和死对于匈牙利劳动人民将永远是难以忘怀的一課。他的殉难是对反革命的一个严重控訴。



約瑟夫·卡拉馬尔

切佩尔市人民會議主席

1895年10月16日生于塞萊盖利什。他的父亲是一名护路工人。約瑟夫讀完小学六年級就当了一名木工的学徒。在1913年他来到切佩尔；1915年他应征入伍。他替社会主义报纸“人民之声报”写稿，为了这件事他在1917年受到了軍法处分。

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时，他积极地参加了工人运动。他在切佩尔的曼弗萊特·維伊斯厂开始时当工場管理員，然后是該厂工人委员会的一个委員。在1919年，他被选入切佩尔市議會。在帝国主义攻击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期間，他参加了匈牙利紅軍和切佩尔步兵团一起作战。

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失敗以后，他被监禁在布达佩斯

的馬尔琪特·克魯特悔改所，后来被送到沙拉伊格隋拘留营一直到1921年他回到切佩尔为止。在1922—23年間，作为罢工委员会的委员他前后四次参加了铁工們的罢工，每次罢工延續了四个星期。

在1927年他又組織了一次为期四周的罢工。在1933年，霍尔蒂的警察逮捕了他和“社会評論”的編輯人員——約瑟夫·馬特紹尔、山道尔·香司坦因和威伏利弟兄。在他获釋以后，他在鋼鐵工業中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因为他已被全国制造商协会(GYOSZ)列入黑名单。

在1935年內有几个月他在米海里伊油鑽厂工作。經過另一段失業时期，他在“匈牙利毛紡厂”获得工作。1942年他再次被捕，然后被关入那达什第收容所。被釋放以后，警察仍旧監視他。他在一个新的工作上不会耽上多久，一待人們發現他是誰，他就得卷鋪盖。

匈牙利解放时他在切佩尔。他立即参加了新的、人民的匈牙利的建設队伍。他被指派为切佩尔市长。离开了六年以后，他在1954年回到切佩尔，并在那兒担任人民會議主席的职务，一直到死。

約瑟夫·卡拉馬尔在1922年参加共产党，后来他参加了共产党的承繼者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他是共产党中央監察委员会和切佩尔市委会的委员。

工人階級运动使他成长为一个真正的人(以“真正”二字的最佳含义來說)。他把他一生時間分別化在工人运动和他所热爱的家庭中。

在1956年10月26日，他为反革命匪徒謀害于基拉里尔德。匪徒們在他的尸首上踐踏，并且用沙泥塞滿了他的嘴。他是秘密埋葬的，他十七岁的孙女爱迪斯是他家庭中看

他入墓的唯一成員。

他的妻子——自从他 19 岁时，她一直是他忠实的伴侣——、三个长大成人的子女和五个孙男女以及他的亲属和战友們都咀咒那些夺去他的战斗的和富于人情的生命的凶手們。



安得拉什·波尔道什

旋工，科苏特奖金获得者

1921年4月25日生于罗马尼亚的一个村庄普拉夏梅尔。他的父亲是一名铁路工人。当安得拉什读完第七年級以后，他离校去充当一名旋工的学徒。学习期滿以后，他在故乡工作。1941年到匈牙利，在切佩尔的曼弗萊特·維伊斯厂找到了工作。

安得拉什·波尔道什在他的一行里达到了很高的熟練程度，他的工作确实很体面。在匈牙利解放以后，他以他杰出的工作赢得了好几个奖状、斯达汉諾夫証書和其他荣誉。1954年3月15日，由于他多年来产量一直很高，政府授与他科苏特奖金，同时强調了波尔道什口号的重要性：不仅是数量，而且还要最高的質量。

10月26日，波尔道什去工厂拿他的薪金。在他回家的路程上，他买了一只面包和一些葡萄。他正走过离他家不远的的一个卡尔文派教堂，突然他被一群暴徒包围了。一个人以诽谤的叫喊辱骂他，“他就是昨天那个枪杀一个孩子的国家保安人员！”于是手枪机钮扳动了，旋工安得拉什，科苏特奖金获得者就倒地而死。面包和葡萄从他手中掉下来：劳动英雄被可憎的杀人犯谋杀了。

他的住在他们遥远的村子里的年迈的双亲、他悲痛欲绝的妻子、他九岁的儿子安得拉什和婴儿尤丽格将永远不宽容这件谋杀案。匈牙利工人阶级也永远不会宽容可耻地谋杀它的最忠实最勤劳的代表之一的事件。



拉斯罗·考伏契

少 校

1923年1月14日生于卡尔卡格，是一个职员的孩子。因为他父亲生病，他一家被迫迁往布达佩斯。在那儿，经过五年不断的病痛，老考伏契在1943年死去。拉斯罗是陶兹车厢厂的一名钳工的学徒。在那里他参加了工人运动，而早在1941年就在全国青年委员会内担任第十区青年组的教育书记。在这期间他在空余时间读完中学。他在1943年加入了共产党，成为一个为共产主义理想而斗争的忘我战士。

解放后，他成为布达佩斯第十区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MADISZ)的组织者，后来他到该联盟的全国总部和匈牙利青年全国联盟(MINSZ)工作。在这一段时期(1946年)中他进了鲁吉安托吉奥尔橡胶厂做一名钳工，后来他离开了

这个职位到岡茲車廂厂去做一个办事員。

1948年他自願参加了人民軍任軍官，在裴多斐軍事学院担任教育工作。在这期間，他还进了技术大学机械工程系，讀了二年，轉到經濟大学讀函授班。

在1956年10月23日他正在布罗第·山道尔街的匈牙利广播大厦值班。在晚上十一点半，包圍广播大厦的暴徒們冲破了大門。拉斯罗·考伏契和其他几个軍官面对冲进来的一群人意欲赤手空拳阻止他們，于是人群中手执武器的人用手提机关槍打了几槍，考伏契少校就倒在院子內的石板上死掉了。他是反革命暴乱中最初被害者之一。



山道尔·西克萊

战争历史博物馆馆长

1895年12月27日生于土尔敦，是农业劳动者的儿子。他十三岁时受雇于吉乌拉·尤斯特的农场，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止。在1914年，他被征编入奥匈帝国的军队，一年后他为俄国人所俘。在十月革命的早期，他参加了红军，并在整个内战中打游击。他为乌拉尔、伏尔加河中游、中亚细亚和富格那的苏维埃政权作战，并在里海前线受了伤。

在他童年时代，作为贫农的儿子，山道尔没钱受高等教育。但在苏联，他获得在中等、甚至于在大学受教育的机会。1924年，他成为一个教师。以无限的精力，他投身于学习语文，除了俄文以外，还掌握了罗马尼亚文、西班牙文、德文和

法文。

在1936年，西克萊到西班牙去參加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鬥爭。直到1939年，他一直在國際縱隊中戰鬥。失敗以後，他被拘留在法國，後來在北非洲，為時四年。1943年，他回到蘇聯向匈牙利戰俘講授反法西斯課程。1944年他回到匈牙利，被派負責一個戰俘營。1948年他加入了人民軍。

1956年10月26日人民聯盟分子（日耳曼血統的匈牙利人的霍爾蒂組織）在布達凱西斷送了一個飽經風霜和富有成就的傑出生命。



拉約什·基什

爱国人民陣綫布达凱西委员会主席

1900年11月4日生于馬柯。他的父亲是一个裁縫的助手，早就死掉。他的寡母靠洗衣养活她自己和二个女兒、五个兒子。五个兒子中的四个做了鉄工；拉約什成了工具制造工人。他們都是参加組織的。大哥帕尔参与俄罗斯革命，整个內战时期在西伯利亚作战。拉約什和他的兄弟阿尔帕特加入匈牙利紅軍队伍，在馬柯附近被羅馬尼亚人俘擄。拉約什先后被禁于阿拉特、戴梅什伐尔和勃拉伊拉。他設法逃了出来，然后逃到了奥地利。在奥地利他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以后他到南斯拉夫去，并且在那里的工人运动中積極工作。

1925年他結了婚，定居在薩勃特卡，生了二个女兒。

1944年他們一家离开薩勃特卡到基什戴萊克。就在那一年里他在那里参加了共产党。1945年他参加了土地改革工作。以后他到塞盖特去住，又从那里迁往布达佩斯。

1946年他被指派为他所居住的布达凱西郊区民族委员会的委员，和布达凱西党的负责人，并从1953年起，担任当地爱国人民陣綫委员会的主席。

从1950年起，拉約什·基什在鍛鉄工厂工作。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爱他的党和人民，并且把这种爱灌注給他的兒孙。1956年10月26日，他和他女婿在布达凱西的反革命匪徒的斧头下殉难。



亞諾什·阿斯托洛什

陸軍上校

1918年4月6日生于波乔額(勃拉切什拉伐)。他父亲是鞋匠,由于在匈牙利苏維埃共和国时代被任命为工厂經理,后来被反革命关了几个月。1932年亞諾什·阿斯托洛什金飾匠的学徒。

他参加工人运动时是一个十七岁的少年。这一年他成为铁工体育会的一个会员,并在次年成为“紅色援助”运动的一个积极的参与者。同样地在1936年他加入了貴重金屬工人工会,并在1937年担任了执行委员会的委员。1942年5月,因为参加独立运动而被捕,拘留在納吉卡尼沙,后来为苏軍解放。

阿斯托洛什从1945到1947年担任党指导员的职务,并

在1947年成为首都第一区党委書記。他在1948年加入人民軍担任政治指導員和組織員。無論他到甚么地方去工作，他总是被認為是一个具有珍貴的品質的人。他的學問、他的朴素和高貴的性格一直为人们所尊敬。

1956年10月30日，在布达佩斯市委大樓遭受襲擊以后，他为反革命暴徒所謀害。他的妻子和四个孩子为他的死亡而悲痛；而所有他的战友們也因为丧失了一位亲爱的、把整个生命奉獻給人民事業的战友而哀悼。



約瑟夫·派普

炮兵上校

1917年生于布达佩斯的新佩斯区。他的父母亲在过去四十年中都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他的父亲是一名旋工，1919年时是红军的营指挥员。白色恐怖分子为了他的父亲担任这个职位而长期拘禁他；释放以后还处于警察的监视下。他的母亲是新佩斯区“儿童之友”组织的创办人和组织者。

约瑟夫·派普在1932年进了陶兹船坞，当一名机器装配工的学徒。学习期满后，他两年找不到工作。过了一个时期以后，他在合众照明灯泡厂找到一个工作。在1939到1941年间，他服了兵役，随后他成为邮局的一个无线电报员。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1949年。解放后，派普被任命为匈牙利民主青年联盟新佩斯区的书记，他从1946年到1948年

一直担任这个职务。1950年他参加了军队。在那里，他的正义感和他乐于助人品质立刻赢得了他的下级的爱戴。

1956年10月30日，派普在布达佩斯市委大楼。市委被围攻以后，疯狂的反革命凶手就在这座大楼面前杀害了他。这个残暴的罪恶使两个年幼的儿童成为孤儿，也如此突然地结束了一个富有战斗性的成绩斐然的生命。



拉約什·薩波

陸軍中校

1913年12月17日生于米什科尔茨。他的母亲是一个普通工人。幼年的拉約什进了貧窮兒童的救济院，遭遇到同卡沙（科希西）鎮周圍村落的被遺弃兒童一样的命运。十三岁时他当了面包店的学徒；在布拉格学徒期滿后，参加了該地的工会。1929年成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的青年組織和無产者体育会的成員。靠自己的自修，他通过了布拉格中等学校的头四次試驗。

經常的失業迫使他在匈牙利、法国和波兰到处寻找工作。1937年拉約什·薩波回到了匈牙利，在他出生地米什科尔茨的面包店工人工会里表現很積極。1940年他找到了新的工作，在一个半軍事性質的青年組織“列文采”的总部里

当职员。他于1944年組織了一支武装队伍，其目的是在他所率領的“列文采”青年的协助下同“箭十字”分子进行斗争。由于取得了他的“国民警卫队”的支援，他阻止了把几百名“列文采”青年强迫迁往西方。解放之后，他起先当警察，以后当塞兰克什的共产党書記，后来当粮食局的視察員。

1947年他进科苏特学院(軍官訓練学校)，畢業时成績优良。他成了一个能干的軍官，在人民軍里完成了許多極其重要的任务。

1956年10月30日那个不幸的一天，薩波在共和国广场的市委大楼。市委被圍攻以后，他被反革命强盜杀害在大楼的前面。由于他不幸的早死，两个幼女成了孤兒。



卡尔曼·土尔纳

鍛工

1914年10月5日生于塞盖什斐哈伏尔。他的父亲是一个泥水匠的助手，一个有名的参加工会組織的工人。在初等学校畢業之后，土尔纳当了通烟囱的学徒，这样的工作他做了三年。学徒期滿后，于1934年来到布达佩斯，从事建筑業。他参加过1935年建筑工人的大罢工。1937年到1939年，土尔纳服了兵役。复員之后，他找到了工作，在曼弗萊特·維伊斯工厂当普通工人，后来提升为鍛工。

土尔纳于1945年参加匈牙利共产党，起先是鍛工車間党支部的一个成員，后来成为支部書記。1950年他被委任为鍛工車間人事部門的負責人，一年之后調到內务部的地方人民會議司。他的爽直和無所顧忌的批評使他不适合这

样的工作岗位,因此他于 1952 年再次从事体力工作,他到国家毛纺厂去当锻工。

当一个区的党委员会于 1956 年 10 月 24 日受到攻击时,土尔曼积极地参加了保卫它的战斗。

霍尔蒂警察部队的旧人员什·朗格和伊·米契那伊于 11 月 4 日在他的住所里找到了他并将他杀害,就这样结束了一位纯朴的锻工和一位工人运动的忠诚的战士的生命。



米哈里·巴尼

农业工人

米哈里·巴尼生于 1895 年，是聖馬尔通卡德的“多查”合作农庄的庄員。当他还是个年輕的士兵的时候，1916 年被俄国俘虏。俄国革命解放了他之后，他立即参加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行列。

巴尼患病归来，好几年困臥在病床上。他始終是为他的受灾难的同志——貧苦农民——的事業而斗争的战士，他总是受到他們完全的信賴。巴尼于 1945 年参加了土地改革委员会的工作，被委任为当时組織起来的农民合作社的主席。

1945 年他加入了党，在死之前，一直是当地的执行委员会的委員。他获得党的完全信任，并且担任党委会的委員。

1949年他加入“多查”合作农庄。

1956年10月26日反革命强盗闖入他的住宅，想杀害他的兒子——納吉卡托区党委会第三書記。强盜們沒有找到他們的目标，便走了。第二天，他們全家便离开这所房子，只留下年老的巴尼在家。殘暴的匪徒們第二天晚上又来了，便将这位匈牙利农民的年老的战士从他的屋子里拉出来，用兽性的殘酷的办法把他溺死在井中。



彼得·拉卡托什

党校教員

1924年3月3日生于普斯托渥特拉卡。他的父亲是一个贫穷的农业工人，在解放后分得了几英亩土地。

彼得·拉卡托什继续他父亲的职业，从1938年到1946年当农业工人，他在村庄中最富有的富农那里当了许多年长工。

拉卡托什于1945年参加了匈牙利共产党。他当了土地改革委员会的主席和党的支部书记。1946年他被选为麦泽考伏契哈绍区党委会的委员，1948年成为党中央委员会机构的一个工作人员。在高级党校学习了两年并获得了学位之后，他起先在党中央的农业部门工作，后来从1953年3月起在政府的农业部工作。1954年4月，他被任命在一个党

校当教员。在这期间，拉卡托什成了合格的农学家，后来又
在大学里继续研究农业经济。

当布达佩斯党的市委员会受到攻击的时候，他恰巧在
市委员会里。遭了殴打后，他被拖到街上，腹部受到枪击。送
到医院时，不能立即动手术，因为任何动手术的打算都受到
匪徒们的阻挠。最后可以把他放在手术台上时，由于流血过
多，以致医生对于挽救他的生命所作的一切努力都归于失
败了。两个孤儿哀痛他们父亲的悲惨而过早的死亡。



伊斯特万·沙尔卡齐

律 师

1922年生于孟卡契(孟卡西伏)。他的父亲开了一个書鋪，掙的錢仅足以維持家庭生活。在六年中等学校快結束时，由于無力繼續正規的學業，乃轉而學習烹飪技术，并在許多飯店里工作。1939年他参加了工会运动。1942年来到布达佩斯，1943年沙尔卡齐被派作强迫劳役，第二年他逃奔紅軍，作为紅軍的一員参加了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解放。由于一再負伤，1945年9月沙尔卡齐变得很衰弱，便回到布达佩斯。

从1945年起，沙尔卡齐便是一个党员，1946年即在警察总部工作，而后調到內务部的法律司。

他到夜校學習，参加了中等学校的畢業考試，并繼續在

大学学习，1950年获得了法律博士的学位。随后通过了律师和检察长的考试，结果把他调到检察长办公处。

1956年11月1日那不幸的一天，沙尔卡齐从他的家里出发到他的办公处所——最高检察长办公处——的途中被反革命分子包围住了，他被带到首都的一个兵营。11月4日把他移送到“自由人民报”大楼，这个房子已经被罪恶昭彰的约瑟夫·杜达什的“特别派遣队”所占据。当天夜晚他们把他枪杀了。沙尔卡齐留下了一个寡妇和一个六岁的孩子。



卡洛伊·亚卡勃

警察少校

1924年5月31日生于多罗格。他的父亲是一名矿工，他的母亲起先当女僕，后来当护士。她失去过两个丈夫，两个都是矿工，她只有努力挣扎来抚养六个孩子。卡洛伊不得不从小就去謀生，起先在面包店打杂，后来在园艺师处打杂，再后来当張貼广告的。卡洛伊十五岁时，他父亲去世了，由于他大哥的帮助，才能去学习旋工的手艺。

他在“多瑙河”工厂做工一直到1945年参加民主警察部队时为止。一开始他就很有志向，在十一年的过程中，他升到了少校。除了作警长的工作以外，在他一生中最后三年里还研究法律。

亚卡勃于1949年结婚，婚姻非常美满，生了两个女儿。

1956年10月發生騷亂時，他被派去保衛高爾基大街的糧食倉庫。10月29日，蘇聯軍隊撤出布達佩斯的那一天，他去高爾基大街的警察醫院，從那里動身回家，剛走出門，狙擊者的一顆來復槍子彈穿進他的心臟。在他的屍體上發現了一張紙，寫着：“這就是人民的敵人的遭遇。”

人民是一定要向屠殺和污辱人民這樣忠實的兒子的人報仇的。



帕尔·弗多尔

国家保安局中尉

1925年生于塞普希莫约罗什（德兰斯瓦尼亚）。弗多尔是贫苦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儿子，念完高等小学后，1942年为给一个仪器制造者当助手而来到布达佩斯。学徒期满后，他受雇于一家烟草工厂，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1949年。就在这一年，他开始积极参加首都第九区党委会的工作。1950年他开始到内务部工作。

1956年10月31日反革命分子把他从一个朋友的公寓房子里拉到一个兵营，从这里把他带到“自由人民报”大楼。在那里他受了四天的拷打和刑讯，后来和伊斯特万·沙尔卡齐一起被杜达什的“特别派遣队”于11月4日夜晚杀害于科尔文百货公司后面的小街上。

帕尔·弗多尔是一个温存的丈夫，慈爱的父亲，正直而慷慨的人，他是再也不能回到他的妻子和幼儿身边来了。